



MAO
ZEDONG


毛泽东
军事箴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编著

下

 辽宁人民出版社



毛泽东 军事箴言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 编著

下

Ⓒ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

——毛泽东：《和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谈话》（1946年8月6日）

1946年夏天，抗战的硝烟散去不久，解放战争的烽火已经燃起。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第五次来到中国。8月6日，她乘卡车一路颠簸，前往延安杨家岭毛泽东的住处，要完成她上次访华未能实现的愿望——见到毛泽东。在这里，她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这个“身材魁梧”“毫无拘束”的富有传奇色彩的中国革命领袖。

斯特朗问毛泽东：“你觉得中国的问题，在不久的将来，有政治解决、和平解决希望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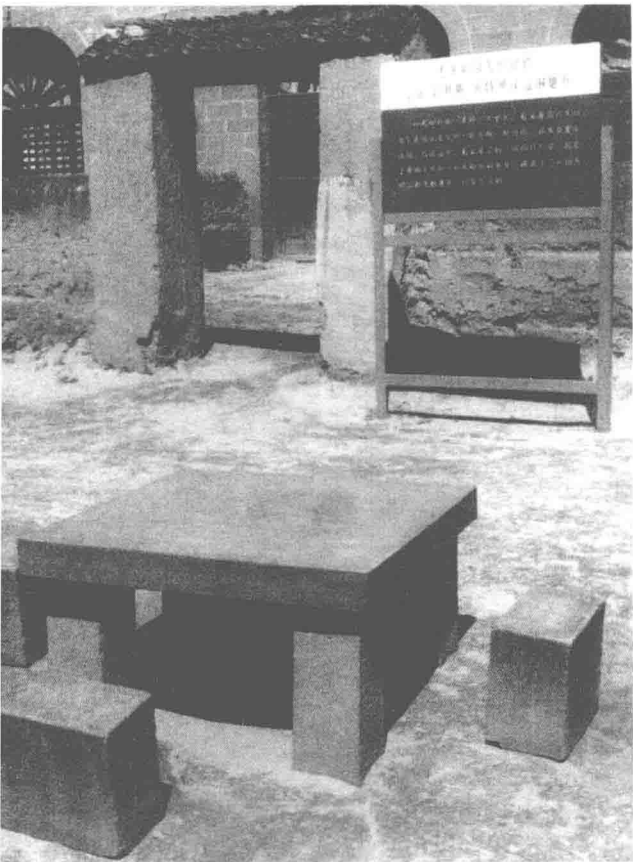
毛泽东回答：“这要看美国政府的态度。如果美国人民拖住了帮助蒋介石打内战的美国反动派的手的话，和平是有希望的。”

“如果美国人民问到共产党为什么作战，我该怎样回答呢？”

“因为蒋介石要屠杀中国人民，人民要生存就必



★ 1946年，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在延安。



★ 图为1946年8月6日毛泽东和斯特朗谈话的地点。

须自卫。这是美国人民所能够理解的。”

接着，这位61岁的美国记者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果美国使用原子炸弹呢？如果美国从冰岛、冲绳岛以及中国的基地轰炸苏联呢？”

毛泽东目光如炬，用坚定的口吻回答道：

“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看样子可怕，实际上并不可怕。当然，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屠杀的武器，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他接着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

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这一番发生在中国西北黄土高原上的对话很快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告诉全世界人民：只有人民的力量是不可战胜的，反动势力看起来强大，但那是暂时的，是纸老虎，它们必将失败。这句话鼓舞了全世界革命者为着民族自由解放事业而不懈斗争。

毛泽东为什么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还得从毛泽东革命经历中的认识判断说起。

★34岁的毛泽东得出结论：真正的力量在人民手中

1927年春，北伐战争正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战线已经推进到上海和浙江宁波、富阳，安徽安庆一带。这时党内不少同志都对国共合作前景表示乐观，毛泽东却选择来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数十天的考察，毛泽东得出了一个结论：

“很短的时间内，将有几万万农民从中国中部、南部和北部各省起来……他们将冲决一切束缚他们的罗网，朝着解放的路上迅跑。”

在毛泽东看来，人类历史一直是在反动势力日趋没落、革命力量逐渐上升并最终取代反动势力的新旧交替中向前发展的，先进阶级取代落后阶级、民主势力战胜剥削压迫，这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考察过农民运动后，毛泽东坚信：孙中山先生40年的努力没有做到的事情，就是他在遗嘱中痛陈的“唤起民众”，农民群众在几个月内就做到了。一切反人民的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土豪劣绅，都将被人民的磅礴力量葬入坟墓。反动的势力必将灭亡，革命的人民必将胜利，因为真正的力量从来不在反动派手里，而永远在人民手中。这就是34岁的毛泽东得出的结论，它奠定了毛泽东革命生涯的基调。

毛泽东的考察报告发表之后不久，“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相继发生，大革命不可逆转地遭遇了失败，共产党被迫开始独立组织武装斗争。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总方针。为了贯彻“八七会议”所定的方针，毛泽东于9月9日领导湘赣边界秋收起义。起初湖南省委决定首先破坏粤汉和株萍铁路，随后组织各县和省城长沙起义，然而起义的三路部队均遭受挫折。据当时参加战斗的彭公达回忆，共产党人当时还没有能广泛发动群众支援配合，所以“人民没有起来”。

此时，毛泽东当即决定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南下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进发。10月底，疲困交加的起义部队来到湘赣边界罗霄山脉中段的井冈山，开展工农武装割据，这是共产党领导人民军队第一次在真正意义上和人民结合在一起，共产党人第一次获得了真正的力量。1928年，毛泽东满怀信心地

指出，一国之内，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有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长期存在，这是世界各国从来没有的事。红色政权存在的外部原因是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虽貌似强大，实际上内部早已四分五裂；而红色政权存在的更为根本的原因则在于党领导的武装力量第一次和蕴藏着无穷革命能量的民众紧密结合在一起：革命的武装力量不仅包括相当力量的正式红军，而且还有各县的赤卫队和乡的暴动队，军队不仅负责作战，而且积极做群众工作。

到农村去、到反动势力最薄弱的地方去，也就是到人民群众基础最好的地方去开展武装斗争。通过这样的斗争经历，毛泽东断言：“边界的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则更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

正是人民的无穷力量给了毛泽东无比的自信。

★发动非正义战争的帝国主义者必将最终失败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内无民主制度，外无民族独立，人民要谋得自由和民主没有和平道路可走，而只有进行战争。纵观古今中外的历史变迁，反人民的势力永远不会自行退出历史舞台，自由民主的必由之路就是人民组织起来反抗到底。这一条真理不仅在国内革命中一再得到证明，而且也适用于中华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正义战争。

1935年春季开始，已经在东北三省横行数年的日本侵略者一面在华北对中国领土鲸吞蚕食，策动华北五省“自治”，一面诱骗国民政府签订了一系列旨在侵吞华北、灭亡中国的秘密协定。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蒋介石却电令西北军加紧对红军发起进攻。这年12月，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议上说：一切帝国主义的侵略战争都是非正义的，而只有被压迫的民族和被压迫的阶级的反抗战争才是正义战争；帝国主义“这个怪物”出现之后，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阶级的正义的反抗战争已经连成一体，中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不再是孤立的，正义的反抗战争必将取得胜利。

1937年夏，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7月底，日军猛攻北平南苑，北平、天津在三日内先后沦陷，蒋介石为了防止日军自华北长驱直下徐州、威胁南京，遂在上海组织反击，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改变为由东向西。尽管国民政府投入的兵力多于日本侵略者，但是由于各系军队缺乏协调、指挥不灵，加之武器装备远逊敌人，上海和浙江北部的抗战节节失利，大片国土沦陷敌手。与此同时，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则先后取得了平型关等战役的胜利，与华北、淞沪抗战国民党军的一再受挫形成了鲜明对比。

面对日寇的强大攻势和国内各界要求抗战的呼声，蒋介石不得不发表声明，要求“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但却始终缺乏发动人民实行全民族抗战的具体行动。

这年9月29日，毛泽东在谈到国共合作成立之后的迫切任务时痛切地指出：单纯的政府和军队的抗战，是决然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华北和江浙地区的失败就是血淋淋的证明！尽管统一战线名义上成立了，但是国民政府迟迟不敢发动群众，广大的工人、农民、兵士、城市小资产阶级及其他许多爱国同胞还没有被唤起，还没有组织起来和武装起来，这才是目前的最严重的问题！挽救危亡只有一个办法，这就是全民族抗战，中国抗战是反压迫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所以政府不但不应惧怕人民，而且必须唤起人民积极地参加战争才能取得胜利。正是在这一时期毛泽东点明了这样一条原理：“战争的性质决定政府和人民的关系”，发动非正义战争的帝国主义者必将遭到其国内外人民的反对并最终失败，而反压迫、反奴役的正义力量则会受到人民的拥护，是定将取得胜利的。

判断中国将会在抗击侵略的战争中取得胜利，毛泽东不是独此一家，当时有一种论调认为日军的机动力量将被大量牵制，无法再行进攻，短时间内中国军队就能够组织反攻并在短时间内战胜日本。与这种“速胜论”截然相反的则是认为中国必败的“亡国论”。

1937年秋天开始，短短几个月间，上海和南京相继沦陷。12月，日寇大肆虐杀中国军民，制造了震惊中外、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罹难者达30余万。1938年5月，日军攻陷徐州，更直接威胁华中重镇武汉、长沙。当时的国内，一方面恐惧、悲观、失望的情绪弥漫全国；另一方面盲目乐观的“速胜

论”也大有市场。毛泽东考察了敌我双方的形势后敏锐地指出，“亡国论”和“速胜论”都不可取，未来的形势是日本必败，中国则将会在艰苦持久的作战后取得胜利。他进而分析道，日本帝国主义虽然暂时强大，但它发动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反人民的，不仅将受到被压迫的中国军民的奋起反抗，而且会引起其国内的阶级矛盾，国际社会的绝大多数国家也会反对它；中国虽然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各方面都不如敌人，但中国是有着极大战略纵深的大国，更重要的是，抗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战争，支持战争的人民则有着无穷的力量。1938年5月，毛泽东为了反驳“亡国论”和“速胜论”撰写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他形象地说：

“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日本敢于欺负我们，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国民众的无组织状态。克服了这一缺点，就把日本侵略者置于我们数万万站起来了的人民之前，使它像一匹野牛冲入火阵，我们一声唤也要把它吓一大跳，这匹野牛就非烧死不可。”

日本帝国主义的反人民、非正义和暂时强大，中国人民反抗侵略压迫的人民性、正义性和暂时弱小，两方面因素共同决定了抗日战争必然是一场日本必败、中国必胜的持久战。毛泽东这部著名的《论持久战》像伟大的灯塔一样照亮了中国人民抗战的光明前途！

对共产党人来说，“唤起民众”不是一句空话。毛泽东提出要组织人民自卫军和民兵，解放区所有的男女青年都要组织在抗日人民自卫军、民兵或者主力军队中，部队不仅可以随时担负作战任务，而且有能力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要把武装斗争与工人、农民、青年、妇女等的斗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与政权的斗争，经济战线、思想战线的斗争和锄奸斗争等直接或间接地配合起来。

貌似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最终必将失败，这不仅是毛泽东审视中国战场的形势得出的结论，更是对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整体判断。1942年10月的欧洲战场，顽强的苏军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不仅顶住了纳粹的进攻，而且还毙俘德军数十万人，击毁上千辆坦克、2000多门火炮和1400余架飞机，扭转了不

利局面。这时战役还没有取得最后的胜利，但毛泽东已经断言，尚未结束的斯大林格勒战役正是纳粹“灭亡的决定点”。这时，毛泽东撰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文章指明：斯大林格勒战役就是欧洲战场的转折点，从现在开始，纳粹的罪恶势力将“只有死路一条好走了”。在人类历史上，凡属将要灭亡的反动势力，总是要向革命势力进行最后挣扎的，而有些革命的人们也往往在一个时期内被这种外强中干的现象所迷惑，看不出敌人快要消灭、自己快要胜利的实质。相应地，在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正在进行反人民战争的日本帝国主义也“将一天一天感到头痛，直至向它的墓门跨进”。

1945年4月末，在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党的七大上，毛泽东向大会作了《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他说：“法西斯侵略势力是一定要被打倒的，人民民主势力是一定要胜利的。世界将走向进步，决不是走向反动。……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

“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这句话振聋发聩，石破天惊！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

1945年6月，欧洲战场上的反法西斯战争已经结束，日本帝国主义正在做最后的垂死挣扎，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了题为“愚公移山”的讲话，他坚定地说：

“现在也有两座压在中国人民头上的大山，一座叫作帝国主义，一座叫做封建主义。中国共产党早就下了决心，要挖掉这两座山。我们一定要坚持下去，一定要不断地工作，我们也会感动上帝的。这个上帝不是别人，就是全中国的人民大众。全国人民大众一齐起来和我们一道挖这两座山，有什么挖不平呢？……美国政府的扶蒋反共政策，说明了美国反动派的猖狂。但是一切中外反动派的阻止中国人民胜利的企图，都是注定要失败的。”

没有人民挖不平的大山，一切看似猖獗的反动派在人民面前都注定失败。

可以说，毛泽东对战争结果的判断归结到底仍然是：谁站在人民一边，谁就将取得胜利。

艰苦卓绝的抗战是人民的胜利，但正当人民热切期盼即将到来的胜利之时，蒋介石集团却早已在策划夺取人民战争的胜利果实。日军投降之际，他一方面电令共产党指挥下的军队就地“驻防待命”，并设置了重庆谈判这场“鸿门宴”；另一方面宣判罪大恶极的侵华日军司令官冈村宁次“无罪”，并秘密请他充当反共内战的“军事顾问”。蒋介石对内镇压、对外卖国的丑恶嘴脸再次暴露无遗。日本侵略者宣布无条件投降之时，国民党统治下的土地和人口均超过全国总量的百分之七十，国民党军总兵力约有430万人，正规军规模达86个整编师，其中22个为美械、半美械装备，此外还接收100万日军的装备，拥有军用飞机、坦克等大量武器。相比之下，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仅有127万人，用的是各路缴获的“万国牌”武器装备。据1946年7月的统计，解放区每月仅能够生产步枪1030支，迫击炮2门，机枪15挺，步枪子弹不及30万发。解放军的力量处于明显的劣势中。这些都使得蒋介石集团有恃无恐，幸灾乐祸地扬言3~6个月之内先消灭关内的人民军队，再着手解决东北问题。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蒋介石集团和美国等帝国主义势力的阴谋洞若观火。1947年12月，毛泽东说，蒋介石的方针就是镇压、逮捕和屠杀，他20年的统治是卖国独裁反人民的统治，他们的一切欺骗都已被他们自己的行为所揭穿，他们已经没有什么群众，已经完全孤立了。而与此同时，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在中国，共产党不但在解放区得到最广大人民群众信任，而且在国民党统治区也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党和人民不仅有身经百战的正规军，而且有广泛发动起来的游击队、民兵等人民武装。蒋介石和支持他打内战的美帝国主义等纵然不甘心自行退出历史舞台，但人民战争的小米加步枪注定将消灭他们的飞机加坦克。

也正是在这些考虑下，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特朗说出了本篇开头那番话。

据说当时陪同美国记者斯特朗的，还有时任中宣部部长的陆定一和黎巴嫩裔的美国医生马海德。由于毛泽东第一次使用“纸老虎”这个词，陆定一不知如何翻译，就暂时翻译成“Straw-man（稻草人）”。

斯特朗问：“是指 Scare-crow（吓鸟的稻草人）吗？”

在华多年的马海德医生领会了二者的区别，纸老虎显然不是立在田里单纯依靠恐吓驱赶鸟儿的稻草人，他说：“不对，不是稻草人，是纸老虎，paper-tiger。”

从此，“纸老虎”这个词，无论中文还是英文，开始传遍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也传遍了全世界。

毛泽东一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论断，来自于一种政治家的自信，也源于对历史大势的准确把握。历史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人心向背决定战争胜败。追求自由独立是全民族共同的心愿，一切强加给中华民族的压迫、奴役和战争都将会遭到失败。

在经历了100多年沉沦、屈辱的历史后，中华民族终于在1949年迎来了新中国的成立。

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为了维护其侵略利益，继续不断向中国施加武力威胁，甚至以核战争相威胁。尽管新中国“一穷二白”，毛泽东还是多次一针见血地指出，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原因就在于它们是反人民的。

1956年7月14日，毛泽东在会见拉美客人时，进一步表达了对帝国主义强大势力威胁时的态度。他说：

“一切会有变化。腐朽的大的力量要让位给新生的小的力量。力量小的要变成大的，因为大多数人要求变。美帝国主义力量大要变小，因为美国人民也不高兴本国的政府。”

“我这一辈子就经历了这种变化。”

毛泽东再次运用了“纸老虎”说法：

“现在美帝国主义很强，不是真的强。它政治上很弱，因为它脱离广大人民，大家都不喜欢它，美国人民也不喜欢它。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我看美国就是个纸老虎。”

怎么对待纸老虎？毛泽东分别从战略上和战术上提出了自己的考虑：

“我们说美帝国主义是纸老虎，是从战略上来说的。从整体上来说，要轻视它。从每一局部来说，要重视它。它有爪有牙。要解决它，就要一个一个地来。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它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

从战略上说，完全轻视它。从战术上说，重视它。跟它作斗争，一仗一仗的，一件一件的，要重视。现在美国强大，但从广大范围、从全体、从长远考虑，它不得人心，它的政策人家不喜欢，它压迫剥削人民。由于这一点，老虎一定要死。因此不可怕，可以轻视它。但是，美国现在还有力量，每年产一亿多吨钢，到处打人。因此还要跟它作斗争，要用力斗，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争夺。这就需要时间。”

什么纸老虎会被打破呢？毛泽东认为，当正义的力量、人民的力量一步步强大起来的时候，总有一天，纸老虎终究会经不起风雨。

“美洲国家、亚洲非洲国家只有一直同美国吵下去，吵到底，直到风吹雨打把纸老虎打破。”

他还说：

“总有一天，纸老虎会被消灭的。但是它不会自己消灭掉，需要风吹雨打。”

这些论断，突出地反映了毛泽东的“纸老虎理论”，再一次论证了最终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心向背：“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

1957年11月，毛泽东在出访苏联期间，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言，还饶有興味地回忆起11年前接受斯特朗采访时的谈话，他说：

“1946年蒋介石开始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许多同志，全国人民，都很忧虑：战争是不是能够打赢？我本人也忧虑这件事。但是我们有一条信心。那时有一个美国记者到了延安，名字叫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我同她谈话的时候谈了许多问题，蒋介石、希特勒、日本、美国、原子弹等等。我说一切所有号称强大的反动派统统不过是纸老虎。原因是他们脱离人民。你看，希特勒是不是纸老虎？希特勒不是被打倒了吗？我也谈到沙皇是纸老虎，中国皇帝是纸老虎，日本帝国主义是纸老虎，你看，都倒了。美帝国主义没有倒，还有原子弹，我看也是要倒的，也是纸老虎。”



★ 1957年，毛泽东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进一步论述了帝国主义是纸老虎的问题。

毛泽东清楚地告诉人们，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人民只要敢于起来斗争，敢于拿起武器，掌握自己国家的命运，就一定能够战胜帝国主义和其他一切反动势力的侵略。

这一时期，毛泽东不断对国内和国际上的人们讲解“纸老虎理论”。

1958年12月，毛泽东在武昌出席中共八届六中全会期间，专门写了一篇文章，题目就叫《关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他在文章中明确作出回答：

“回答帝国主义及一切反动派是不是真老虎的问题。我的回答是，既是真的，又是纸的，这是一个由真变纸的过程的问题。变即转化，真老虎转化为纸老虎，走向反面。一切事物都是如此，不独社会现象而已。我在几年前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战略上藐视它，战术上重视它。”

毛泽东在向人们做解释工作的同时，深刻地阐述了事物的“两重性（即对立统一规律）”。

1973年，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大门已经徐徐开启，美国国务卿兼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博士第五次访华。2月17日晚上，基辛格在拜访毛泽东的时候，问起毛泽东学英语的事：“主席现在正学英文吗？”

毛泽东否认道：“我认识几个英文字母，但不懂文法。”

基辛格微笑着说：“主席发明了一个英文单词。”对此毛泽东立即爽快地承认了：“是的，我发明了一个‘paper-tiger’。”

宾主相视大笑，在场的人忍俊不禁，无不为主席的博大胸怀和机智幽默的谈吐所折服。

毛泽东的“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这个著名论断和“纸老虎”这个极为形象的政治术语，随着毛泽东的智慧和幽默，传遍了国内国际，早已融入正义的人民力量之中。



“在战略上要藐视敌人， 在战术上要重视敌人”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毛泽东：《在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1957年11月18日）

毛泽东的这句名言，与他的那句“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好比孪生兄弟，如影随形。这句话恰恰是对毛泽东关于纸老虎问题的具体解释，或者说是纸老虎问题的对策措施。

1957年11月，毛泽东率中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纪念活动，并参加随后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前途做了乐观的判断，并号召国际社会爱好和平正义、反对侵略压迫的人民加强团结，打击帝国主义的侵略



★ 1957年，毛泽东在莫斯科。

企图。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

“在战略上我们要藐视一切敌人，在战术上我们要重视一切敌人。”

毛泽东这句话的思想内涵由来已久。这不仅是他在长期革命战争中总结出来的一条重要的方法论原则，也是他领导全国人民在各个历史时期反抗一切敌人的真实写照。

★ “战略是‘以一当十’，战术是‘以十当一’”

在战争问题上，毛泽东学会既从战略上藐视敌人，又从战术上重视敌人，那是从大革命时期开始的。

1927年北伐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通过武装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进行革命战争的新时期。这一时期，红军装备很差，物资补给相当困难，并且一开始就处在敌人的虎视眈眈之中，不断遭到敌人的“进剿”和“会剿”。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就成为革命战争能否坚持、红军能否发展壮大关键因素。

面对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毛泽东逐渐在井冈山摸索出一条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道路。在红军的战略上，毛泽东提出：对力量比较强的敌人要采取守势，对力量相对较弱的敌人要采取攻势；在统治阶级政权破裂的时候可以比较地冒进，在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的时期则要相对谨慎。

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初创之时，毛泽东就从战略上明确指出，统治阶级内部早已经是四分五裂，看似强大的敌人实际上困难重重、必然失败，“边界的红旗子始终不倒，不但表示了共产党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统治阶级的破产”；同时，他还从具体战术上做好充分的准备，强调，幼小的红军要尽量避免分散兵力“冒进”，要充分借助群众基础较好、熟悉地形等优势弥补我军在装备和训练上的劣势，集中优势兵力打运动战、歼灭战而不是阵地战、击溃战。在战术上，毛泽东在总结井冈山武装斗争经验的基础上，把红军游击战争的原则概括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即著名的“十六字诀”。这

个战术原则说到底就是在充分重视敌人的实力的基础上避实击虚、趋利避害、灵活机动，尽量“使巧劲”，避免和敌人“硬碰硬”。

对敌我双方形势的清醒判断，对眼前形势和长远趋势的清醒认识，是毛泽东在战略上保持乐观、在战术上保持谨慎的出发点。正是由于坚持了正确的战略战术，到1930年初，红军在短短3年间从无到有，从若干小游击队发展到拥有10多个军、约7万人的部队，先后创建了井冈山、湘鄂西、赣南闽西等10多块革命根据地，星星之火终成燎原之势。

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变化，“左”倾错误逐渐在党的领导集体中蔓延开来，给革命斗争造成了损失。1930年夏，国民党新军阀间爆发了规模空前的中原大战，蒋介石“尽调湘鄂赣诸省驻军开赴津浦、陇海、平汉诸线”，与冯玉祥、阎锡山在中原战场上的总兵中超过100万人，在长达1000多公里的战线上鏖战不休，这个形势在客观上为红军的发展和根据地的扩大创造了有利条件。虽然革命形势有了较大的恢复和发展，红军和根据地也有相当的规模，但是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还远远没有改变。这时党内以李立三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央领导机关取得了统治地位。1930年6月11日，中央政治局通过了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认为“新的革命高潮已经逼近到我们面前”，全国范围内的“直接革命的形势”更是“有极大的可能转变成为全国革命的胜利”。决议案指责了毛泽东的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要求红军“坚决打击敌人的主力”，重点就是直接在主要城市进行武装暴动、夺取政权，进而实现全国革命。

在“取南昌、攻九江”“切断京汉路”“会师武汉、饮马长江”的错误计划之下，各路红军开始向敌人盘踞的中心城市和重要交通线展开进攻。结果数次攻打长沙均未成功，夺取九江和南昌的计划也不得不推迟，皖西苏区几乎全部失陷敌手，转战桂湘鄂三省的红七军和蕲春、黄梅附近的红十五军，浙南的红十四军等都屡遭重大伤亡。反倒是毛泽东和朱德领导的红一军团没有贸然进攻大城市，不但避免了损失还获得了一定的发展。直至1930年9月，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中央机关得到改组，李立三“左”倾错误才得到纠正。

血的教训一再提醒党和人民军队，敌强我弱的形势短时间内不会改变，尽管在长远上看、战略上看反动派进行的反人民、非正义的战争未来必将遭受失



★ 1930年10月，为避免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要红军进攻中心城市可能招致的损失，毛泽东等灵活处理了所属红军的作战行动，率部攻克江西吉安，扩大了赣西南苏区。图为吉安战场旧址。

败，但红军若在战术上不够重视敌人，轻敌、盲动、冒进，依然会在现阶段遭受重大损失，革命的任务就很难完成。这是已经被历史一再证明了的真理。

然而，提高党和人民军队在战略和战术问题的认识，却不是一蹴而就的。自1931年春开始，党中央“左”的错误再次抬头。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看不到敌强我弱的大形势，再次主张夺取中心城市，面对敌人的进攻主张要“御敌于国门之外”，“不让敌人蹂躏一寸苏区”，企图以阵地战配合短促突击去赢得战斗的胜利。1932年，在“左”的错误影响之下，中革军委下达了攻取赣州的命令，决心以此争取革命在江西省首先胜利。毛泽东、周恩来等都表示反对过早地攻打中心城市，但他们的声音没有引起重视，毛泽东反而被不点名地批判为“右倾机会主

义”。在毛泽东向苏区中央局请病假休养后的一个月之中，中央红军在攻城战斗中伤亡达3000多人，赣州城久攻不克，红军处于腹背受敌的窘境，而且丧失了利用当时有利形势发动群众、扩大红军的宝贵机会。中革军委只好紧急电请毛泽东暂停休养，赶赴前线参加决策。

“左”倾错误所导致的失败与此前在毛泽东指挥下红一方面军先后获得胜利的三次反“围剿”形成鲜明对比。历史再次证明，毛泽东所主张的充分准备、诱敌深入、先打弱敌、各个击破的原则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能够变我军的劣势为优势，帮助红军取得战斗的胜利；相反，对形势估计过于乐观、战术上执行盲目的“进攻路线”、对敌人不够重视，就必然遭遇失败。由于毛泽东的正确战略方针在红军中有深刻的影响，在临时中央“左”的错误路线尚未完全渗透到红军中去以前，1933年春的第四次反“围剿”仍然取得了胜利，但随后的第五次反“围剿”就遭到了严重的失败，中央红军被迫开始长征。长征虽然锻炼了革命队伍，但是大量的红军官兵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长征胜利后的”1936年12月，毛泽东对战略和战术问题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和总结，他说：

“‘以一当十，以十当百’，是战略的说法，是对整个战争整个敌我对比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确实是如此。不是对战役和战术而言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决不应如此。无论在反攻或进攻，我们总是集结大力打敌一部。……我们的战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

战略上，我多助而敌寡助、我必胜而敌必败，因而我们应有“以一当十”的乐观精神和革命信心，坚持战略上以少胜多的持久战；但是战术上，我军又必须看到敌强我弱的形势，要有“以十当一”的充分准备和积极稳妥的斗争战术，坚持战役战术上以多胜少的速决战。这实际上已经揭示了战略上要藐视敌人、战术上要重视敌人的斗争原则，也是毛泽东在总结国内革命战争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之后对斗争策略作出的深刻总结。

★战略加战术——真老虎变纸老虎

1946年8月，正值美国向日本投下原子弹一周年，这时的中国刚刚从抗日战争的兵燹中走出来，蒋介石集团又点燃了内战的战火。

面对中国的反动派和国外帝国主义的双重威胁，毛泽东从战略与战术意义上思考起了“纸老虎”与“真老虎”的问题。

8月6日，毛泽东在陕北与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谈话，说出了那句影响世界的名言：“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他说：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在毛泽东看来，包括帝国主义在内的一切反动势力都是对立统一的整体，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们是反人民的，所以必定经不起历史潮流的风吹雨打，是“泥足巨人”“纸老虎”；另一方面，它们暂时又具有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会大量杀伤革命的军民，因而又是“铁老虎”“真老虎”。

毛泽东在这里表达的正是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深刻思想。这既是经过历史检验了的高度抽象化的战争方法论原则，又包含着在战争中的许多具体的、生动的运用。

在毛泽东运用高超的战略战术领导人民军队进行革命斗争的历程中，1947年转战陕北堪称这方面的经典战例。这是一场把真老虎变成纸老虎的历史活剧。

1946年6月，蒋介石悍然撕毁和平协定，对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然而从这年7月开始的半年时间中，国民党军损失了惊人的71万余人，其中大部分是被解放军俘虏或者不愿打内战、打同胞而主动放下武器的。蒋介石后来回忆说：“我们在后方和交通要点上，不但要处处设防，而且每一处设防必须布置一团以上的兵力，我们的兵力就都被分散，我们的军队都成呆兵，而匪军却时时可以集中主力……将我们各个破击”，结果就是“占地愈多，则兵力愈分”，处

处受到牵制，于是处处被动挨打。

从1947年3月起，蒋介石被迫放弃全面进攻，集中94个旅的兵力重点进攻陕北、山东两个解放区。陕北方面，蒋介石集结了34个旅25万人的兵力，企图一举占领党中央所在地延安。胡宗南在山西、陇海铁路沿线以及从西安到兰州的公路附近抽调了大多数部队，蒋介石本人也亲自飞到西安“督战”，要求对陕北“犁庭扫穴，切实攻占”。

毛泽东早在数月之前就判断蒋介石必将进攻延安，并且意识到一旦蒋介石攻陷延安，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士气将会受到很大影响。延安不能不保，但是又不能死保，因为陕北战场上我军只有不到3万人的兵力，且装备远逊于敌军，和敌人硬碰硬显然是不明智的。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经过研究，决定主动撤离延安，诱敌深入，利用陕北有利的地形条件和良好的群众基础和敌人做长期周旋。

撤离延安的决定传到解放区各界，很多人既失望又迷惑：放弃经营10年的红色首都，革命还怎么继续下去呢？毛泽东这时又从战略和战术两个方面耐心地说服党员干部和解放区军民：

“在战略上看，蒋介石企图一举攻破延安，与解放军决战，这丝毫不表明国民党的强力，恰恰说明国民党在军事、政治、经济陷入困境中的‘孤注一掷’，‘带着慌乱精神’；蒋介石的‘阿Q’精神十足，以为占领延安就取得了胜利，而事实恰恰相反，占领延安他就失去了一切，不仅他背信弃义的面目昭然若揭，而且在战略上也会陷于被动，只是加速他的失败而已。

而在战术上看，我们又必须高度重视敌人强大的军事实力，主动放弃延安恰恰是为了保存有生力量打击敌人。”

毛泽东担心同志们不理解，又用通俗的语言解释道：

“譬如有一人，背个很重的包袱，包袱里尽是金银财宝，碰见了个拦路打劫的强盗，要抢他的财宝。这个人该怎么办呢？如果他舍不

得暂时扔下包袱，他的手脚很不灵便，跟强盗打起来，就会打不赢，要是被强盗打死，金银财宝也就丢了。反过来，如果他把包袱一扔，轻装上阵，那就动作灵活，能使出全身武艺跟强盗对拼，不但能把强盗打退，还可能把强盗打死，最后也就保住了金银财宝。我们暂时放弃延安，就是把包袱让给敌人背上，使自己打起仗来更主动，更灵活，这样就能大量消灭敌人，到了一定的时机再举行反攻，延安就会重新回到我们的手里。”

1947年3月13日，胡宗南发起进攻。为了加强攻势，国民党军从上海、徐州调集作战飞机70余架进行轰炸，第一天就投下了近60吨炸弹。彭德怀率领部队担负阻击敌人、掩护干部群众撤离的任务。3月19日，中共中央撤离延安，留给胡宗南的几乎是一座空城。

胡宗南占领延安，蒋介石集团大肆授奖庆功，此时他们不可能想到，毛泽东、周恩来等早已经为他们“量身定做”了一份大礼。3月21日，骄横的胡宗南部以5个旅的兵力由延安开始向安塞方向急进，行军数日寻歼我军，殊不知正好撞进解放军在狭长险峻的青化砭地区设置的口袋形伏击圈。我军见时机成熟，立即收紧“口袋”，仅仅用时1小时47分就快速结束战斗，全歼敌三十一旅旅部和九十二团近3000人，生擒旅长李纪云，取得了撤离延安之后的第一个胜利。

青化砭战斗失利，遭受当头一棒的胡宗南不甘心失败，继续寻找我军主力。而这时毛泽东却率领队伍钻入延安、子长、清涧、延川之间的山沟里，发挥隐蔽精干、灵活机动的特长，拖着十几万大军的胡宗南在陕北的高坡深沟之间大规模迂回、包抄。离敌人最近的时候，解放军与敌人竟只隔着一道山梁，真正是从敌人的“眼皮底下”灵活机动。国民党军困厄不堪之时，遭到我军在羊马河地区的痛击：我军以4个旅的优势兵力在8小时内全歼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第一三五旅4700余人，打了第二个集中兵力、“以十当一”的漂亮的歼灭战。羞愤不已的胡宗南也不得不承认，自己指挥的部队简直是在“游行”，携带给养也即将耗尽，士气颓败。气急败坏的蒋介石命令胡宗南继续北上歼敌。但当他

们行军半个月终于占领解放军“留给”他们的空城绥德之时，却陡然听说解放军已经声东击西，攻克了国民党军的补给重地蟠龙镇，并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取得了陕北战局的转折性胜利。待胡宗南紧急回防蟠龙之时，解放军早已迅速转入隐蔽休整。

转战陕北堪称解放军以弱胜强的战争佳话，毛泽东指挥人民军队用一个接一个谨慎周密的胜利把反动派这只“铁老虎”打回了“纸老虎”的原形。

毛泽东之所以暂时撤离延安，就是因为我军坚信必胜，有着“以一当十”藐视敌人的战略，而不钻牛角尖、不计较一城一地之得失；之所以始终灵活机动、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又正是因为我军在战术上重视敌人，“以十当一”、扬长避短，善于把战略与战术巧妙地结合起来。

★战略和战术有机结合的辩证法

既“以一当十”又“以十当一”，战略上藐视和战术上重视，这是毛泽东教会人民解放军指战员的伟大的辩证法，它不仅指导着中国人民争取了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而且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仍然引领着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压迫，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

1950年，以美军为首的所谓“联合国军”在朝鲜半岛掀起战事。这年10月上旬开始，美军向北越过三八线，其空军不顾我国警告袭扰我国边境城市，将战火烧到中国家门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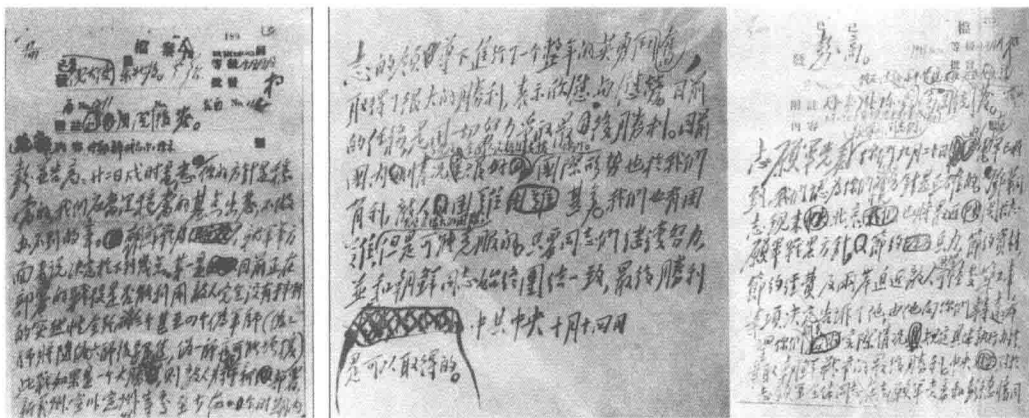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则刚刚从近百年的战乱中走出来。1950年，中国的工业产值居世界第26位，还不及西班牙、葡萄牙等西方小国；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钢产量、发电量和原油产量等关键指标与美国差距之大令人咋舌，军事实力差距更是全方位的。毫不夸张地讲，最强大的国家在一个积贫积弱100余年的大国的家门口，用压倒性的军事力量打一场局部战争，这在世界军事史上也绝无仅有。

面对强敌压境，毛泽东冷静分析了国际形势和战场态势。他认为，如果一味妥协，则美国侵略者将更加猖獗，严重威胁我国安全，国际范围内的革命力量将遭受进一步损失；而参战后若能集中兵力消灭敌军的几个师、团，战场态

势就会发生对我方有利的变化。既然一场恶战难以避免，与其消极被动地被“拖”入战争，不如正面地应对它：

“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毛泽东判断，“应当参战，必须参战，参战利益极大，不参战损失极大”。1950年10月初，毛泽东命令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他从战略的高度乐观地勉励战士们：“目前总的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于我们有利，于侵略者不利，只要同志们坚决勇敢，善于团结当地人民，善于和侵略者作战，最后胜利就是我们的！”



★ 1950年10月至1951年10月，毛泽东亲自起草签发了指导抗美援朝战争的电报上百件。图为其中的两件。

这个命令下达之后仅仅过了一个多星期，年轻的人民军队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出国门，秘密投入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正义战斗。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发出气壮山河的呼声：美国鬼子也不是什么三头六臂，纸老虎当真老虎打，打他个人仰马翻！

此时的美军仍然认为刚从战火中走出的中国不敢出兵，他们摸不清虚实，还在快速北进。根据这种情况，毛泽东作出了诱敌深入、打歼灭战的决策。1950

年10月23日，毛泽东在给前线指挥员彭德怀、邓华的电报中说：“速令四十军主力即在温井地区隐蔽集结，以一部控制熙川，不要去云山、宁边与敌过早接触……诱敌深入，利于歼击。”次日，毛泽东又指示部队等待战机，待敌军进入山地、不便发挥其重装备优势时再予以坚决打击。

就这样，志愿军秘密地在朝鲜的云山地区一带完成了三面包围。北上的敌军先头部队是南朝鲜的3个师，战斗力相比美军稍弱。毛泽东指示志愿军先打弱敌，于是这3个师先后遭到志愿军的迎头痛击，他们仓皇撤退后告诫美军不要贸然进攻。但骄横的美军自恃装备精良、训练有素，派出了有百年历史、号称从未打过败仗的第一骑兵师，企图一举击溃志愿军，把战线推向中朝边境。

名叫“骑兵师”是因为这支高度机械化的部队建立之初曾是骑兵，部队标志上高昂的马头在美军中享有极高的知名度。谁知，赫赫有名的“美骑一师”派出先头部队第八骑兵团刚开始进军，就进入志愿军的打击范围。11月1日傍晚时分，志愿军对这个团发动了打击。被美军将领讽刺为“没有汽车就不会行军”的美国大兵面对志愿军猛烈的近战攻势措手不及，旋即溃败。据参加过这次战斗的美军人员事后回忆，中国军队发起冲锋的时候，“仿佛从天而降”，顿时漫山遍野都是中国人，仿佛感觉“整座山都在涌动”。赶来救援的第五骑兵团企图掩护友军撤退，结果与志愿军一交手就阵亡400余人，指挥官约翰逊上校也被志愿军的炮弹炸成重伤，不得不退出战斗。“美骑一师”的指挥官霍伯特·盖伊少将二战期间曾做过威震欧洲的巴顿将军的参谋长，在美军中也堪称虎将，这时却发现一切救援是徒劳的，不得不痛苦地放弃增兵。重重围困中的第八骑兵团多次试图突围均告失败，最终溃不成军，几乎全军覆没。

从未败绩的“美骑一师”在云山遭遇当头一棒，极大地震撼了美国国内乃至整个西方世界，而“云山大捷”的消息传回国内则引起举国振奋。应当说，战略上对敌人的藐视和对胜利前途的坚定信念，战术上的高度重视、周密部署和扬长避短是这次战斗胜利的根本保障。

纵观抗美援朝战争全貌，毛泽东有关战略上藐视敌人和战术上重视敌人的战略思想和作战原则，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云山大捷”仅仅是以此取胜的一个小小的战例。志愿军入朝作战之后的一年多时间里，毛泽东为指导志愿军作战起草的电报、命令和其他文件多达近200件，有时甚至是一日之内数封电报。从



★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首战告捷，和朝鲜人民军配合，在云山一带歼敌1.5万余人，解放了清川江以北大片土地，挫败了敌人在感恩节占领全朝鲜的狂妄计划。图为云山战斗中被我俘虏的美军官兵。

这些电报中可以看出，大到进攻的大方向、政治工作的原则，小到某次具体战斗中的兵力配属乃至作战公报以什么名义发出，毛泽东都做过详尽的研究，与前线指挥员保持了密切的沟通。秘密入朝、出敌不意；先打弱敌、确保首战必胜；充分发挥我军轻装、快速的优势；先诱敌深入再集中兵力打歼灭战……终于把美军打回了“三八线”以南，打到了谈判桌前。

在本文开头提到的那次大会上，毛泽东发表讲话，不禁回忆起抗美援朝战争的峥嵘岁月。他说：

在开始的时候，美国一个师有八百门炮，中国志愿军三个师才有五十多门炮。但是一打就像赶鸭子一样，几个星期就把美国人赶了几

百公里，从鸭绿江赶到三八线以南去了。后来双方同意讲和，最早谈判地点在开城，结果美国人每天开会得打着白旗子来，开完会打着白旗子回去。后来，他们感到不好意思，双方改在板门店谈判。美国总是不甘心签字，拖到一九五三年，志愿军在三八线上突破了二十一公里的防线，美国人吓倒了，马上签字。那么厉害、有那么多钢的美国人，也只得如此。

这段谈话生动地描述了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这个经典法则的强大威力。

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早已成为并始终是我们党和军队对付一切敌人的伟大思想武器。



毛泽东

MAO
ZEDONG



讲对待俘虏

“优待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办法”



“优待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 极有效办法”



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办法

——毛泽东：《中国共产党红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1929年12月）

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毛泽东：《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1947年12月25日）

据记载，1960年5月，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华访问时，谈到了有关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俘虏政策问题。他在参加周恩来总理设的晚宴上，与陈毅外长和原国民党将领杜聿明留下了一段关于淮海战役的对话。关于这次对话的内容，有一种版本说，杜聿明对蒙帅讲，在淮海线战役期间，我“送给”了陈毅元帅100万部队；有一种版本则说，杜聿明当时讲，我的部队是“自己跑到”了陈毅元帅那里去的。由于周恩来年谱、陈毅年谱等官方版本对此事均未作详细叙述，无法断言哪种版本更准确，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杜聿明作为亲历者讲出了一个发生在解放战争期间的真实历史奇迹，人民群众也对这一奇迹作了幽默的概括：“国民党抓兵是为共产党扩军。”

“优待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办法”

据相关党史研究者考证，解放战争期间，被称作“解放战士”的国民党俘虏兵，成为人民解放军各大野战军的主要补充兵源。

先看中原野战军，邓小平1948年在谈到中原野战军前方部队的构成时曾说过，“大约百分之七十是解放战士”。延至1949年7月，中原野战军前委在向中央军委的报告中也反映了部队的构成情况：“部队在去年淮海战役后，本来俘虏成分就普遍达百分之六十左右。现在则普遍的已达百分之八十左右。”

其他各大野战军的兵员构成，由国民党俘虏转化来的解放战士也同样占了很高比例。

1948年初，陈毅在总结华东野战军的兵员补充情况时，认为“我们补兵员十分之三是翻身农民，十分之七是解放战士。”他还谈及西北野战军的情况：“西北野战军一年多没有补充解放区参军的新兵，主要是吸收解放战士，现在部队中解放战士成分也占到百分之七十到八十。”

1948年，罗荣桓在谈到东北野战军的情况时，曾说过“争取解放战士不够，研究经验、方法不够”。到当年9月“俘虏成分一般已占百分之十”，为各野战军中最低。但是辽沈战役后，东北部队的兵员成分也发生巨变，以著名的“旋风部队”三纵为例，辽沈战役结束后，一般连队解放战士占54%左右，有的连队甚至高达60%。

这一堪称人类战争史上最辉煌之历史奇迹的创



★ 红军写的优待俘虏的标语。

造，源于我军对毛泽东优待俘虏政策的贯彻落实，而要准确客观地了解解放战士群体的来龙去脉，只能从红军时代说起。

★ “飞将军自重霄人”

1929年9月1日，陈毅在《关于朱毛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中汇报了朱毛红军的俘虏政策：

欢送俘虏。在与敌人作战得许多俘虏兵，则公开征求同意，如他们愿在红军则马上补名字，如不愿在红军则开欢送会，每人发一二元旅费，由兵士代表致欢送词，希望他觉悟，归田去打土豪，不用再当兵，不要再来打工农和红军。敌人的伤兵，则上好药，发了钱，派人宣传，又请他带了大批传单，雇农友抬到敌人区域附近去，敌人得着大批俘虏伤兵回去，只有气得没有办法。因为这些人蒙红军不杀之恩，深深觉得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他自己的军队，跑了回去必然要交头接耳谈红军如何如何好，反动军官诬蔑红军共产党的宣传不攻自破。这是一个兵运的好方法。

3个月后，毛泽东在为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写的《决议案》中，明确提出：

“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

毛泽东提到的“优待俘虏兵的方法”主要有四种：

第一是不搜检他们身上的钱和一切物件，过去红军士兵搜检俘虏兵财物的行为要坚决地废掉。

第二是要以极大的热情欢迎俘虏兵，使他们感觉得精神上的欢乐，反对给俘虏兵以任何言语上的或行动上的侮辱。

“优待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办法”

第三是给俘虏兵以和老兵一样的物质上的平等待遇。

第四是不愿留的，在经过宣传之后，发给路费放他们回去，使他们在白军中散布红军的影响，反对只贪兵多把不愿留的分子勉强地留下来。

毛泽东还说，以上各项，对于俘虏过来的官长，除特殊情况外，完全适用。不仅如此，对敌方的伤兵，毛泽东也提出了处理办法：

医治敌方伤兵，亦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对于敌方伤兵的医治和发钱要完全和红军的伤兵一样，并且要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把上好了药发给了钱的伤兵送返敌军。对待敌方受伤官长亦然。

根据毛泽东和陈毅的叙述，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优待俘虏肇始于红军时期的优待俘虏政策，产生于斗争实践中的宣传和兵运工作。提出和践行这一政策，主要目的有二：一是尽量动员俘虏参加我军；二是利用俘虏宣传我党我军的各项政策主张，以达瓦解敌军之效。

实行优待俘虏政策所取得的宣传效果奇佳，瓦解敌军的效果更佳，这一点，毛泽东早在1928年11月给中央的报告中汇报“井冈山的斗争”时就谈到过：

新来的俘虏兵，他们感觉国民党军队和我们军队是两个世界。他们虽然感觉红军的物质生活不如白军，但是精神得到了解放。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红军像一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

“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毛泽东这里讲



★ 根据俘虏政策和革命的人道主义，八路军医务人员给被俘敌军治疗战伤。

的，就是红军改造俘虏、转变俘虏的奇效，就是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一个重要区别。

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开始，毛泽东关于“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办法”的这一思想，始终在人民军队中得到贯彻。由于执行优待俘虏政策和军内民主生活制度，大批来自敌军的俘虏加入我军，并在革命军队这个大熔炉中实现脱胎

换骨式的根本转变，他们中的大部分在战火中经历生死考验，成长为坚定的革命战士，很多人还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生命。

1930年12月，在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王诤等10余名原国民党军的无线电报务、机务人员成了红军俘虏，并在我军政策的感召下自愿参加红军，帮助红军筹建无线电通信队。毛泽东亲自接见了王诤等人，任命他担任新成立的红军第一个无线电队的队长。王诤等不负厚望，不仅沟通了苏区与上海党中央的无线电通信联系，还为红军创办无线电训练班，培养了一批通信骨干。

1931年5月15日，王诤和通信队的同志用日夜不停轮流监听的办法，截获了敌二十八师公秉藩部发给该师驻吉安留守处的明码电报，及时掌握了国民党“围剿”军的动态。获得这一重要情报的毛泽东迅速

作出决断，依据战场态势的变化指挥隐蔽多日的红军果断出击，在短短15天时间里，连续打了5个大胜仗，横扫700里，歼敌3万余人，缴枪2万支，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伟大胜利。此时，解放战士王诤参加红军的时间还不到半年。

指挥红军取得辉煌胜利的毛泽东挥毫赋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
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一句“飞将军自重霄入”颇值得玩味，很多研究者认为飞将军指的是黄公略，那么“重霄入”呢？我们可以推测作者此词中的部分深意，也许是在保守军事秘密的同时巧妙地表扬王诤和通信队的同志吧。这才有最后一句中嘲笑盲人瞎马的国民党军士兵：为营步步嗟何及。

第三次“围剿”，蒋介石亲率30万大军铺天盖地而来。这次蒋介石吸取了教训，严令部下使用密码通讯，而且密码本必须一天一换。但是，国民党军就那么几本密码，前两次反“围剿”作战，红军已缴去不少，而且红军中已经有了俘虏过来的原国民党军译电员。

1931年7月23日下午4时，红三军报务员曹丹辉截获了一份敌台通信，当天即破译了出来，是何应钦电台发出的蒋介石给各路国民党军的“限10天扑灭共匪”命令。这命令很快经黄公略转送毛泽东、朱德。

蒋介石的德国军事顾问塞克特将军费尽心血制订出来的“分进合击”方案，就这样一览无余地暴露在毛泽东面前。

后来，有党史研究者考证出一个“三块银元”趣闻：

第三次反“围剿”以三战三捷大获全胜后，毛泽东高兴地大喊：“胡公侠！胡公侠！”（毛泽东身边的作战参谋）“去把红三军的报务员曹丹辉同志请来，我要重重地奖赏他！”

曹丹辉来了，毛泽东拉住这位红军自己培养的无线电报务员激动地说：“我毛泽东得好好地感谢你，你截获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的胜利很有帮助啊！”

临别，毛泽东写了个条子交给胡公侠说：“你告诉副官处，奖3块钱给他买只鸡吃。”

“蒋介石送了你毛总政委近10个团，你毛总政委才‘重赏’3块钱，太小家子气了吧！”朱德在一旁打趣道。

“不少哦，我一个月的生活费还没有这么多呢！”毛泽东说完便爽朗地大笑起来。

从此，“三块银元”的故事便在无线电通信部队和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中流传下来。

优待俘虏争取来王净，王净带出了曹丹辉等一批优秀无线电技术人才，他们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国民党军官兵弃暗投明的奥妙

到了中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毛泽东在总结“十大军事原则”的时候，把人民军队的俘虏政策也写入其中，即第九条原则：“以俘获敌人的全部武器和大部人员，补充自己。我军人力物力的来源，主要在前线。”

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也就有了大批的“解放战士”，即“被人民解放军俘虏而从国民党反动军队中解放出来、经过教育、参加人民解放军的原国民党军士兵”。国民党军的官兵数以百千计地甚至成建制地弃暗投明，原因何在？

让我们看看东北战场的情况，就会明白其中的奥妙。

1946年5月，我东北民主联军在第二次四平作战时失利，被迫撤出大城市，转移到只有4座贫瘠县城的南满根据地，补给极为困难，条件极艰苦。这时，有极少数干部战士的革命信念发生了动摇。三纵某连的连长带枪当了逃兵，连队中的一些当过国民党兵的人乘机大肆活动，煽动“穷八路”不如“正

牌军”的言论。

这个连的问题，主要出在对原国民党兵的思想改造没有跟上。为此，上级领导派了一个军政双优的干部赵绪珍同志来担任指导员。

这天，集合点名，赵指导员带大家唱了一首歌：

谁养活谁呀？大家来看一看。
没有咱劳动，粮食不会往外钻；
耕种锄割全是咱们下力干，
五更起，半夜眠，一粒粮食一粒汗。
地主不劳动。粮食堆成山。

……

唱歌的战士没觉出什么，在一旁听的老乡却觉出味了：这歌唱到咱心里去了。第二天政治学习，指导员赵绪珍把房东张大爷请到了台上，老人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遭受的种种悲惨经历，全连战士都哭了。

听完老人的诉苦，政治思想极反动、且生活作风不检点还打骂副连长的王福民放声大哭：俺也是个穷小子啊，却盼蒋介石来，要干“正牌”，蒋介石来了还有穷人的好！过去瞎了眼，现在心里亮堂了，俺王福民生是共产党的人，死是共产党的鬼。

王福民后来先后5次负伤（两次重伤）不下火线，后在大北岔战斗中牺牲，牺牲前拉着赵绪珍的手要求入党，后来被追认为中共党员。

对诉苦教育感触最深的那些“解放战士”。他们被俘虏过来后，接受的第一课就是诉苦教育，让解放战士经过诉苦挖根，明确谁养活谁的道理，树立要为谁当兵、为谁打仗的思想。后来一些老百姓笑谈：国民党抓的兵，后来成了共产党的兵，这是在为共产党扩军。这个裂变，这个催化剂就是诉苦教育。

这个连的诉苦经验报至纵队，后来又汇报到南满分局书记兼军区政委陈云处，引起高度重视。

据陈云年谱记载：1947年6月，陈云在辽东军区师以上军政干部会议上听取了有关三纵诉苦经验的汇报，立即予以肯定。9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总政



★ 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米脂县杨家沟召开会议。图为毛泽东与陆定一（左二）、徐特立（左九）、陈绍禹（右四）等在杨家沟。

治部向中央军委上报了这一经验，毛泽东对东北民主联军总政治部的报告作了修改后，批转全军推广，对部队建设起了巨大推进作用。

★ “发展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辽沈战役期间，东北野战军在解放长春后火速将投诚过来的国民党王牌部队新一军新三十八师两个炮兵连调往锦州。炮是原炮，炮兵也是原先的国民党军炮兵，就是炮口掉转了方向。新一军本是国民党的天下第一军，新三十八师更是王牌中的王牌，却在短短

几个小时的时间里就改变了立场，原因何在？那些解放战士回答：一场诉苦会下来，军装还没换，心就已经是共产党的了。

这样的转变，处处在进行。比如，部队行军路上没时间开诉苦会，就一起聊家常，你家在哪儿？村里有地主吗？地主吃什么？你家里吃什么？地主干活吗？半天行军下来，一个国民党军转过来的解放战士便基本上被感化，认为自己是人民军队中的一员了。

士兵来自人民，而且主要来自于最苦最累的农民。农民出身的毛泽东，是广大农民群众的真正知心人，知道用什么办法能够打开农民群众的心扉。早在1934年1月的中央苏区时期，他就曾经讲过：

如果我们单单动员人民进行战争，一点别的工作也不做，能不能达到战胜敌人的目的呢？当然不能。我们要胜利，一定还要做很多的工作。领导农民的土地斗争，分土地给农民；提高农民的劳动热情，增加农业生产；保障工人的利益；建立合作社；发展对外贸易；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婚姻问题。总之，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同志们，那时候，我们号召群众参加革命战争，能够不能够呢？能够的，完全能够的。

这就是说，一切从群众实际出发，就是我们党和人民军队“应当注意的问题”。注意了这些问题，人民群众就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那些被国民党抓壮丁的群众，才义无反顾地选择掉转枪口炮口，创造了“国民党抓兵是为共产党扩军”的历史奇迹。

由于采取了毛泽东所提倡的古今中外少见的俘虏政策，人民军队的发展出乎人们的预料。

随着解放战争局势的迅速发展，人民解放军各部的兵源问题都提到重要议事日程，对此，毛泽东作了明确指示。1948年7月17日，他在致刘伯承、邓小

平、陈毅等人并转各中央局的电报中说：

你们补兵补枪问题，当从太原夺取后通盘解决，主要是俘虏兵。

各区扩兵（包括东北在内）均已至饱和点。支前供应和后方可能性之间发生极大矛盾，此项矛盾如不解决，则不能支持长期战争。故今年后方原则上不应扩兵，明年是否扩一点兵，还要看情形才能决定。今后前线兵源全部依靠俘虏及某些地方部队之升格，你们及各军对此应有精神准备。

今后攻城野战所获俘虏可能大为增加，各区及各军应用大力组织俘虏训练工作，原则上一个不放，大部补充我军，一部参加后方生产，不使一人不得其用。我军战胜蒋介石的人力资源，主要依靠俘虏，此点应提起全党注意。

毛泽东指示除“主要依靠俘虏”外，各部要谨慎扩兵。正是俘虏政策的英明，使人民解放军壮大的速度出人意料。

1949年4月，周恩来与当时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张治中作了一次重要谈话，提到了解放战士这个光荣伟大的英雄群体。后来他又向前往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新政治协商会议的部分爱国民主人士、北平一些大学教授作报告，专门讲到了毛泽东最早提出的俘虏政策的威力：

“我们的人民解放军壮大了。两年零九个月以前，人民解放军是一百二十万人，现在则发展到四百万人以上，并且大部分都美械化了。美帝国主义给了我们许多装备（当然，这是用不着打收条的），蒋介石做了很好的运输大队长。我们的战士有很大部分是俘虏过来的，称为解放战士，有的部队，解放战士竟占百分之八十，少的也占百分之五十至六十，平均约占百分之六十五至七十。”

讲到我们是怎么改造俘虏的，周恩来欣喜地说起毛泽东早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的政策：

对于俘虏，我们实行即俘、即查、即补、即训、即打的办法，就是说士兵一俘虏过来就补充到部队，经过诉苦教育，就参加作战。在打黄百韬时，情形竟发展到上午的俘虏下午就参加作战。当时的解放战士现在有许多已经做了排长、连长。这种情形是世界战史上所少有的，若没有高度的政治训练是不可能的。今天我们部队民主化程度之高，连我们指挥的人都没有想到。虽然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时期就提出了在部队中建立民主集中制的制度，但今天的发展的确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

同样是一个兵，当他站在人民一边的时候，战斗力就迅速提高；同样是中国军队，只有站在人民一边的军队，才能创造人间奇迹。无论是中国的秦皇汉武，还是外国的拿破仑、克劳塞维茨，都不曾在军事文献中给后人留下这样的故事，更未能创造三年解放战争这样以敌军俘虏为主要依靠的人力资源的战争奇迹。毛泽东为何能创造出这样的战争奇迹？因为毛泽东和人民站在了一起，或者，更为确切的描述应该是人民和毛泽东站在了一起，人民选择了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

据称，一直到败退台湾前夕，蒋介石仍不服气：我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我是被国民党打倒的！

他其实是被人民打倒的。



毛泽东

MAO
ZEDONG



讲反帝反霸反侵略

持久抗战“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



持久抗战 “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

1938年五六月间，毛泽东以“论持久战”为题，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历时九天的讲演。最后，他明确得出这样的结论，气势如虹，掷地有声：无论在什么条件下，只要坚持持久抗战，结果都是一样的，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讲演围绕着“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与最后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怎样进行持久战与怎样争取最后胜利？”共讲了21个问题。结束时，毛泽东郑重而谦虚地表示：

“我的讲演至此为止。伟大的抗日战争正在开展，很多人希望总结经验，以便争取全部的胜利。我所说的，只是十个月经验中的一般的东西，也算一个总结吧。这个问题值得引起广大的注意和讨论，我所说的只是一个概论，希望诸位研究讨论，给以指正和补充。”

实际上，毛泽东对此已有长时间的思考和研究，特别是对全面抗战10个月以来战争形势的观察和思考。毛泽东“一贯估计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早在1936

年7月至9月间，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进行系列谈话时，就已提出坚持持久抗战的各项方针，并肯定地说：战争的结果，日本必败，中国必胜。

抗战初期，当中国军队连连失利时，毛泽东始终认为：“最后胜负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在此期间，他又连续近10天，在延安窑洞里昼夜不息，写出了这篇长达5万多字的《论持久战》讲演稿。在民族危亡的关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为抗战的前途而求索，为民族解放而谋划。

★面对“亡国论”“速胜论”等民族之虑，亟待释疑

“百万倭奴压海陬，神州沉陆使人愁。”

叶剑英元帅在《重读毛主席〈论持久战〉》一诗中，曾对当时的形势如此描绘。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挑起卢沟桥事变，悍然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日本政府企图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准备3个月灭亡中国。面对日军的侵略行径，中国人民奋起抵抗，开始伟大的全国抗日战争。7月8日，即卢沟桥事变的第二天，中共中央即发表宣言通电全国，号召人民奋起抗战：

“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

同一天，毛泽东领衔的诸红军将领还致电蒋介石表示：

“红军将士，咸愿在委员长领导之下，为国效命，与敌周旋，以达保土卫国之目的。”

接着，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前往庐山会见蒋介石，共商抗日救国大计。7月15日，中共代表团向蒋介石提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重申中国共产党和红军愿在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与解放、实行民主政治、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目标下，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并待命出征。

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组织和影响下，全国各民族、各界人民、抗日救国团体积极行动起来，抗日御侮。

卢沟桥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也提出了“不屈服、不扩大”和“不求战，必抗战”的方针。一方面在军事上进行部署，准备应战；另一方面又急欲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期事件之早日和平解决”。同时，还把希望寄予列强的干涉上。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谋求和平的行动事与愿违。几次与日本政府直接交涉均遭拒绝，希望他国居中调停也均遭婉拒。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被迫宣布应战。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确定了准备对日抗战的方针。23日，毛泽东在《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一文中，曾对此给予积极评价，认为这“为国民党多年以来在对外问题上的第一次正确的宣言，因此，受到了我们和全国同胞的欢迎”。并提出主张坚决抗日，反对妥协退让的方针。蒋介石的谈话虽然表明了国民政府抗战的态度，但其依赖外力、和平解决事变的幻想并未泯灭。

然而，日本为实现其速战速决的方针，迅速向华北增兵。7月底，北平、天津相继陷落。日军以主力向华北展开战略进攻的同时，又分兵一部进攻上海，直接威胁国民政府首都南京。在这种形势下，国共合作抗日的谈判才有了实质性进展。

7月底至8月初，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等先后拟订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出对抗日的国防问题的意见。

在中共中央的提案中，正确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敌非正义寡助，我正义多助等基本特点，系统地阐述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指出：“我国抗战战略之基本方针是防御的、持久的战争，在长期艰苦英勇牺牲的战争中求得胜利，也必定能胜利。”“在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8月1日，毛泽东收到蒋介石邀请中共派代表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的电报，中共决定派周恩来、朱德、叶剑英出席。为了推动和促进全国抗战路线及战略方针的制定，4日，毛泽东与张闻天在延安商讨对国防问题的意见，并电告周恩来等人，明确提出：

“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防御。”

“正规战与游击战相配合，游击战以红军与其他适宜部队及人民武装担任之，在整个战略部署下给予独立自主的指挥权。”

“发动人民的武装自卫战，是保证军队作战胜利的中心一环，对此方针游移是必败之道。”

8月11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在南京国防会议上，提出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方案，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共产党对全国抗战路线和战略方针的一贯主张。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要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并强调只有动员全国军民方可取得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关于国防问题的意见和战略方针、作战原则案，对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制定全国抗战方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南京国防会议确定实行“持久消耗战”战略。20日，国民政府以大本营的训令颁发了《战争指导方案》，正式确定“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基本主旨”，消耗敌人力量的战略，并将沿海和临战地区划为5个战区。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但国民党持久战战略，主要是根据中国幅员广大，人口众多，可以支持长期战争。其争取持久战的目的，主要不是通过自己的积极作战，改变敌我力量总的对比，以达到最后战胜敌人，而是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形势的有利变化，依靠国际力量形成对敌优势，最后取得胜利。

为推动全国抗战的顺利发展，中共中央于8月22日至25日在洛川召开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军事问题和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他说，中国抗战存在着两种政策和两个前途，即我们的全面的全民族抗战的政策和国民党的单纯政府抗战的政策，坚持抗战到胜利的前途和大分裂、大叛变的前途。我们的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最基本的方针是持久战。会议深入分析了中日战争敌强我弱的形势，明确指出抗日战争的艰苦性和持久性，正式确定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

随后，国共两党关于发表合作宣言的谈判取得进展。9月22日，国民党通



★ 1937年8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后举行抗日誓师大会。

过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标志着国共两党合作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正式形成。28日，蒋介石任命北伐名将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此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中华大地呈现出全民族抗战的热潮。国民党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形成两个战场夹击日军的战略态势；各种形式的抗日救亡斗争在全国展开。

抗战初期，面对日军的大举进攻，虽然正面战场的中国军队奋起抵抗，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但很快，太原、上海、南京等重要城市相继沦陷。特别是日军在南京疯狂屠城，在40多天的时间里屠杀我同胞30多万人。1938年5月19日，日军又攻占徐州。侵略者骄横不可一世，下一个目标直指武汉。

这时抗日战争已进行了整整10个月，饱受战争之苦的中国人民天天在渴望战争早日胜利。然而，战争的过程究竟会怎么样？中国能不能取得胜利？怎样才能取得胜利？对这些问题，许多人还没有找到正确的答案。“亡国论”“速胜论”等错误观点仍在到处流传。种种困扰人们思想的问题需要回答，如久旱之望云霓。

抗战爆发前，国民党营垒内就一直有人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开始后，又出现“再战必亡”的论调。身任国民党副总裁的亲日派汪精卫是他们中突出的代表。这种悲观情绪也影响到中间阶层和一部分劳动人民。毛泽东举了这样一个例子，说家乡的一个青年学生从湖南乡下写信给他，诉说心中的苦闷：“在乡下一切都感到困难。单独一个人做宣传工作，只好随时随地找人谈话。对象都不是无知无识的愚民，他们多少也懂得一点，他们对我的谈话很有兴趣。可是碰了我那几位亲戚，他们总说：‘中国打不胜，会亡。’讨厌极了。”

“速胜论”的观点也有相当市场。国民党中有一部分人幻想依靠外援来迅速取胜。淞沪会战时有人提出：只要打3个月，国际局势一定会发生变化，战争就可解决。台儿庄一战取胜后，《大公报》又鼓吹徐州战役是“准决战”。这种盲目乐观的轻敌思想也出现在共产党内，一些人把抗战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的200万正规军上，急于打大仗，对战争的长期性和艰苦性缺乏精神准备。

这些问题如果不能得到解决，对坚持长期抗战是十分不利的。毛泽东认为，我们一向都说这些议论是不对的。可是我们说的，还没有为大多数人所了解。一半因为我们的宣传解释工作还不够，一半也因为客观事态的发展还没有暴露其固有的性质，使人们无从看出其整个的趋势和前途。

其实，这种答疑释惑的解释工作，毛泽东早就开始做了。前面提到的在与斯诺的谈话中，就有这么一段对话：

斯诺问：在什么条件下，中国能战胜并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呢？

毛泽东答：要有三个条件：第一是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二是国际抗日统一战线的完成；第三是日本国内人民和日本殖民地人民的革命运动的兴起。就中国人民的立场来说，三个条件中，中国人民的大联合是主要的。

问：你想，这个战争要延长多久呢？

答：要看中国抗日统一战线的实力和中日两国其他许多决定的因素如何而定。即是说，除了主要地看中国自己的力量之外，国际间所给中国的援助和日本国内革命的援助也很有关系。如果中国抗日统一战线有力地发展起来，横的方面和纵的方面都有效地组织起来，如果认清日本帝国主义威胁他们自己利益的各国政府和各国人民能给中国以必要的援助，如果日本的革命起来得快，则这次战争将迅速结束，中国将迅速胜利。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很快实现，战争就要延长。但结果还是一样，日本必败，中国必胜。只是牺牲会大，要经过一个很痛苦的时期。

这是对外国人的解释。对国内，毛泽东也深感有必要对全面抗战10个月的经验“做个总结性的解释”，特别是“有着重地研究持久战的必要”。

★看待战争的前景和结局，毛泽东用的是辩证法

“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最后的胜利为什么是中国的呢？根据在什么地方呢？”

毛泽东指出这是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使然：

“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的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

接着，毛泽东全面考察了中日双方相互矛盾的基本特点及其在战争中的演变趋势，他指出：日本是一个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但它的侵略战争是退步的、野蛮的；中国的国力虽然比较弱，但它的反侵略战争是进步的、正义的，又有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军队这种进步因素的代表。日本战争力量虽强，但它是一个小国，军力、财力都感缺乏，经不起长期的战争；而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人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日本的侵略行为损害并威胁其他国家的利益，因此得不到国际的同情与援助；而中国的反侵略战争能获得世界上广泛的支持与同情。

“这些特点，规定了和规定着双方一切政治上的政策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规定了和规定着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而不属于日本。战争就是这些特点的比赛。这些特点在战争过程中将各依其本性发生变化，一切东西就都从这里发生出来。”

毛泽东由此得出的结论是：

“中国会亡吗？答复：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够速胜吗？答复：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

因为“亡国论”者和对抗战前途持悲观态度的人，只看到敌强我弱的一面，没有看到日本根本的弱点和中国的优势；“速胜论”者不承认敌强我弱的特点，不了解日本的短处需要一个长时间才能充分暴露出来，而中国的长处也需要经过长时期的努力才能充分发挥出来，所以都是错误的。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毛泽东在客观全面地分析了中日战争的特殊规律后，科学地预见了这场持久战将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

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

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的时期。”

他着重指出，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将是中国很痛苦的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然而，它又是敌强我弱形势“转变的枢纽”。他强调“此阶段中我之作战形式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此阶段的战争是残酷的，地方将遇到严重的破坏。但是游击战争能够胜利”。毛泽东特别指出：“客观现实的行程将是异常丰富和曲折变化的，谁也不能造出一本中日战争的‘流年’来；然而给战争趋势描画一个轮廓，却为战争指导所必需。”

为了取得抗日战争胜利，毛泽东还完整地提出战争的战略战术指导原则。这就是：

在战略指导上，要充分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不是物；“战争的胜负，固然决定于双方军事、政治、经济、地理、战争性质、国际援助诸条件，然而不仅仅决定于这些；仅有这些，还只是有了胜负的可能性，它本身没有分胜负。要分胜负，还须加上主观的努力，这就是指导战争和实行战争，这就是战争中的自觉的能动性。”要认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要认识战争的军事目的。作为两军厮杀的战争，其自身的目的和本质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要认识“兵民是胜利之本”。“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就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具体的战略方针是：在第一和第二阶段中主动地、灵活地、有计划地执行防御战中的进攻战，持久战中的速决战，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第三阶段中，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

毛泽东特别强调游击战争在中国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意义，他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对它作了更全面、详尽的论述。

《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辩证法，充满了唯物主义。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于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存在着的相互矛盾着的各种因素以及它们的发展变化作了深入的分析，从而能科学地预见未来的前途。

毛泽东这些异常清晰而符合实际的判断，回答了人们最关心而一时又看不



清楚的问题，使人们对战争的发展过程和前途有了一个清楚的了解，大大提高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信念。

★ 毛泽东在延安窑洞写作《论持久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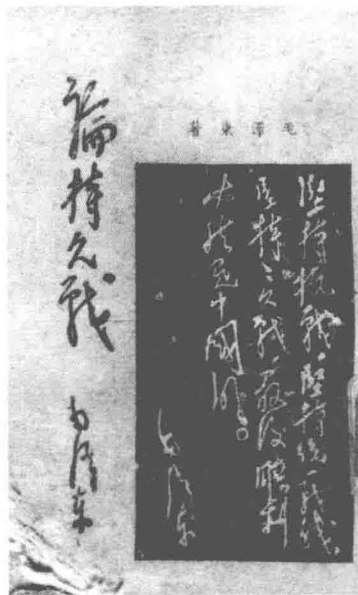
★持久战论说蜚声中外，
缘于它揭示了战争规律

《论持久战》首次发表于1938年7月1日延安《解放》周刊第43、44期合刊上。随后又发行了多种版本。这一重要的军事论著，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解决战争问题的典范，在国内外产生了重大影响。

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

的影响。据程思远回忆：

“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发表，毛泽东的抗战思想和抗战策略得到了愈来愈多人的认同、钦佩与尊重。

在中国共产党内，一些领导人曾对此有过这样切身的感受和中肯的评价。

1941年10月8

日，陈云在中央书记处工作会议上说：过去我认为毛泽东在军事上很行，因为长征中遵义会议后的行动方针是毛泽东出的主意。毛泽东写出《论持久战》后，我了解到毛泽东在政治上也是很行的。

1943年11月下旬，任弼时在中央高级学习组会上说：1931年到中央苏区后，认为毛泽东“有独特见解，有才干”，但在思想上是“存在狭隘经验论，没有马列主义理论”；1938年到莫斯科及回国后，阅读

★ 《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早期版本。

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认识到他一贯正确是由于坚定的立场和正确的思想方法”。

“延安五老”之一的吴玉章，后来曾经向中国人民大学的同事们回忆道：《论持久战》的发表，使毛泽东赢得了全党同志发自内心的、五体投地的赞许、佩服甚至崇拜，从而最终确立了在党内无可替代的领袖地位和崇高威望。他还说，虽然遵义会议从组织程序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的领导地位，但并不十分巩固。许多老资格的革命家自觉不自觉地将毛泽东看作是革命的后来者、小字辈；喝过“洋墨水”的教条主义者，认为毛泽东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不足，内心并不服气。《论持久战》的发表，毛泽东以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娴熟运用和对抗日战争的透彻分析，征服了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的心。全党感到：10多年曲折斗争的历史，终于锻造并筛选出自己的领袖。这种在感情上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认同和拥戴，与一般的组织安排绝不可同日而语。

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的发表，也曾感染了当时许多奔赴延安的热血青年。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著名机械工程专家、曾任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的沈鸿，在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后，于1938年2月怀着满腔爱国救国热忱，毅然带领“利用五金厂”的7名工人和五金厂的全部机床西迁，辗转数千公里到达革命圣地延安，任陕甘宁边区机器厂总工程师兼总设计师。他后来回忆说：当时对抗战会取得胜利吗？为什么？……这一系列问题，开始我也是茫然的。《论持久战》，是我在延安读到的毛泽东的第一本著作。这本书的理论逻辑力极强，具有很大的说服力，读后使人对抗日战争的胜利更充满勇气和信心。

著名诗人卞之琳，1938年8月到达延安后，读了《论持久战》，曾以“《论持久战》的著者”为题，写诗赞颂毛泽东：

手在你用处真是无限。

如何摆星罗棋布的战局？

如何犬牙交错了拉锯？

包围反包围如何打眼？

下围棋的能手笔下生花，

不，植根在每一个人心中
三阶段：后退，相持，反攻——
人是顺从了，主宰了辩证法。
如今手也到了新阶段，
拿起锄头来捣翻棘刺，
号召了，你自己也实行生产。

最难忘你那“打出去”的手势
常用以指挥感情的洪流
协入一种必然的大节奏。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这是由周恩来交付给一位地下党员杨刚女士翻译的，1939年在上海出版。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还专为英文本写了序言。

毛泽东在序言中是这样说的：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

“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的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

在海外，这本小册子同样得到高度评价。一位外国记者当时评论说：“不管他们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地分析了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

毛泽东《论持久战》中的精辟论断，不仅是指导中国军民抗战的正确军事纲领，从思想上武装了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历史进程

和最后胜利，证明毛泽东对抗日战争的论断和预测是完全正确的。

也就是在《论持久战》英文本的序言中，毛泽东再次揭示了中日之间战争较量的必然规律：

“有些则是不明白中国抗战的必然规律，经过艰难路程日本必败中国必胜这个必然规律。”

毛泽东在战争问题上所阐明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包括中日之间较量的基本原理，至今仍具有指导意义。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

——毛泽东：《边打边谈边稳》（1952年8月4日）

“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是1952年8月4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讲话时所说，也是毛泽东对抗美援朝战争做过的诸多评价之一。其实，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抗美援朝战争不仅仅有“大学校”“大演习”的意义，更是一场血与火的“大课题”“大考验”。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军威，打破了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为新中国的建设打出了几十年相对安全的和平环境。

★ “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

1950年6月，距离新中国成立还不满一年，全国人民正在按照毛泽东和党中央确立的关于恢复国民经济的方针和部署，有条不紊地、卓有成效地工作着。然而，一场发生在中国东北近邻的战争打断了新中国建设的既定进程。

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远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国政府，悍然决定对朝鲜进行武装干涉，并将干涉范围扩大到朝鲜半岛以外的亚洲地区。6月27

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台湾中立化”，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并对台湾实施军事占领。美国趁朝鲜战争之际，插手台湾问题，阻止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赤裸裸的帝国主义行径。

6月28日，针对杜鲁门的声明，新中国庄严宣告，指出美国的行为“是对于中国领土的武装侵略，对于联合国宪章的彻底破坏”。

然而，美国对中国的警告置若罔闻，他们觉得新中国只是在“装样子”，是不敢和美军在战场上交手的。7月7日，美国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由美国指挥的“统一司令部”，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开赴朝鲜半岛。9月15日，美军从朝鲜仁川登陆，朝鲜战局急剧逆转。

1950年10月1日，新中国第一个国庆节。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和焰火晚会。就在这一天，美国支持下的南朝鲜军队越过了三八线，麦克阿瑟向朝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朝鲜人民军无条件“放下武器停止战斗”。

这天深夜，毛泽东得到消息，金日成紧急约见中国驻朝鲜大使倪志亮，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援助朝鲜的请求。

10月2日下午，毛泽东在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央



★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图为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毛泽东在中南海。

书记处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早在朝鲜战争爆发时，毛泽东便对事态发展做过各种可能的假设，对于美军的干涉，毛泽东心里有一个“底”，这个“底”就是美军是不是过三八线。这个底线，后来他明确表达过：“美帝国主义如果干涉，不过三八线，我们不管，如果过三八线，我们一定要过去打。”

此时，美国已经公开表示将进军三八线以北，毛泽东认为出兵万分火急，但是，参加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多数人不赞成出兵。毕竟，新中国刚刚成立，一穷二白，百废待兴，人民政权也没有完全巩固，人民军队的武器装备非常落后。入朝参战，就意味着新生的共和国要与世界上经济实力和军事实力最为雄厚的美国决一雌雄。

当时的新中国与美国，是实力相差巨大的两个国家。1950年美国GDP为2800亿美元，中国仅为100亿美元；美国的钢铁产量是8700万吨，而中国钢铁产量仅60万吨；美军有各种先进的陆海空军事装备还有原子弹，而解放军能够动用的只有装备极其落后的陆军。仅火炮一项，美军每个军配备7公分至24公分火炮1500门，而解放军每个军只有这样的火炮36门。出兵，将是一场完全不对称的战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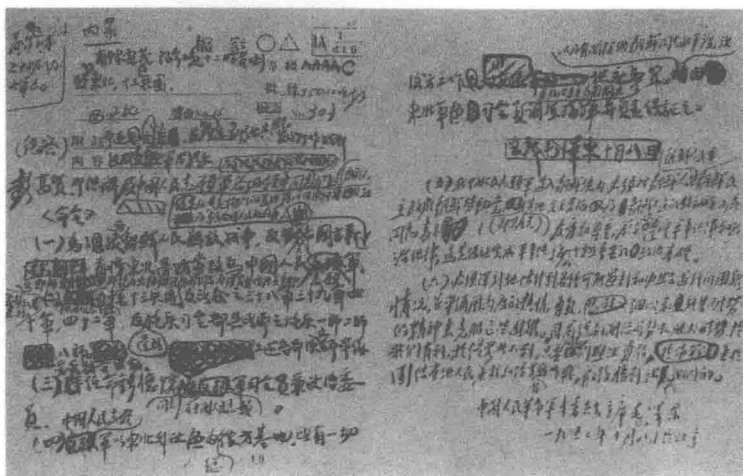
有的同志提出“出而不战”的建议，就是派一部分军队过去，但是先不打，视情况再定，实质上也是不准备与美国开战。

到底出不出兵，中央书记处会议定不下来。

在朝鲜战场上，朝鲜人民军在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的强大火力压力下，节节败退。10月3日，朝鲜内务相朴一禹抵达北京，向中国政府递交了朝鲜首相金日成、副首相朴宪永的亲笔信，再次请求中国政府出兵援助朝鲜。

10月4日和5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继续讨论出兵问题。在4日的会上，出现了一个新面孔，他就是刚从西北赶过来的彭德怀。因为事先不知道议题，他没有发言。这天晚上，彭德怀一夜无眠。第二天的会上，他发言了。他说：出兵朝鲜是必要的，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如果美军摆在鸭绿江岸和台湾，它要发动侵略战争，随时都可以找到借口。这次会议，最终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决定由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出兵的决策做出后，原本同意为中国出兵提供空军支持的苏联老大哥却告知：苏联空军无法进入朝鲜境内作战。这意味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将在缺乏空军火力支持的情况下独自作战。苏联方面的失诺，对中国出兵作战十分不利。经过慎重考虑，毛泽东最后还是毅然下定决心：出兵！

从10月1日晚金日成请求中国出兵，到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仅仅只有18天，但对毛泽东来说，却似乎走过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路程。在这个决策过程中，一个又一个困难接连摆到面前，毛泽东既要对世界大势作出正确的分析和判断，对敌我友三方的情况和战场的发展趋势进行全面的了解，还要在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做到应付自如、迅速决断，更重要的是，要以充足的理由去耐心说服自己的战友和同志。

当第一批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之后，好几天睡不着

★ 1950年10月初，毛泽东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并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名义发布组成志愿军的命令。

觉的毛泽东稍微松了口气，他在中南海会见了表兄王季范与老友周世钊。谈到抗美援朝，毛泽东对他们说了这样一番深刻的意味深长的话，解释了为什么出兵朝鲜：

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出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如果置之不理，美国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用三把尖刀插在中国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头上，从台湾一把刀插在腰上，从越南一把刀插在脚下。天下有变，它就从三个方向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所以，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多年以后，毛泽东对来访的金日成谈起这次决策的过程，还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虽然摆了5个军在鸭绿江边，可是我们政治局总是定不了，这么一翻，那么一翻，这么一翻，那么一翻，嗯！最后还是决定了。”

★轮番作战，朝鲜战场成为我军的“大学校”

从中国人民志愿军过江的那一刻起，毛泽东的精力便集中到了朝鲜战场上。在毛泽东的一生中，他曾经指挥过无数次大大小小的战役，在解放战争中，也曾统率过几百万大军同时在几个战场上与敌人作战，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可以说，毛泽东有高人一筹的战略指挥能力和丰富的战争经验，但是，抗美援朝战场，对毛泽东和人民军队来说是一个新的课题。这是在一个新的战场上——国外战场上，同一个新的敌人——具有高度现代化装备的美国军队作战。

初战必胜，对出国作战的志愿军来说尤其重要。第一仗能不能打胜，将决定志愿军入朝后能不能站得住脚。1950年10月21日，毛泽东致电彭德怀下达第一次战役的作战部署。他看到麦克阿瑟在战略判断上犯了一个大错误，即“美



伪均未料到我志愿军会参战，故敢于分散为东西两路，放胆前进”。毛泽东断定，“此次是歼灭伪军三几个师争取得出国第一个胜仗，开始转变朝鲜战局的极好机会”。10月25日，南朝鲜军的一个加强营被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四十军一个团以拦头、截尾、斩腰的战术歼灭，这一战揭开了抗美援朝战争的序幕，打响了震惊世界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战争的第一仗。11月1日至3日，志愿军首次与美军交战，重创美军王牌骑兵第一师，并在云山歼灭其第八团大部。云山战斗，志愿军首创了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刹了一下所谓的“王牌军”的威风。

第一次战役，中国人民志愿军经过13个昼夜的艰苦作战，歼敌1.5万余人，自身伤亡1万余人，将“联合国军”部队从鸭绿江边打回到清川江一线以南，粉碎了麦克阿瑟于感恩节前占领全朝鲜的计划，初步稳定了战局。

★ 战斗在抗美援朝前线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为适应战争的需要，武器装备不断改善，各军、兵种建设迅速发展。广大指战员利用战斗间隙，加强军事训练，苦练杀敌本领，不断提高战斗力。图为战士们互帮互学，纠正射击动作。

直到此时，麦克阿瑟仍然认为中国军队只是象征性出兵，他在东京制定了圣诞节前结束战争的总攻势，以34万多人的兵力在正面展开进攻，同时命令空军倾巢出动，对鸭绿江上的所有桥梁和靠近鸭绿江的朝鲜边境地区进行狂轰滥炸。

11月23日，感恩节到了，美军士兵吃了一顿颇为丰盛的火鸡大餐，喝到了香槟酒。就在这一天，他们接到命令，对中朝军队发起总攻，尽快结束战斗，回去过圣诞节！

面对来势汹汹的美军，毛泽东决定诱敌深入。11月25日，志愿军向被志愿军诱至预定战场的西线敌军突然发起猛攻，一举歼灭了德川、宁远地区的南朝鲜军2个师大部，打开了战役缺口。随即又以两个军对西线敌军部队侧后实施战役迂回，以正面四个军对当面之敌进行攻击。

担负战役迂回的三十八军一一三师，14小时前进70公里，于28日晨抢占了三所里地区，当晚又主动抢占三所里以西的龙源里，堵住美军另一条南撤通道。

北上接应与向南撤退的两支美军在飞机、坦克掩护下，轮番向志愿军一三三师三三七团阵地发起攻击，相距不到1000米的两支美军，始终不能再前进半步。经过数日血战，志愿军牢牢堵住了美军第九军的南撤退路。最后，美军不得不丢下大批辎重装备，从靠近西海岸的安州突围。

由于三十八军在战场上的杰出表现，彭德怀与邓华等志愿军首长给予三十八军通令嘉奖。在电文即将发出的时候，彭德怀从机要员手中要过电报稿，情不自禁地加上了两句话：“中国人民志愿军万岁！”“三十八军万岁！”“万岁军”由此得名，而这样的英雄劲旅在朝鲜战场上还有很多很多。

经过第二次战役，除了东部沿海的襄阳外，“联合国军”全部被赶到三八线以南，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取得了由防御转入进攻的主动权。

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机会，打过三八线，以争取政治上的主动地位，中国人民志愿军又于1950年除夕之夜发起了第三次战役。1951年1月2日，“联合国军”全线撤退。中朝军队4日进占汉城，5日渡过汉江，8日收复仁川，“联合国军”被迫退守三七线。

在朝鲜战场上，中朝两国军队连续取得三次战役的胜利后，中国方面曾经作过这样一种估计，即在中朝大军的压迫下，或者由中朝军队打得美军无法再

打下去的时候，迫使美军退出南朝鲜，根本解决朝鲜问题。这显然是一个乐观的估计。当然，毛泽东也估计到另外一种可能，即客观形势迫使中朝军队在2月间就可打一仗，打了以后再休整。

这后一种估计是对的。果不其然，从1951年1月25日起，“联合国军”乘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尚未得到充分休整之机，由西向东全线发起大规模进攻，中朝军队开始进行带有积极防御性质的第四次战役。

当时，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连续进行了三次战役，打得十分疲劳，大量减员，要完成第四次战役积极防御的作战任务，困难甚大，亟待补充兵力。怎么办？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央军委在1951年2月7日发布命令，作出实行轮番作战的决定，就是将过去从国内部队抽调老兵补充志愿军的办法，改为以军为单位成建制地由国内调往朝鲜战场，轮番作战。

轮番作战的实施，既解决了在朝作战部队的休整和保持充足作战力量的问题，也使更多的部队、指挥机关和指挥员得到了现代战争的锻炼，积累了现代条件下作战和指挥的经验。在某种意义上说，轮番作战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一个新创造，朝鲜战场成为检验和提升中国人民解放军战斗力的“大学校”。

1951年3月7日，“联合国军”集中20多万兵力，在几百架飞机支援下，向中朝军队阵地发起全线进攻，中朝军队节节抗击。13日，中朝军队主动撤离汉城，到3月底，战线逐渐推移到三八线以北地区，但是，在中朝军队的顽强抵抗下，敌人再也难以前进，双方在三八线附近陷入相持的僵局。4月21日，第四次战役结束。

经过第一、二、三次战役的战略进攻，又经历了第四次战役的积极防御，在中朝军队同以美军为主的“联合国军”的反复较量中，毛泽东对朝鲜战争规律的认识逐步深化，准备长期作战的思想更加明确。他对抗美援朝战争总的指导方针，被概括为“战争准备长期，尽量争取短期”。

在第四次战役期间，美国策划在朝鲜半岛东西距离最短的蜂腰部建立新的防线，企图在中朝军队侧后登陆，配合它的正面部队，南北夹击，将中朝军队赶到蜂腰部以北。为了粉碎敌人这一计划，中朝军队于1951年4月22日发起第五次战役。



★ 由王海（前）率领的一个大队，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取得击落击伤敌机29架的战绩。

这时，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番入朝部队第十九兵团和第三兵团共6个军已到达朝鲜战场，加上原在朝鲜作战的9个军，共有15个军约100万兵力。

第五次战役规模是很大的，双方兵力都在百万左右。但是，“联合国军”在武器装备方面占有

优势，它不仅拥有技术精良的装甲兵、炮兵，而且有制空权，机动性很强，很多情况下，志愿军对美军一个团左右的兵力曾经多次进行合围，却始终不能消灭它，至多消灭一个营，这与国内战争特别是解放战争后期我军能够整师整旅成建制地消灭敌人的情况大不相同。

如何有效歼灭美军？这是毛泽东和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需要加以解答的新问题。问题引起了志愿军统帅部的注意，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1951年5月26日，毛泽东给彭德怀发了一个电报，指示说：“历次战役证明我军实行战略或战役性的大迂回，一次包围美军几个师，或一个整师，甚至一个整团，都难达到歼灭任务。这是因为美军在现时还有颇强的战斗意志和自信心。为了打落敌人的这种自信心以达最后大围歼的目的，似宜每次作战野心不要太大，只要求我军每一个军在一次作战中，歼灭美、英、土军一个整营，至多两个整营，也就够了。”毛泽东形象地把这一作战方针叫作“零敲牛皮糖”，问题有了解答。

第五次战役是6月10日结束的。这次战役共歼敌

8.2万余人，是五个战役中歼敌最多的一次，志愿军也付出了伤亡7.5万人的代价，双方的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从此，朝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

在美国方面，由于朝鲜战场僵持的局面，短期内看不到好转的希望，而军队的大量伤亡，加上国内民众的反战示威，美国政府有些坐不住了。1951年5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向杜鲁门提出争取谈判解决朝鲜问题的建议，杜鲁门很快批准了这个建议。5月31日，美国国务院顾问、前驻苏联大使凯南非正式拜会苏联驻联合国代表马立克，表示美国政府准备与中国讨论结束朝鲜战争问题，愿意恢复战前状态。

面对美国主动伸过来的和平谈判橄榄枝，毛泽东敏锐地把握住这个机会，与朝鲜领导人金日成商谈即将到来的停战谈判的方针和方案，做好停战谈判的准备。

中朝军队的浴血奋战，将“联合国军”打回到战争最初开始的地方，也将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打到了谈判桌前。

对1951年这一年抗美援朝战争情况，毛泽东在1952年8月4日召开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八次会议上，作过这样的介绍：

“去年这一年，我们是边打，边谈，边稳。

“朝鲜战争的局势，去年七月以后定下来了，但是国内的财政经济状况，能不能稳下来，那时还没有把握。……现在‘三反’‘五反’运动胜利结束，问题完全清楚了，天下大定。”

就是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谈起了抗美援朝战争对我军的锻炼作用：

“现在我们的部队减少了，但是装备加强了。我们过去打了二十几年仗，从来没有空军，只有人家炸我们。现在空军也有了，高射炮、大炮、坦克都有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我们在那里实行大演习，这个演习比办军事学校好。如果明年再打一年，全部陆军都可以轮流去训练一回。”

讲到我所面临的三个重大难题，毛泽东自信地说：

这次战争，我们本来存在三个问题：一、能不能打；二、能不能守；三、有没有东西吃。

能不能打，这个问题两三个月就解决了。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

能不能守，这个问题去年也解决了。办法是钻洞子。我们挖两层工事，敌人攻上来，我们就进地道。有时敌人占领了上面，但下面还是属于我们的。等敌人进入阵地，我们就反攻，给他极大的杀伤。我们就是用这种土办法捡洋炮。敌人对我们很没有办法。

吃的问题，也就是保证给养的问题，很久不能解决。当时就不晓得挖洞子，把粮食放在洞子里。现在晓得了。每个师都有三个月粮食，都有仓库，还有礼堂，生活很好。

毛泽东进一步给大家鼓劲说：

“现在是方针明确，阵地巩固，供给有保证，每个战士都懂得要坚持到底。”

★在谈判桌和战场上来回较量

1951年6月下旬，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前的各方接触，由非正式摸底进入公开倡议阶段。6月30日，接替被解职的麦克阿瑟继任“联合国军”总司令的李奇微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同朝鲜人民军和中国人民志愿军举行停战谈判。7月1日，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和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联名复电李奇微，声明同意举行停战谈判，并建议以三八线以南的开城为谈判地点。

抗美援朝期间，在战场上，毛泽东有彭大将军这位得力干将，在谈判桌上，最主要、最得力的助手，自然是周恩来。朝中方面的声明一发表，毛泽东和周恩来便投入紧张的谈判准备工作。首先决定由邓华、解方作为彭德怀的代

表出席谈判会议。同时决定，从国内派出由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率领包括乔冠华等在内的停战谈判工作组立即赴朝，协助指导谈判工作。

当时，美国方面对谈判的态度是，谈判不意味着立即休战，在停战协定签订以前，将不停止对抗行动。美国政府还授权李奇微，在停战谈判期间，可以进行陆地、两栖、空中、空降和海上作战，以支持谈判。

对美国的这一手，毛泽东做了充分准备。为了防止“联合国军”借停战谈判的机会举行反攻，他于7月2日致电彭德怀等，对中朝军队在三八线的防线及时作出重要部署：一方面加强正面防御阵地第一线的兵力，防止敌军大规模进攻；另一方面，加强侧后方的兵力，防止敌人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两岸突然登陆。军事上的有力部署为谈判的进行作了必不可少的后备支持。

朝鲜停战谈判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马拉松式谈判。一开始，便在议程上发生分歧，卡在“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这个问题上。中朝代表提出“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以保证停战和朝鲜问题的和平解决”，但是美方拒绝把“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列入谈判议程，摆出的理由是，停战谈判只应讨论朝鲜境内的军事问题，而从朝鲜撤出一切外国军队是政治问题，只能在停战实现以后由有关政府去讨论。

通过在撤兵问题上的多轮论争，中朝在向世界表明了爱好和平的诚意的同时，也揭露了敌方不愿意促进和平事业的阴谋，为了尽快结束关于议程问题的谈判，进入实质性谈判，朝中代表团在征得毛泽东的意见后，同意将撤军问题留待停战实现后的另一次会议去解决，但要在议程中列入“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

在清除了“撤军”问题这一谈判障碍后，1951年7月26日，双方通过了谈判议程，共有五项：（一）通过议程；（二）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以建立非军事地区；（三）在朝鲜境内实现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四）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五）向双方有关各国政府建议事项。自此，停战谈判结束了程序性谈判阶段，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

进入实质性谈判阶段后，在第二项议程，即确定军事分界线时，双方又僵住了。中朝方面提出以三八线为军事分界线，对方却拒绝这一主张，以所谓“补偿”其海、空军优势为借口，要求将军事分界线划在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阵

地后方，企图不战而攫取1.2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这一无耻要求遭到拒绝后，美方公然以武力相要挟，说：“那就让炸弹、大炮和机关枪去辩论吧！”

果然，从1951年8月18日到10月22日，“联合国军”向中朝军队连续发起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朝鲜谈判被迫暂时中断，双方又从谈判桌上的较量转到战场上的较量。中朝军队是在极其恶劣的气候和后勤给养严重困难的条件下，抗击“联合国军”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的。特别是朝鲜北部暴发特大洪水灾害以后，农田被毁，道路冲断，许多工事和战备仓库被严重破坏，敌军又乘机向中朝军队后方实施大规模“绞杀战”，试图通过破坏后勤补给来动摇志愿军的战斗意志。英勇的志愿军没有被困难动摇，在反“绞杀战”的过程中，以抢修、抢运和防空斗争相结合，打造了一条“打不烂、炸不断的钢铁运输线”，扭转了战场上运输一直被动的局面。

在国内人民的支援下，经过中朝军队英勇顽强的抗击，敌方的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最终都被中朝军队所粉碎。美军在谈判桌上得不到的东西，在战场上同样也捞不到，这几仗，美军损失了15.7万余人，却只能向前推进646平方公里的土地，正如英国《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文章所说：“美国谈判代表愈来愈明白，联军已真的不能再用继续作战的办法来获得进一步的利益了。”

在战场上碰了一鼻子灰，“联合国军”代表只好又回到了谈判桌上，没脸再提所谓海空优势了，11月27日，第二项议程达成一致，规定以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向后撤两公里，以建立非军事区。随后，同时进行第三项议程（在朝鲜境内停火与休战的具体安排）、第四项议程（战俘遣返问题）的谈判。

在后续的谈判过程中，朝中方面的每一项提案，几乎都要遭到“联合国军”代表的反对，双方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其激烈程度不亚于战场上的刀光剑影，一旦谈不下去了，双方又会选择在战场上掰手腕。谈谈打打，打打谈谈，双方的较量在谈判桌和战场上来回切换。

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人在战场和谈判桌的交互斗争中运筹帷幄，始终抓住而又巧妙灵活地使用谈与打、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这两手，双管齐下，互相配合，针锋相对，毫不放松，稳操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主动权。在“文斗”方面，我方有理。在“武斗”方面，我方亦有办法，依托坚固的阵地，用“零



敲牛皮糖”的办法，一口一口地吃掉敌人，积少成多，合起来就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亦文亦武，紧密配合，在谈判桌和战场上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较量中，迫使“联合国军”就范，达成协议。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在板门店正式签字，全世界人民所渴望的朝鲜停战终于实现了。

当时代表“联合国军”方面签字的是美军中将马克·韦恩·克拉克，这位美国将军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

“我成了历史上签订没有胜利的停战条约的第一位美国陆军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我想，我的前任，麦克阿瑟与李奇微两位将军一定具有同感。”

★ 守卫在上甘岭阵地上的志愿军部队，收听到停战的消息后热烈欢呼。

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签字的是彭德怀。他后来谈起抗美援朝时讲了这么一句名言：

“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以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953年9月12日，毛泽东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24次会议的讲话中，对抗美援朝作总结，也说过几句相似的话：

“我们的经验是，依靠人民，再加上一个比较正确的领导，就可以用我们的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

“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

这些话，恰恰说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抗美援朝战争是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既培养训练了新中国的军队，也教育了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人民，还教训了不可一世的侵略者，更告诫了那些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国主义政客们！



毛泽东

MAO
ZEDONG



讲战争准备

“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备战、备荒、为人民”



“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 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



“有人说怕敌人不来用不上，不是浪费吗？那不对，一定要搞，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敌人来了总要打掉一些坛坛罐罐。”

“把一切都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趁我们还在的时候再打它一仗，也好。”

——毛泽东：《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1964年7月2日）

这是1964年夏季毛泽东在听取周恩来等汇报战备工作时的谈话。在当时复杂严峻的安全形势下，毛泽东的这句话强调了战争准备和战略威慑的重要意义，反映了他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辩证法思想。

中华民族爱好和平，中国不会主动“走出去”挑起侵略战争，所以对新中国来说，战争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敌人“来”，把侵略战争强加给中国。上世纪50年代以来，中国周边爆发了大大小小多次战争，美国、苏联等大国一度施加了严重的战争威胁。可以说，在建立新中国之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敌人不仅真的“来”过，而且更是随时可能“来”。毛泽东指出，敌人“来”和“不来”看似截然相反，实则对立统一；仗打与不打、若打打成什么局面，看似操之在

“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

人，实则操之在己。“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关键就在“准备”二字。

思考“准备”的事情，还要从新中国成立之初说起……

★“提高斗志，随时准备打击侵略者”

1949年10月1日，当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新中国成立之时，人民解放军还在为全中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艰苦作战，祖国大地到处是多年兵燹带来的残垣颓圮。旧中国的苦难尚未褪去，新的战争威胁又接踵而至，得到美国支持的蒋介石集团则退守台湾，叫嚣反攻大陆。积贫积弱、百废待兴的中国在国际社会所能依靠的只有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只能采取“一边倒”的外交战略。1949年12

月，毛泽东访问苏联，次年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规定缔约双方加强友好合作，在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受到日本及其盟国的侵袭而处于战争状态时，缔约国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这个条约于当

年4月11日正式生效，其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说：使中苏两大国家的友谊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使得我们有了一个可靠的同盟国，这样就便利我们放手进行国内的建设工作和共同对付可能的帝国主义侵略，争取世界的和平。

新中国的发展建设正在逐渐步入正轨，国家安全



★ 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赴莫斯科出席《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字仪式。左起：斯大林、周恩来、毛泽东。

又有了苏联的支持，毛泽东判断：“目前的国际情况对于我们是有利的”，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依靠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另一方面是因为世界各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正在日益壮大，只要全世界和平和民主的力量团结起来，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制止的。当时对我国的安全形势有一个形象的比喻，叫作“背靠沙发面朝东”，这里的“沙发”就是指苏联。在“一边倒”的外交战略下，我国大陆的西北、东北等广袤地区都是相对安全的战略大后方，战争威胁主要来自东部沿海的美国及其支持的蒋介石集团。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军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巡弋，阻止解放军渡海解放台湾，地面部队则越过三八线。毛泽东密切关注战争态势，他下达了做好打仗准备的指示：

“我们要充分准备。”

“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

中国派出志愿军参战，很快便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沉重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及其所支持的蒋介石集团虽然不断在我国东南沿海进行袭扰，但始终没有制造大的事端。所以这一时期毛泽东认为尽管存在军事对峙，但是大规模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对安全形势的判断总体上是相对乐观的。

即便是在有苏联的支持且安全形势判断相对乐观的情况下，毛泽东也十分重视战备工作，提出应当不断加强我国的军事力量，继续扩大我国的国际统一战线活动，从军事上和政治上制止或者推迟战争的爆发，保证万一爆发战争我军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

做好战争准备，就要有具体措施。首先是抓紧和平机遇，利用好沿海地区相对良好的发展底子加强工业建设和防御工事的修建。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

“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坚固的基础。”

“不说十年，就算五年，我们也应当在沿海好好地办四年的工业，等第五年打起来再搬家。”

“好好地利用和发展沿海的工业老底子，可以使我们更有力量来发展和支持内地工业。”

针对我国东西部工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毛泽东也从战备的角度加以考虑，要求新建的工业企业选址要向我国腹地、西部倾斜，这样“使工业布局逐步平衡，并且有利于备战”。为了防备美国和蒋介石集团的攻势，我国还在东南沿海地区修建了大规模、分层次的防御工事。

★ “仗打不起来，但要搞个保险系数”

朝鲜半岛的战事刚刚告一段落，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新的变化。1954年法国殖民者撤离越南后，美国政府在越南扶植了亲美的傀儡政权，掀起对北越政权和越南共产党的新的战事。时隔一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的“秘密报告”引起了轩然大波，随后爆发的波匈事件更诱发了社会主义国家阵营的空前震荡。赫鲁晓夫一方面多次借“长波电台”“联合舰队”等企图控制中国，1958年又指责解放军炮击金门是中国方面擅自行动，破坏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还亲自加入中苏两党的论战，结果两党的分歧逐渐扩大为两国关系的疏远乃至恶化。此外，赫鲁晓夫还努力与美国缓和关系，进一步孤立中国。

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对安全形势有了新的判断。他认为，虽然目前的国际条件对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总体是有利的，但是帝国主义势力还在包围着我们，这个事实并没有改变。我们仍然要在思想上保持高度戒备，随时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毛泽东说：

“仗打不起来，但要搞个保险系数。”

“不论任何工作，我们都要从最坏的可能性来想、来部署，我们都先准备好了就不怕了。”

毛泽东深知，“能战方能止战”，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同样不可能得到。如果只做和平的打算就会吃亏，只有认真准备打仗才能有效地威慑敌人。

面对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怎么办？毛泽东认为，既然是战争是怕也打、不怕也打，倒不如不怕，毛泽东给大家鼓劲说：

“每天总是怕，在干部人民里头不鼓起一点劲，这是很危险的。我看，还是横了一条心，要打就打，打了再建设”。

在毛泽东看来，要制止战争，只有做好准备、拿起武器。1959年3月他回答美国客人提问时说：“到全世界没有一个人害怕战争的时候，世界上就不会有战争了。”

在这种判断下，毛泽东主张战争准备要和经济建设的形势相适应，一方面要大规模办好民兵师，让人民自己武装自己，以便在爆发战争时能够全民皆兵，让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寸步难行”；另一方面要精减部队员额，节省军费用来发展尖端武器技术。

他建议，解放军从300万裁减至200万，腾出军费来用于购置先进装备和研制中程导弹等武器。并号召全军和科研工作者下决心拿下尖端技术，要“抓两头”，一头抓科研试制，一头抓工业基础。

为了应对美国等国家的核威胁，毛泽东强调要自力更生研制原子弹、核潜艇等。他说：“我们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激光“要组织一批人专门去研究它”。

在中苏关系破裂之后，毛泽东更表示：“苏联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他

要是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在物质准备之外，毛泽东还多次强调要加强政治动员、人员训练和思想准备，他指示部队抓紧时间进行军事训练，在敌人“来”之前集中时间将需要学的军事科目抓紧学好，做到有备无患。不管敌人来不来、何时来，我国先做好准备，确保“当帝国主义不顾一切后果向我国发动侵略战争的时候”，我们能够“立即给予有力的还击”。

★ “要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准备打仗”

进入60年代，中苏两党长期积累的分歧终于扩大为两国的对立，1960年7月，苏联单方面撤走援华专家，再一次严重破坏了两国关系，中国“一边倒”的外交战略难以为继。

从1960年开始，苏联在我国新疆挑拨民族矛盾，多次挑起武装冲突，酿成1962年的伊犁、塔城事件，中苏边境局势紧张。而在中国南部边境，美国政府在肯尼迪就任总统后，将越南战争从扶植傀儡政权升级为直接派兵参战的“特种战争”，严重威胁我国边境安全。

在这种“黑云压城”的严峻形势下，1961年8月，毛泽东会见拉美客人时说了这样一些话：“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按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见，是不要打的”，“但如果按照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的意见，那就要打”。在这种情况下要做最坏的准备，因为“这么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

毛泽东的意思很明确，能战方能止战，战争在表面上看操之于人，但更深层来看打与不打在实际上也操之在己，战争准备足够充分就可能威慑敌人、避免



★ 1962年10月20日，中印边界西段的印军向中国边防部队发起全面进攻。图为中国边防部队被迫进行自卫反击。

战争。反之，敌人就会乘虚而入。

毛泽东的这番话，很快得到了历史的检验。1962年，印度无视我国争取和平解决领土争端的努力一再挑衅，解放军被迫还击，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爆发。当年10月下旬，解放军利用来犯印军战线较长、据点分散的弱点，集中兵力进行大规模迂回、包抄，打歼灭战，并拔除了印军的不少据点，很快取得了战场的主动权。10月24日，中国政府主动向印方提出边界停战、军队后撤的和平建议，建议双方军队停火并各自后撤20公里。然而，印度政府悍然拒绝了和平建议，并大肆增兵。11月中旬起，解放军对来犯印军予以坚决反击并再次取得胜利。21日，中国军队宣布单方面停火并后撤20公里，接连失利的印军才终于有所收敛。

战胜方能促和，只有充分准备、有把握打胜仗才能遏止战争升级，把敌人逼回谈判桌。

1963年，在听取中印边界东段自卫反击作战情况汇报时，毛泽东对与会人员强调：

“你们总要准备打仗，不要以为天下太平、四方无事。”

“只搞文，不搞武，那个危险。”

“各大区的同志，省委的同志，中央的同志，你们要准备打仗。”

正是在毛泽东的“准备打仗”的思想指导下，我军作了周密的战备部署，并配合主动有力的政治、外交斗争，才使得印军不敢再次来犯。

“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中印边界冲突为这句话做了极好的注脚。

严峻的安全局势一时间并未因为我们暂时的军事、政治胜利而出现根本的缓和，反而一再证明了毛泽东“准备打仗”这句话沉甸甸的分量。

中印边境停火之后，战争危险并未完全解除，蒋介石集团对大陆的袭扰也始终没有停止。1963年，美国在通过各种渠道猜测中国将于次年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甚至制订了多种向中国施压乃至直接采用技术手段打击中国核设施的作战计划。这样一来，我国北方边境面临着苏联的巨大压力，南方边境面临美国的虎视眈眈，西部中印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东南沿海蒋介石集团挑起小规模

冲突不断。毫不夸张地讲，当时的中国可以说处于敌对势力的“四面包围”中，面临空前严重的战争威胁。

眼看敌人“来”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山雨欲来风满楼”的紧张气氛已经迫近，毛泽东敏锐地察觉到了战争的威胁。但是当时中国原子弹、核潜艇还没有研制成功，海军和空军的建设也是刚刚起步。我们对战争形势的考虑仍然是立足于将敌人“放进来”再“关门打狗”，依靠全民皆兵将敌人一步步消灭掉。对国防力量还十分薄弱的中国来说，打仗只能采取这种办法，这就需要比较大的战略纵深，需要保存实力打持久战。1964年春，国家计委根据中央指示，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6—1970年）的初步设想》，提出“三五”计划将国民经济的首要任务由原来的以发展重工业为基础改为大力发展农业，基本解决人民生活“吃穿用”方面的困难。

但是，不容乐观的安全形势迫使毛泽东重新思考备战和经济调整二者的优先级问题。这年4月25日，一份来自解放军总参谋部作战部的报告说，当时我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状况和人口、工业的地域分布等十分不利于国防，全国14个百万人以上的大城市集中了超过一半的机械、化学和国防工业以及大量密集的人口，一旦爆发战争，铁路、公路、桥梁和内河航运尚不足以及时疏散这些人口和设施，战时防空压力巨大；同时，主要大型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不足，如面对突如其来的军事破坏将酿成严重灾难。

这个报告引起了毛泽东的高度重视，他批示组织专门小组研究解决方案。从这年5月起，毛泽东就开始在不同场合反复强调备战的问题：帝国主义的战争威胁不断加强，要准备打仗，我们准备好了没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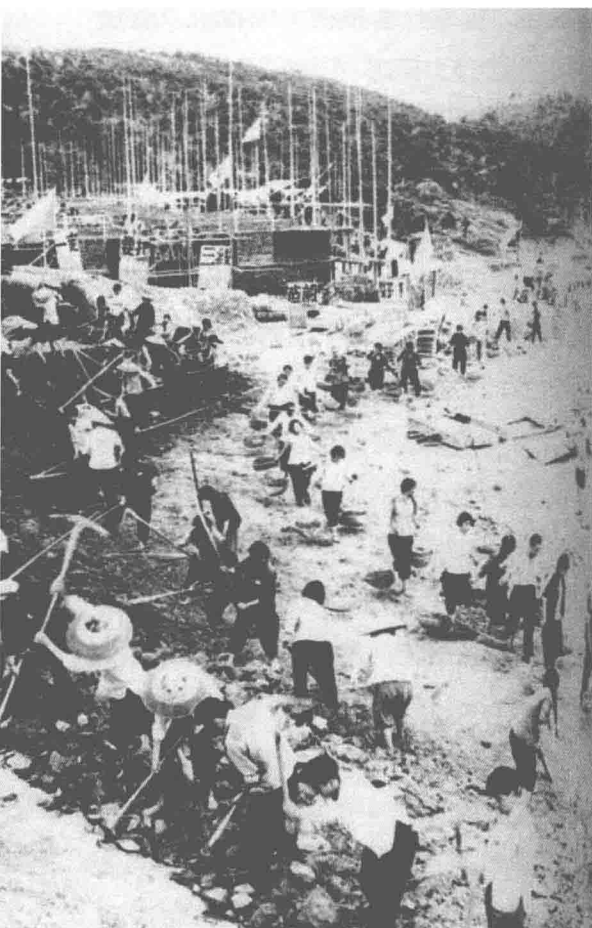
1964年5月10日，毛泽东听取“三五”计划设想的汇报，不时插话，他提出，农业和国防工业是“两个拳头”，而基础工业则是“一个屁股”，这就强调了大规模加强基础工业建设的重要性。

不久，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再一次强调，在核战争条件下一定要建设大后方。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从备战的角度出发，第一次将全国划分为一、二、三线地区。这次会议吹响了新中国延续10余年的国防战备“三线建设”的号角，整个中国的经济格局从此开始发生深刻的转变。

按照毛泽东的设想，一、二、三线是按我国地理区域划分的，大体上东部

沿海地区和边疆省份为第一线；中部为第二线；西南、西北和中部省区的腹地为第三线。就这样，战备建设被提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有过的高度。在这年的7月2日毛泽东说了这句名言：

“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把一切都准备好，准备好了，敌人要来也好办。”



★ 三线建设工地。

毛泽东号召开展三线建设就是这句名言的直接背景。

尽管耗费巨资的大规模战备建设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正常的经济调整和人民生活的改善，后来也有学者对此提出过质疑，但是，战备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只有看清当时历史大背景的人，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当然，历史也很快给出了答案。

1964年8月初，美国悍然挑起了“北部湾事件”，派遣军舰和战机对越南北部展开军事打击，大批作战人员和军事装备随即抵达北部湾，美国时隔10余年再一次将战火烧到中国家门口。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指出“美国对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侵犯，就是对中国侵犯，中国人民绝不会坐视不救”。毛泽东本来计划沿黄河考察工作，这时临时取消了这个计划，在声明稿上重重地写下了这样的批示：

“要打仗了，我的行动得重新考虑。”

这样严阵以待的姿态无疑对美国侵略者起到了威慑作用，毛泽东十分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一点。

8月13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见越南领导人黎笋时说：

“美国人‘很焦虑’‘不想打’，朝鲜战争的时候美国人以为中国没有准备，结果中国就‘打了一个它没有料到的仗’，而现在中国则有所准备，因而美国侵略者‘来’和‘不来’更会再三掂量，不至贸然扩大战事。”

紧接着，毛泽东着眼具体形势，一方面指出远离东南沿海和北部中苏边境的西南腹地作为三线建设的重点，是为“大三线”；另一方面他还强调要“以大区或省为单位搞点军事工业”，沿海、沿边和各省要搞兵工厂，一旦打起仗来各地不能仅仅指望其他地区的物资调运，“武装起来，做到人自为战，做到有准备就不怕”，是为“小三线”。

1964年8月17日起，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会议根据毛泽东的讲话精神，研究决定在人力物力财力上对三线建设给予充分保证：一方面新建项目要放在三线地区；另一方面要着手将一线地区的项目有计划、有步骤地搬迁到三线地区，一、二线的企业要有重点地开展技术改革。

这样，我国经济建设的重点从原先重点解决“吃穿用”全面转到战备建设上来。

这年11月，毛泽东在听取西南三线建设工作汇报时要求大家在战备方面吸取斯大林和蒋介石的教训，他说“斯大林一不做工事，二不搬厂，三不准备打游击战，只是仓促撤退”，蒋介石则是“没有搬，搬得很少，他是靠外国生活的，靠我们在敌后牵制住敌人，才保住重庆”。

毛泽东还说，战备工作就是在同敌人抢时间，攀枝花的钢铁工业若搞不起来，“我睡不着觉”，“你们不搞，我就骑着毛驴去那里开会”；“现在不为，后悔无及”。

形势所迫。毛泽东这时的焦急不难想见。

战争从来就有打与不打两种可能，准备好了敌人不来怎么办，岂不造成极

大的浪费？毛泽东着力回答了这个问题：

“你天天说打仗，他不来打怎么办？那不变成了周幽王起烽火？这是我叫起来的，你不叫，打来了怎么办？战争不准备不行，有备无患。”

在毛泽东看来，后方建设起来当然是为了预备敌人来，而敌人如果不来也没有什么浪费，“粮食储存一些有好处，反正要吃的。棉布存一点也有好处，反正要穿的”。

毛泽东还强调，战备建设不能以牺牲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为代价：

“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

著名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就是根据毛泽东的这个讲话精神提出的。

三线建设主要强化的是我国的战略后方，侧重在物质上的准备。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担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后继续敌视中国，随着中苏边境压力的逐渐增大，毛泽东也反复强调在思想上准备打仗的重要性。他的话，句句苦口婆心：

“我们要准备，不但准备帝国主义整我们，还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合伙整我们。”

“军队过去是三大任务：打仗、筹款、做群众工作……我们还是要恢复过去的三大传统，要准备打仗，要生产，还要做群众工作。”

“设想如果出现了像日本占领时候的情况，到处被占领了，你没有两手怎么成？”

“准备打，也许打不起来，不准备打，打起来就措手不及了，这点在人民中间要进行宣传。”

1969年3月，苏联在中苏边境大肆增兵，军队多次在珍宝岛制造战端，解放军被迫反击。在听取战斗情况汇报时毛泽东说：“苏联现在在乌苏里江的挑衅，还不能联系到大战，这不过是一个开端就是了。但我们看了这样一个行动，就可以看到前途，看到它的社会帝国主义的野心。它甚至想首先消灭中国的原子基地。”

毛泽东进一步强调，应对战争威胁的办法，就是加紧战争准备，他说：

“南方各省都要准备两手，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打仗。东北、华北、西北要准备苏联来，南方各省要准备美国来。他们没有来，我们做好了准备，他们真的来了，我们也不吃亏。没有准备就要吃亏。”

一个多月后，毛泽东在九届一中全会上讲话，再一次指出，要在物质和精神上准备打仗：

“过去讲过的，就是要准备打仗。无论哪一年，我们要准备打仗。人家就问了，他不来怎么办呢？不管它来不来，我们应该准备。不要连造手榴弹都要中央配发材料。手榴弹到处可以造，各省都可以造。什么步枪、轻武器，每省都可以造。这是讲物质上的准备，而主要的是要有精神上的准备。精神上的准备，就是要有准备打仗的精神。不仅是我们的中央委员会，要使全体人民中间的大多数有这个精神准备。”

“我赞成这样的口号，叫做‘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准备好了敌人可能不来，准备不好敌人就可能来”，这句名言在五年后再一次被历史证明。中苏珍宝岛冲突，以苏军失利而告终。勃列日涅夫等苏联高层领导人大大为震怒。据美国媒体报道，苏联计划用导弹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在毛泽东的号召下，我国许多企业转向军工生产，国民经济处于临战状态，大批工厂转向交通闭塞的山区，北京等大城市开挖地下工事，最初即因备战而生的三线建设再次掀起了高潮。苏联最终没有对中国实施核打击，这其中当然也有苏联自身国际战略的权衡，但更重要的因素还是中国早已有所

准备。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曾评价说，若不是中国严阵以待，苏联有能力在30分钟内对中国的战略力量进行突然而致命的打击。没有充分的战争准备，后果不堪设想。

历史的演进充分说明，能战方能止战，要想消灭战争，必须拿起武器。战或不战，看似操之于人，实则操之在己。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毛主席说：我们要‘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

——《中共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1972年12月10日）

毛主席提出了一个口号，叫作“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这里就有个粮食问题。“广积粮”有两个作用，一是备荒，一是备战。“深挖洞”就是备战。“不称霸”，中国不仅现在不称霸，就是将来现代化了，我们也不称霸。

——邓小平会见日本青年团协议会访华团的谈话（1973年11月24日）

“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在20世纪70年代是影响深远的一句战略名言，出自毛泽东之口。但是，毛泽东最早是什么时候说出这句名言的，目前还没有准确的说法。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和《毛泽东年谱》等权威文献中，只是在注释里或采用引述的办法提到，“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一语出自毛泽东1972年12月10日对《国务院关于粮食问题的报告》的批语，但未明确说明是否为第一次提出。曾在林彪身边工作过的李根清曾撰写过回忆文章，说毛泽东是在1969年中苏关系高度紧张的背景下发出的“要准备打仗”的号召和“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的指示，一些研究文章也

指出全国各地大挖防空洞的时间是1969年，但缺乏权威的文献依据。

关于毛泽东第一次发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指示的具体时间，目前只能说有待考证。研究者比较普遍的看法，都认为毛泽东发出这一号召，是在读到元末儒士朱升向朱元璋提出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谏议后，因面临上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苏中美关系巨变的种种波折，有感而发。

朱升给朱元璋的谏议，短短9字却蕴含了丰富的政治智慧与斗争经验，比如“高筑墙”，若仅从字面上简单理解，就是城墙修得越高越好，而实际上朱升提出“高筑墙”主张，是建议朱元璋发展壮大武装力量。

同样道理，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号召，也不能简单地从字面上作肤浅解释，必须结合历史与时代背景，准确把握其科学内涵，完整梳理其理论体系，并在此基础上提炼出对今天的现实工作仍有指导意义的宝贵思想财富。

★ “广积粮”有两个作用：备战、备荒

邓小平对毛泽东的这句名言体会颇深，他说过，毛主席提出的“广积粮”有两个作用，一是备荒，一是备战。

毛泽东的备战备荒思想，发轫于延安时期的大生产运动。

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彻底停发了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军饷，并对陕甘宁边区进行全面经济封锁。华北华中地区，日伪军也对各敌后根据地展开了疯狂扫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因此遭遇了极严重的困难。各抗日根据地普遍遭遇粮食、医药、棉布、子弹、食盐以及其他日常用品严重短缺的状况，陕甘宁边区甚至出现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用、没有菜吃、没有鞋袜穿、冬天没有被子盖的严峻态势。

这对于本来就缺衣少食的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人民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早在1939年2月2日，为了克服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共中央就在延安召开生产动员大会，毛泽东在会上发出了“自己动手”的号召。人们纷纷在驻地周围的山坡、路旁、河滩等空地开荒种菜，还有人养鸡、养鸭、养兔，但是由于规模小以及经营分散等原因，收效非常有限。

1940年5月，朱德回到延安，发现这时的延安城与3年前相比，人多了，机关多了，东西却少了。昔日红火热闹的延安市场如今虽然还天天有集，但却冷清了许多，卖瓜果、蔬菜、肉蛋、蒸馍的少了，倒多了一些卖破旧家什、农具、牲畜的人。赶集人的脸色在黧黑之中带着些许忧郁。

为了扭转边区经济衰落的颓势，朱德、董必武和徐特立作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提出了利用边区盐多和羊多的两大优势发展贸易搞活经济的建议，毛泽东对此给予了全力支持。但是，当时最迫切的问题是粮食，在国民党全面封锁边区的情况下，仅仅依靠盐和羊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粮食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朱德提出“屯田军垦”的主张，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赞同。

1941年春，朱德带领几名工作人员和农业技术人员到南泥湾实地勘探。曾经流传这样一个故事：

一天，为部队勘察屯垦地点的朱德与警卫员在一片荒芜之地发现了炊烟，朱德说：“有人家！走，访访去！”

好不容易赶到一间破茅屋前，屋前是一位身材瘦小的老汉，朱德问他：“老哥，你好呵？这地方是啥位置？”老汉木讷地说：“南泥湾。”

朱德又问：“老乡哥。请问这里能打粮吗？”老汉说：“怎么不能？！这里我很熟悉，地肥得很哟！只是这里没一户人家……”

随后，朱德请这位姓唐的老汉当向导，一起勘查南泥湾的山林野谷、沟壑腐潭。大概是因为土地太肥沃，野蒿居然长到一人多高。还发现一片较开阔的谷地，土很松软，拔野蒿带起一大坨泥土，黑油油的。朱德抓了一把土，凑到鼻前闻了闻，又攥在手里捏了捏，立刻兴奋地说：“好土！好土！开荒种粮完全可以！”

这里面讲的就是南泥湾开荒和大生产运动的起源。后来，这位唐老汉在开发南泥湾过程中成了开垦部队的编外“顾问”。

不久，三五九旅在旅长王震带领下开进南泥湾，很快成为生产战线上的一面旗帜。经过几年艰苦奋斗，南泥湾面貌发生深刻变化，成为陕北的好江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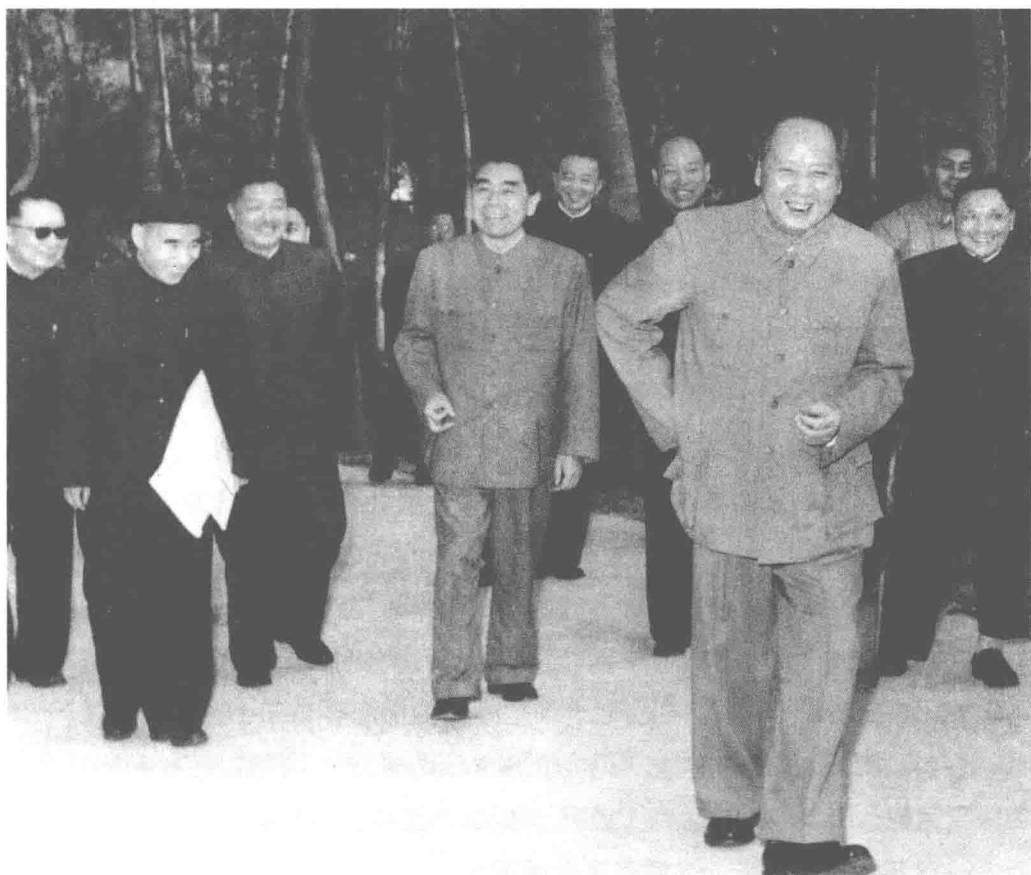


★ 八路军在南泥湾新开垦的土地上插秧。

★ 中国“深挖洞”，就是以我之有备待敌之不敢攻

邓小平在解读毛泽东的讲话时还说过：“深挖洞”就是备战。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毛泽东提出“深挖洞”的备战方针，主要是防备可能发生的中苏大战。此外，正如朱升提出“高筑墙”不是简单地强调修城墙而是建议朱元璋发展武装力量那样，毛泽东提倡“深挖洞”，也不是简单地号召全国挖防空洞，“挖洞”的目的是备战，“深挖洞”，是倡导把能够采取的备战措施作好，作深入，作细致，以我之有备待敌之不敢攻。



1969年3月2日，中苏边防部队在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战斗进行了30多分钟，中国边防军连续打退苏军三次冲锋。接着，3月15日、17日双方边防军又发生两次战斗，苏军进攻均被打退，此后苏军未再登岛进攻。据苏方统计，苏军在这三次战斗中阵亡58人，伤94人。有研究者认为：珍宝岛事件具有双重意义，它既是中苏已临战争边缘，两国关系无可挽回的标志；同时，它又为中美关系的恢复提供了契机。当时，中美苏三国正处在大三角关系中，大国之间关系的细小变化都将相互影响。就在中苏之间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的关系开始缓和，从而从政治上改变了当时的中苏力量对比。

★ 1960年2月，毛泽东接见在广州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全体代表。会议研究了人民解放军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等问题。右起：邓小平、毛泽东、彭真、罗瑞卿、周恩来、贺龙、林彪、聂荣臻。

珍宝岛冲突发生在1969年3月，尼克松访华时间是1972年2月，这中间整整3年时间，中美关系至少在表面上仍处于严重对立状态，中苏大战却没有发生。因此，有人把珍宝岛小打后中苏未大打的原因简单归结为“毛泽东拉了美国作帮手”，确实很难让关心这段历史的今人信服。事实上，珍宝岛小打未演变为中苏大打，关键要素是中国的备战工作做得好，而做好备战工作的前提，是我们对苏联领导层的战略动态作了准确的分析与把握。

1969年3月1日至16日，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叶剑英、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四位老帅先后4次座谈国防形势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苏联搞个珍宝岛事件，是为了巩固东欧。对我们搞点紧张是可能的，但要在中国大搞，这不可能。搞一个东欧国家动员了四五十万军队，苏联如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所以我们不要失去警惕，同时又要不要迷失方向，被现象所迷惑。

3月29日，叶剑英整理了一份《从世界的森林看一棵珍宝岛树》的报告，与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共同署名上报毛泽东。

事实证明，老帅们对苏联领导层的分析是准确的，当然，还有一个变数是无法预测的，那就是苏联军界高层中“鹰派”的暗流。

1978年叛逃到美国的苏联驻联合国副秘书长阿·舍甫琴柯后来回忆说，当时，苏联国防部长安德烈·格列奇科积极主张推行无限制地使用核武器“一劳永逸地消除中国威胁”的计划，而另外一些人则主张对中国用有限数量的核武器进行一种“外科手术式的攻击”，摧毁其核设施。其实这两种主张并无本质区别，都赞成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不同之处仅仅是使用核武器的数量而已。

不过，赞成这两种手段的人并不多，即使后一种手段，第一副总参谋长尼古拉·奥加尔科夫也表示反对，他认为太过冒险，因为中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丰富的游击战知识和经验，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是否轰炸中国的问题上，苏共政治局分歧严重并陷入僵局，有好几个月不能就此作出决定。只好一边让反对对华开战的柯西金联系中国协商缓和，一边听由元帅和将军们继续讨论对华开战的策略与方案。

在这决定历史走向的关键时刻，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方面采取了一系列

有力措施，最终有效避免、制止了中苏大战的发生。1969年9月23日，中国进行了首次地下核试验；9月29日，又在西部地区成功爆炸了一颗氢弹；同时还增加了我国东北、西北地区的中程导弹数量。

美国外交界一直坚持一种说法，称当时苏联曾与美国联系，询问如果对中国发动核打击，美国会采取何种态度。由于美国表示坚决反对，苏方才未敢发动对华战争。

事实上，中苏最终没有大打，主要由于以下三点原因。

第一，部分苏联军事将领认为“一两颗原子弹难以奏效，反而会使苏联陷入一场如美国在越南那样的没完没了的战争”，因此，在苏联决策层中赞成对华使用核武器的人“并不多”。

第二，苏联如在中国大搞至少要300万兵力，这谈何容易。

第三，中国方面备战措施有力，不仅做好了应对核战争的准备，还及时研制出能够把近25厘米厚的钢板打穿的新式破甲弹、穿甲弹，为在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中战胜苏军装甲部队做好了必要准备。以上举措，在苏方决策层徘徊于两种战略抉择间举棋不定的历史关键时刻，给了对手震撼性的心理威慑，从而有效消弭了中苏两国爆发大战的危险。

★中国“现在不称霸，将来也不称霸”

邓小平在解读毛泽东的“不称霸”时，这样明确地说过：“中国不仅现在不称霸，就是将来现代化了，我们也不称霸。”邓小平的解读，既反映了毛泽东的思想内涵，也反映了中国人的哲学和中华民族的精神。

在国际交往中处理国与国关系、称霸与不称霸的主要区别，在于交往各方彼此是否真诚平等相待。冷战时代，美国作为资本主义阵营的领头羊，和自己的盟友关系非常僵，美法、美日关系都曾发生龃龉。苏联作为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大肆推行沙文主义，出兵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结果为日后华约的解散与苏联的解体埋下了祸根。与美苏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中国倡导和平外交，主张国家无论大小强弱一律平等，相互尊重，和平共处。这一点，在中国与非洲国家的交往中，表现得尤其明显。

20世纪60到70年代，非洲国家相继开展反对殖民主义争取主权独立的民族解放斗争，毛泽东等我国老一辈领导人对此给予坚定支持，毛泽东说：“所有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的共同历史任务，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发展民族经济和发展民族文化。”他向非洲朋友表示，我们不仅要帮助非洲国家赢得独立，还要帮助你们建设国家。在非洲人民争取国家独立的斗争中，中国和非洲人民、中国领导人和非洲各国领导人之间，结下了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

有史学家以加纳总统恩克鲁玛为例，记述了中非之间的关系：

恩克鲁玛是非洲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泛非主义和泛非运动著名倡导人之一，深受非洲人民尊敬。他于1961年9月访华，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陪同赴杭州会见毛泽东主席。当时，恩克鲁玛邀请周恩来访问加纳，周总理欣然允诺，计划1964年1月11日至16日前往。但是，就在周恩来访加前9天，发生了谋刺恩克鲁玛未遂事件，得知上述消息后，周恩来与陈毅、黄镇、乔冠华一起商议，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按原计划仍赴加纳访问。他说，我们不能因为人家遇到暂时的困难就取消访问，这是不尊重人家，不支持人家。这个时候去才能体现我们是真正的友好，真正患难的友情。至于外交仪式，我们可以打破通常的礼宾惯例。他指派副外长黄镇先去加纳，向恩克鲁玛转达他的慰问，并告之他将如期访加以及中方的具体想法：考虑到总统的安全，礼宾安排方面可以从简，在周恩来抵离加纳时请总统不必赴机场迎送，也不必来中国代表团下榻的宾馆，国宴、会谈都可以安排在总统的住处进行。恩克鲁玛听了中方的意见后，甚为感动，连连道谢。中国总理这种大无畏精神和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崇高品格，很快在非洲国家间广泛传开。加纳报纸称赞说，中国是加纳在反帝反殖斗争中最可靠的朋友。

中国人民的真诚相待，换来了非洲人民的真正友谊，在后来的第26届联大上，热情的非洲朋友极力主张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驱逐

蒋介石集团的代表。

1971年8月2日，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发表声明称：“美国将在今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中，支持要求中华人民共和国入会的行动。同时美国将反对任何排除中华民国剥夺它在联合国代表权的行动。”这是一种典型的“两面派”做法。随后，美国、日本等国提出了保留台湾联合国席位的“双重代表权案”。8月20日，中国政府外交部发表声明，严正驳斥了美国国务院这一荒唐主张。

有人记录了联合国表决时非洲朋友真心支持新中国政府的场景：



★ 1959年5月15日，毛泽东和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朋友们在一起。

1971年10月25日晚，第26届联大关于“中国代表权问题”的辩论结束，会议进入表决阶段。大会先对美、日等国的议案进行表决，结果以59票反对、55票赞成、15票弃权被否决。当大厅电子计票器显示出这一结果时，灯火通明的会议大厅顿时沸腾起来，爆发出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阿尔及利亚、博茨瓦纳、布隆迪、喀麦隆、埃及、赤道几内亚、加纳、几内亚、肯尼亚、马里、毛里塔尼亚、摩洛哥、尼日利亚、卢旺达、多哥、乌干达、坦桑尼亚等17个非洲国家常驻代表情不自禁地从代表席上站立起来，高声欢呼胜利，坦桑尼亚常驻代表则离开代表席位尽情地跳起舞来，出现联合国从1945年创立以来少见的欢乐场面。

接着，大会表决阿尔及利亚等非洲23国提案。在表决之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布什要求发言。他快步走上主席台，对着全体成员国代表说，美国代表团要求从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中删掉关于立即驱逐蒋介石集团代表出联合国的内容。他话声一落，从非洲等许多代表团的席位上发出一片又一片反对声，“No!”“No!”声响彻大厅。经大会主席、印度尼西亚外长马立克裁决，布什的提议不被接纳。随即表决阿尔及利亚等非洲23国提案，最后大会以76票赞成、35票反对、17票弃权予以通过。联合国历史上有名的第2758号决议从此诞生。

大会主席高声宣布：由于阿尔及利亚等23国提案获得通过，美国、日本等19国的“双重代表权”提案成为一项废案，被大会自动否决。这一庄重的宣布刚一结束，会议大厅再次出现长时间热烈欢呼和鼓掌的场面。吴丹秘书长当即表示：“恢复了世界上人口最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席位，联合国才能说真正开始了工作。”

当晚，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美国广播公司（ABC）以特大重要新闻插播方式，在三大电视台上广播了这一消息，称“红色中国获准进入了联合国，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将到来”。

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席位的过程，恰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不称霸”的主张得到世界人民认可的结果。

单纯从字面简单理解，“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就是挖防空洞，多打粮食，不追求霸权地位。但是，如果结合历史与时代的发展脉络对这句话作全面综合的学习与研究就会发现，这看似简单平常的一句话，蕴藏着极深邃的思想内涵。

“广积粮”是如何实现的，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深入群众作调查研究。“深挖洞”作为一项备战措施，绝非深挖防空洞那样简单，一个“深”字代表的是把备战措施真正做到位的备战深度。备战到位，首先要知彼，知道对方的优势与劣势，还要知己，了解自己的短板，还要知晓利用自己手中的人才与战略资源，可以采取哪些办法补短板。“不称霸”，不仅是一个口号，更是一项国际

斗争策略。古往今来，大国多凭借实力建立霸权，再通过推行霸权谋求利益。中国则坚决不称霸，在国际交往中以诚待人，结果在赢得真诚友谊的同时，也维护了国家权益。

极简单的一句“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反映了毛泽东对战争、外交、经济等多领域复杂问题的科学认知，这一认知体系的形成是长期斗争与建设实践的必然产物，是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共同的心血和智慧的结晶。



“备战、备荒、为人民”



“此事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

“现在虽然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这是最好地同时为国家的办法，还是‘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的老话）的口号，究竟能否持久地认真地实行，我看还是一个问题，要待将来才能看得出是否能够解决。”

——毛泽东：《关于农业机械化问题的一封信》（1966年3月12日）

“备战、备荒、为人民”，是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和党中央推动三线建设大战略时提出的响亮口号。“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口号，在当时的中国可谓家喻户晓，在人民解放军中更是人人皆知并以此为已任。无论是在大喇叭广播里，还是在遍布城乡的标语里，到处都能听到或看到这7个大字。这7个字的口号，在当时是人们引用最多、叫得最响的毛泽东话语中的一句。那么，这句口

号是何时提出的，它的背后又有着怎样一段轰轰烈烈的历史经过呢？

★毛泽东“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被周恩来概括出来

“备战、备荒、为人民”这个口号的提出，和1965年前后党中央主持编制新中国第三个五年计划一事有着密切的关系。

进入1964年后，毛泽东对国民经济发展方针有了一些新的考虑。当时，中国周边战争形势日趋严峻，他大大加强了对备战问题的考虑和重视，强调要加强三线建设。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三五”计划对投资项目和主要生产指标进行了调整，从准备应付帝国主义早打、大打出发，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抢时间把三线建设成具有一定规模的战略大后方。

一年后的1965年6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汪庄听取余秋里关于编制“三五”计划的汇报。当余汇报到“三五”计划的投资规模时，毛泽东指出，必须把老百姓放在第一位考虑。他说：

我看五年搞一千零八十亿元的建设规模是大了，留的余地太少了。少搞些项目就能打歼灭战，大了歼灭不了。不要搞一千个亿，搞个八百亿、九百亿。一九七〇年那些指标不要搞那么多，粮食四千八百亿斤能达到吗？要考虑来个大灾或者大打起来怎么办；钢一千六百万吨就行了。你这个数字压不下来，就压不下那些冒进分子的瞎指挥。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第二是打仗；第三是灾荒。

随后8月23日，周恩来在国务院第158次全体会议上说：

主席提出要我们注意三句话，注意战争，注意灾荒，注意一切为人民。这三句话，我想合在一起顺口点，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计划要考虑这三个因素，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周恩来把毛泽东思考的三个重点，用一句简明的话表达了出来，这就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最初的由来。

周恩来的概括，得到了毛泽东的认可。从现有文献中看，1966年3月12日，毛泽东就有关农业机械化问题给刘少奇的回信中，正式提到了这个口号。毛泽东说：农业机械化问题，“应与备战、备荒、为人民联系起来，否则地方有条件也不会热心去做。第一是备战，人民和军队总得先有饭吃有衣穿，才能打仗，否则虽有枪炮，无所用之。第二是备荒，遇了荒年，地方无粮棉油等储蓄，仰赖外省接济，总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困难更大。而局部地区的荒年，无论哪一个省内常常是不可避免的。几个省合起来来看，就更加不可避免。第三是国家积累不可太多，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口粮还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再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三则更加要为地方积累资金用之于扩大再生产着想”。

毛泽东还特别提到了“提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口号”这件事，意在提醒中央和地方的同志要“持久地认真地实行”。

1967年4月，“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作为“毛主席语录”在《人民日报》上正式公开发表，很快就在中国大地上广为流传。这个口号后来多与“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连在一起使用，成为一段时间内中国国际战略防御构思一个总的概括。

★紧张备战的原因：60年代中国周边战争疑云密布

毛泽东在第一位考虑老百姓的前提下，为何要把备战摆在如此突出的位置，大力推动三线建设战略的实施？那是因为当时中国周边战争已然疑云密

布，毛泽东和党中央不得不对此形势作出战略选择。然而，那段剑拔弩张、千钧一发的历史经过却又鲜为人知。

上个世纪60年代初，中国当时刚刚经历过三年困难时期，正处在国民经济恢复时期，此时急需一个稳定的外部环境，以配合国内调整。然而，周边安全形势不仅没有稳定下来，反而越发跌宕起伏、杀机四伏。未雨绸缪的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时刻关注着这些外部挑战，思索着诸多问题背后的关联、本质和走向，思索着应对的措施，为中国的发展和安​​全日夜操劳着。三线建设的决策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作出的。

这一系列外部挑战，可以从1962年中印边界爆发的那场短暂冲突谈起。这一年的10月17日，2万多名印度军人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同时发动大规模进攻。当天，毛泽东召集中共中央会议，果断决定进行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央军委随即下达《歼灭入侵印军的作战命令》。10月20日，中国边防部队在中印边界东西两段开始进行自卫反击。

这场自卫反击战历时一个月，前后包括两个阶段：1962年10月20日至29日是第一阶段，11月16日至21日是第二阶段。自卫反击战开始后，中国边防军在东西两线的作战都迅速取得重大进展。在中国边防军的英勇反击下，印军随后发起的进攻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通过两个阶段的反击作战，中国边防部队在东线全部收复了“麦克马洪线”以南的领土，在西线全部肃清了印军的入侵据点，全线推进到中印传统习惯边界中国一侧距边界20公里处，取得了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作战的彻底胜利。

然而，即使在军事上取得了重大胜利，但为了维护中印关系大局，保持外交斗争的主动，11月20日，毛泽东和刘少奇、周恩来等研究决定：中国边防部队全线主动停火、主动后撤。到1963年2月28日，中国全部完成边防部队后撤计划和建立民政检查站的部署。此举向世界表明了“谁爱好和平，谁要战争”，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重和战略上的主动权。这一反击作战，挫败了一些扩张主义者的反华阴谋。

对印自卫反击作战，是在中方长期忍让却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才作出的有力回应。自1959年开始，印度方面便不断挑起边界争端，其背后有着很深的国际背景，同国外反华势力一直以来图谋插手中国西藏内政有着千丝万缕的联

系，印度右翼势力对华政策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策略。中国军队胜利后主动撤退，此事却余波未平。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均极度歪曲事实经过，指责中国政府。中印之间发生的这场军事冲突随后产生了一系列深远的影响。

中印边界冲突之后，中美中苏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极为复杂的变化。不久，中苏论战也拉开了序幕。

中苏关系恶化导致中国周边安全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而愈加频繁的中苏边境事件，则更加引发了中方的担忧，进而恶化了中国周边的安全形势。

在新疆，自1960年起，苏联方面就不断在边境挑起事端。从1960年8月苏联在中国新疆博孜艾格尔山口附近挑起第一次边界事件起，中苏边境地区便不安宁了。据有关数字统计，从这时起到1964年10月，共发生1000余起边境纠纷。1962年3月至5月间，在新疆伊宁、霍城、塔城等地区出现了6万多居民在苏方策动下越境前往苏联的情况。1962年中印发生的边界战争，令本已风雨飘摇的中苏关系更加雪上加霜。

中苏矛盾的不断激化，特别是边境纠纷的愈演愈烈，使中共中央逐步认识到一旦在其他战略方向发生战争，苏联已经不能作为中国稳固的战略后方了。1964年4月9日，时任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向毛泽东报送了在新疆防范苏联军队进攻的备战方案，正是这一深层忧虑的体现。中国当时面临着多面受敌的险恶处境。于是，毛泽东开始思索调整战略部署、加强战略后方这一更深层次问题，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可以说，中印、中苏关系的恶化成为随后中国重新调整战略后方部署、推动三线建设、加紧备战的重要原因。

可是，纵然当时的中苏、中印关系已经陷入很困难的境地，甚至在边境发生了局部军事冲突，然而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却始终有一个清醒的判断，认为中国的主要战略对手仍然是美国。特别是越南战争的扩大化，引起毛泽东的高度警惕，直接促使他和其他中共领导人下决心全面开展三线建设。

1964年“北部湾事件”发生以前，美国曾经不断增兵进驻南越，这已经引起毛泽东的担忧，但美方一度把不越过北纬17度线作为避免与中国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红线来遵守。然而1964年8月5日“北部湾事件”发生以后，事情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美国直接越过北纬17度线对北越实行大规模轰炸，越南战事严重升级。1965年3月，美国派遣海军陆战队在岬港登陆，随时准备进犯北越，

美国军用飞机不断入侵中国海南岛、云南、广西上空，投掷炸弹、发射导弹、打死打伤边防战士，露骨地对中国进行战争威胁。“北部湾事件”是越南战争的重大分水岭。

美国国会于1964年8月7日通过北部湾决议案，授权总统以他的判断动用包含武装力量在内的一切行为来应付此事件。这事实上给予了美国总统林登·约翰逊在不经宣战的情况下发动战争的权力，于是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参与程度无可避免地不断攀升。

美方不断挑战中方战略底线以及美国国内政治局势发生的变化，使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不得不对有可能爆发的战争进行准备。

1964年5月15日至6月17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在这次会议期间，毛泽东正式提出了三线建设的战略任务。5月27日，毛泽东在中南海菊香书屋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主要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对三线建设注意不够，一个是对基础工业注意不够。毛泽东说：

“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要准备上山，上山总还要有个地方。”

在毛泽东的直接推动下，新中国历史上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由此拉开大幕。

★ 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

三线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西南、西北地区（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大三线”，各省份自己靠近内地的腹地俗称“小三线”。“大三线”又是其中的重中之重。

为了全面推进三线建设，国务院进行了明确分工：三线建设新扩建工厂，由国家计委负责；一、二线向三线地区迁移的重要工厂，由国家建委负责；为三线建设提供原料、设备，由国家经委负责。在此基础上，1964年9月，国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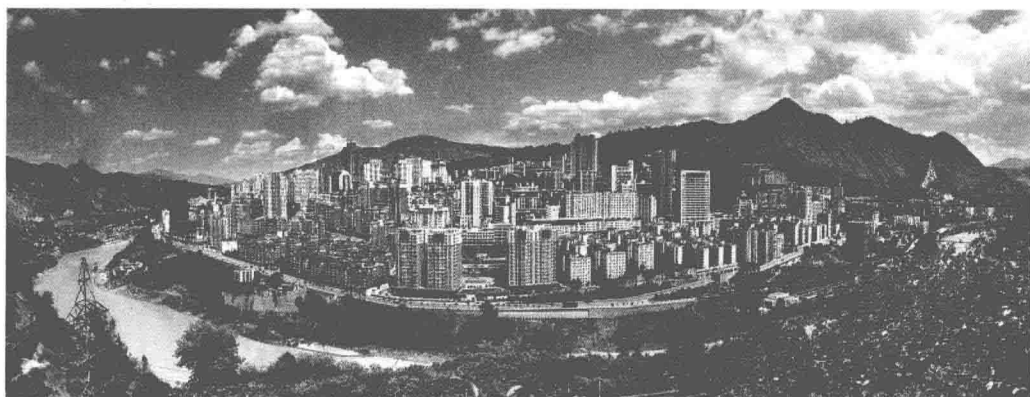
★ 毛泽东说：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在原子弹时期，没有后方不行的。1965年，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李富春等到西南三线考察。

院成立了三线建设支援和检查小组，负责从总体上组织、统筹、督促、检查三线建设项目进展情况。

1965年3月、1966年1月、1966年3月，中共中央又相继批准成立了西南、西北、中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分别由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中南局第二书记王任重担任委员会主任。

在各大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之下，各省、自治区也成立了相应的三线建设领导小组，负责人均为当地主要领导同志。这样从中央到地方，形成了一个完整有力、分工明确的三线领导机构，对于有效调动各方资源，全力推动三线建设开展，发挥重要保障作用。

随着调研、勘探、选址工作的进一步深入，三线建设的重点不断突出。分别包括：建设攀枝花、六盘水、酒泉三个钢铁工业基地；建设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重点建设成昆、贵昆、川黔三条铁路线；三线动力系统建设等。



从1964年启动到1965年，短短两年时间不到，三线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就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在西北、西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到300多项。

| ★ 今攀枝花市。

1966年4月17日，余秋里在向中央的汇报提纲里，详细介绍了三线建设开展头两年各方面工作取得的重要进展。其中说：

“经过一年多的实践证明，原设想的第三个五年计划，有可能提前两年实现。就建设来说，大小三线的许多重大项目，现在看，可以提前一年或两年建成。

攀枝花铁矿，1968年可以基本建成年产650万吨矿石的生产能力。甘肃酒泉镜铁山铁矿，1968年可以建成年产350万吨矿石的生产能力。

贵州六枝、盘县、水城三大煤矿区，原计划在1970年达到770万吨的生产能力，1968年可能达到这个水平。

冶金工业在大三线配合国防工业的项目，除遵义薄板厂以外，1968年都可以建成或者基本建成。

刘家峡水电站，原定在1970年安装的第一台22万5千千瓦的机组，1968年就可以安装起来。”

.....

报告令人振奋地汇报了进度：“就生产来说，1970年的主要生产指标，大部分在1968年可以完成，有些明年就可以完成。”其中，钢、棉纱、石油、棉花，1967年就可以达到或超过1970年的计划指标；煤炭、发电量、有色金属、机床、化肥、粮食等1968年可以完成1970年的计划指标。

报告肯定地说：

从现在的情况看，三年的时间完成原定五年计划的主要指标，是完全可能的。

三线建设在头两年就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第三个五年计划在三年内完成，这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充分显现了社会主义制度下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

轰轰烈烈的三线建设，在新中国的历史上影响深远。累计2000多亿元的投资，上千万的劳动大军，波及13个省份，长达16年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跨度，总计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特别是三线建设强调对工业体系的投资，为后来西部地区的发展，乃至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都打下了坚实基础。

让我们看看其中的一些成绩：

三线建设过程中，建成川黔、贵昆、成昆、湘黔、襄渝、阳安、太焦、焦枝和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段等10条干线，以及一些支线和专用线，共新增铁路8046公里；

建成贵州六盘水，四川宝鼎、芙蓉，陕西韩城、铜川，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煤矿区，新增原煤开采能力达11211万吨；

建成葛洲坝等大中型水、火电站68座；

新建攀枝花等钢铁工业企业984个，有色金属工业企业945个；

等等，不胜枚举。

西昌、攀枝花属于大凉山彝族地区，费孝通1991年到那里考察后，感慨地说：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

通过三线建设，我国在中西部地区初步建成了相当规模、门类齐全、产研

结合的国防科技工业体系，这样一个巩固的战略大后方，为国家长远的安全提供了重要保障。对中华民族的长久繁荣发展而言，这是一项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伟大壮举。

三线建设还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艰苦的建设环境所培育出的吃苦耐劳、人定胜天的“三线精神”是无论哪个时代都需要的。千千万万的三线建设者，他们的感人事迹汇流成河，印证了中华民族不懈奋斗的顽强精神，值得一代又一代中国人去缅怀和继承。广大三线建设职工发扬了爱国主义精神，把三线建设看作是神圣的事业，不管有多大困难都全力以赴。只要一声令下，家可以撇下，背上背包，立即奔向党所指定的地方。行动之快，不亚于军队接受战斗命令。在任何艰苦的条件下，都不退缩、不逃避，迎着困难上，充分表现出一种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三线建设的决策，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中国面临严峻外部挑战的背景下作出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是伟大的战略家。自美国1961年派兵进驻南越开始，他就已经在密切关注对手的动向了。事实证明，毛泽东当时作出的很多预见是极其准确到位的。例如，1963年8月29日，他就指出：“吴庭艳是美帝国主义的一条忠实的走狗。但是，如果一条走狗已经丧失了它的作用，甚至成为美帝国主义推行侵略政策的累赘，美帝国主义是不惜换用另一条走狗的。”仅他作出预言两个月后，即1963年10月初，肯尼迪决定了推翻吴庭艳政权的政变。11月初，吴庭艳兄弟二人在政变中被杀。再比如，毛泽东最早在中央决策层面强调三线重要性的时间点是1964年5月，而越战的转折点——北部湾事件是当年8月。这3个月的提前量，为备战争取了极为宝贵的时间，同时充分证明毛泽东的预见是极其准确的，他当时已经准确估计到了美国的战略意图，并着手进行战争准备了。没有这样的战略判断以及随后备战的努力，其后果不堪设想。

可以看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作出加强备战、推动三线建设的决策，不是一时之举，而是有着充分的历史与事实根据的。人们不能简单地用事后战争并没有发生这一结果，来责备前人作出的决策。

历史的吊诡之处，正在于其往往事与愿违，在某种程度上，准备打恰恰是为了不打，只有做好了最坏的准备，才能争取最好的结果。

关于这个道理，1963年9月，毛泽东在有关部门送审的《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上加写了一段话，其中说道：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

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

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1965年6月，毛泽东还说过：

“一件事情，不能看得那么容易。有人想三线建设好了再打仗，我看美帝国主义不会等你的。它是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它等你建设起来才打？也可能建设不起来就打，也可能建设起来又不打，要有两手准备。”

反观之，如果我们在那种紧张环境下不去积极备战，而是坐等局势好转，恐怕谁都不能保证当时已然密布重重的战争疑云真的会烟消云散。

正像“备战、备荒、为人民”口号所要表达的那样，备战从根本上还是为了人民群众的安康福祉。作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的决策者，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决不能存在侥幸心理，必须具备底线思维，从最坏处着手做准备。即使后来战争并没有发生，但这种充分的准备无疑是必须作出的选择和努力。这是三线建设决策留给后人的一条宝贵经验。



毛泽东

MAO
ZEDONG



讲辩证战争观

“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

“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

对待战争“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



“战争与和平是互相转化的。战争转化为和平，例如第一次世界大战转化为战后的和平，中国的内战现在也停止了，出现了国内的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例如一九二七年的国共合作转化为战争，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什么是这样？因为在阶级社会中战争与和平这样矛盾着的事物，在一定条件下具备着同一性。”

——毛泽东：《矛盾论》（1937年8月）

“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毛泽东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

战争与和平之间可以相互转化，是毛泽东早在1937年写作《矛盾论》时通过分析中外战争史得出的结论。毛泽东在这里从哲学的高度，剖析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战争可以转化为和平，和平也可以转化为战争，但都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这一结论，并不是单纯思辨的结果，而是对中国革命战争经验和世界战争经验的深刻总结。

★和平时时期要警惕战争危险

从和平到战争并不是突然的，总有一个过程，总是有迹可循。一方面，引起战争原因的矛盾的累积激化有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战争的酝酿和准备也有个过程。

1924年开始的第一次国共合作，开启了国民大革命的新局面。1926年11月，北伐军在江西战场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蒋介石的反共活动就已经开始日益公开化了。1927年3月6日，他指使国民革命军驻赣新编第一师诱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中旬，他指使青洪帮流氓捣毁左派占优势的国民党九江市党部和九江总工会；3月下旬又指使暴徒在安庆捣毁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安徽省党部和总工会、农民协会。在这种情况下，党内一些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阀背叛革命只是时间问题了，警告人们对右派的分裂活动要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和实际工作中的准备。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的郭沫若也在4月9日发表长文《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其中写道：“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但是，当时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却认为这一看法是根本错误的，在实际工作中采取了右倾的错误方针，压制正在蓬勃高涨的工农运动的发展；甚至在1927年3月底还提出“要缓和反蒋”。这使全党放松了警惕，误以为局势不会发生突变。结果，4月12日，蒋介石突然发动反革命政变。随后，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东、广西等省也相继以“清党”为名，大肆捕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大革命遭受严重挫折。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又把汪精卫看成国民党左派，对其无原则退让。结果汪精卫也很快倒向



| ★ 1937年的毛泽东。

反革命阵营，以“分共”名义正式同共产党决裂，大肆屠杀共产党人。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宣告失败。共产党也正如后来毛泽东所说的“被人家一巴掌打在地上”，摔得很惨。

这一次跌跤给了中国共产党人深刻的教训。在统一战线中不能很好地把握合作与斗争的矛盾关系，也反映出我们对和平与战争的关系问题缺乏深刻的认识。我们是真诚合作并爱好和平的，但是有时候斗争的复杂性或战争的潜在性并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我们不能被暂时和平的假象所迷惑，不能把暂时的和平当作永久的和平，不能对斗争性缺乏认识，更不能对可能发生的战争丧失应有的警惕。

对战争丧失应有的警惕，还有一个典型例子，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美英法等国对法西斯主义采取的“绥靖政策”。



★ 毛泽东著《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1937年版本（《实践论》《矛盾论》是其中的两节）。

20世纪30年代初，资本主义世界在经历了空前经济危机袭击后，相互间争夺加剧，在欧洲和亚洲分别出现了德、日两个战争策源地。但是，面对不断挑战一战后国际秩序的日本和德国法西斯，美、英、法等西方大国出于本国利益，一味姑息、纵容，奉行“绥靖政策”，缺乏应有的警惕性，最终引火烧身。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将日本侵略行径诉诸国际联盟，国联并没有对日本采取任何有效的制裁措施，进一步助长了日本在中国扩大侵略战火的野心。1935年意大利侵略埃塞俄比亚，1936年德意武装干涉西班牙，1938年德国吞并奥地利，对这一连串的侵略扩张罪行，英、法、美等国仍袖手旁观。1938年9月29日，英、法、德、意四国首脑甚至在德国慕尼黑举行会谈，背着

捷克斯洛伐克签订出卖捷克斯洛伐克的“慕尼黑协定”，将绥靖政策发展到顶点。时任英国首相张伯伦是“慕尼黑阴谋”的积极策划者，他在协定签订后，自称带回了一代人的和平。但不到一年的时间，1939年9月1日，德国闪电袭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大战爆发后，英、法对德虽已宣战，但仍然怀着希特勒不会进攻西线的幻想。结果，1940年，希特勒又在西线发动闪击攻势，英国溃败，法国投降，英、法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1939年爆发的，可是毛泽东在1937年写作《矛盾论》时就已经指出：

“现在的世界和平局面也可能转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作出这样的预见？原因即在于，毛泽东看出，和平与战争相互转化的背后，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得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表面上得到缓和，暂时获得统一，于是有了暂时的和平；但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在一战中并没有得到根本解决，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经济危机后，又进一步得到了激化，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不可避免。

毛泽东还有一次关于战争的预见，至今仍为人们所津津乐道，那就是对中日战争的预见。早在1916年7月，他在给友人萧子升的信中就分析认为，日本是中国的劲敌，中日之间“二十年内，非一战不足以图存”。他提出：“欲完自身以保子孙，止有磨砺以待日本。”从1916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其间正好相隔20年。

毛泽东之所以能屡屡作出这样和平转化为战争的“神预见”，这并不是偶然的。根源即在于，他不只是从表面看待事物，而是看其本质，看内在矛盾的运动发展。战争并不是一夜之间来临的，在战争之前的所谓平时时期，表面上是和平，但在和平的背后是暗流涌动，是磨刀霍霍，是相互试探，是壮大实力。正是这些背后的因素，使得和平一步步走向战争。也正如毛泽东自己1957年1月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所说的：“战争与和平既互相排斥，又互相联结，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平时时期不酝酿战争，为什么突然来一个战争？”毛泽东这一问，意在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对战争与和平问题，要有辩证思

维，要时刻关注矛盾双方的转化，尤其在平时时期，对潜在的战争因素要有高度的警惕性。

★争取和平需要敢战善战

当战争或战争挑衅已经发生时，如何对待战争呢？毛泽东的回答是，必须以战止战，“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1938年底之后，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这时的国民党，一方面仍然留在抗日阵营内，另一方面又不愿坐视共产党军队的一步步壮大，于是提出防共、限共、融共的主张，并且不断挑起与八路军、新四军的摩擦斗争。对此，毛泽东提出要坚持“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和“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对以蒋介石集团为代表的国民党顽固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以斗争促团结。在此原则指导下，从1939年冬至1943年春，中共中央及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先后打退国民党顽固派的三次反共高潮。特别是在1943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期间，中共中央一方面在军事上积极部署，做好一切自卫反击准备；另一方面又在政治上进行强力反击，公开揭露国民党的阴谋，使得第三次反共高潮在尚未发展成大规模武装进攻时便被制止。

打退三次反共高潮的实践，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关于以战止战思想的正确性。对于顽固派投降的危险、分裂的危险、倒退的危险，我们一方面要高举团结抗战之大旗，强调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另一方面又要以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的两手，进行坚决的反抗。这表面上是一种“不和”，实际上是为了更好地“和”，是为了更好地团结绝大多数人共同抗日。如果一味退让，反而会使反动势力日趋嚣张，和平更加无望。

在对待日本侵略者的问题上，毛泽东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也高超地运用过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取得全面性胜利。但是，看似和平的背后，依然有一些负隅顽抗的日本军国主义者，勾结国民党方面的反动势力在向我军新防区发动攻击。抗战胜利后，敌我关系、国共两党关系以及国际关系极为复杂。毛泽东曾说过：抗战胜利后形势复

杂，“我们的军队不去打，敌伪就不缴枪”。在新四军防区，就有这样的事。据《新华日报》报道：盘踞高邮的有千余日军，对我解放区威胁尤大，“敌寇投降迄今，国民党反动派不但不收缴该地区之敌伪武装，反而三令五申地飭所驻敌伪除加筑工事外，并不断向我淮南苏中等解放区骚扰，其声势有甚于往昔”。

根据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批示精神，1945年12月19日至1946年1月初，新四军华中野战军第七、第八纵队以及苏中军区等部队在粟裕指挥下，向盘踞在江苏高邮一带的日军和伪军发动进攻，一举歼灭日军1200余人、伪军1万余人，以完全胜利结束了对日军的最后一次战役。高邮战役的胜利，再一次诠释了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抗美援朝战争期间，毛泽东关于“和”与“战”的辩证关系的战略思想，更是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充分运用。

1951年6月，朝鲜战争已经进行了整整一年，美军接连遭受中朝军队的打击，伤亡惨重，已经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在国内国际舆论的强大压力下，美方不得不接受中国关于停战谈判的建议。但是，美国并不是真心想谈判，他们从谈判一开始就采取拖延和破坏的政策。在讨论确定双方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地区时，美方以他们占有的海空优势应该在陆上取得补偿为由，要求在双方目前战线以北18公里至50公里处另划一条新的军事分界线；在无理要求遭到拒绝后，美方又接连制造事端：在板门店地区射击中朝徒手人员；武装侵入中立区，袭击中朝方面军事警察；甚至轰炸我方代表团住所。这些使得停战谈判无法继续而陷于中断。俗话说，战场上得不到的，谈判桌上也不会得到。为了推动谈判继续进行，我方对于美方不断升级的挑衅和破坏活动，立即给以坚决、果断的回击。美方被迫于1951年10月重回谈判桌。经过半年多的激烈争论，双方终于在确定军事分界线、实现停火和监督停战等问题上达成初步协议。但在战俘遣返问题上，由于美方坚持无理要求，谈判再次陷入僵局。

1952年10月，美方又玩起单方面宣布中止谈判的把戏；甚至还向上甘岭发动了大规模攻势。为了给予敌人有效打击，反击他们的无理要求，打消他们的幻想，中国人民志愿军在40多天内，打退敌人900多次冲击，歼敌2.5万多人。战场上的失败，迫使美国不得不又一次回到谈判桌上来。

1953年4月，停战谈判再次复会。为了加速战争的结束，1953年5月到7月



★ 1957年4月，毛泽东接见解放军通讯兵首届技术竞赛大会代表。右起：邓小平、陈叔通、李济深、毛泽东、彭德怀、王净、黄炎培、朱明。

间，朝中人民军队又连续发动三次夏季攻势，将战线南移，使美国感到战争拖延下去，只会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损失。这样，在形势更加不利的情况下，美国侵略者不得不在7月在板门店同朝中方面正式签订军事停战协定。

朝鲜战争中这种和平与战争的局面转化，正如毛泽东在1958年所总结的：“和平是战争的反面，没有打仗哪会有‘和平’二字。三八线一打仗是战争，一停战又是和平。”可以说，没有我们针锋相对的斗争，没有我们以打促谈的方针，停战协定是不会最后达成的，和平也不会来临。

★维护和平离不开军事斗争准备

在和平年代，如何正确处理和平与战争的辩证关系？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所反复思考的问题。他强调，我们希望和平，但是也要做好战争的准备，要有备无患，不能丧失警惕。

毛泽东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是：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新中国成立后，他从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出发，多次表达过自己的态度。

1955年1月28日，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向毛泽东递交国书。在谈到国际形势和战争危险时，毛泽东说：

“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我们对共产党员和全国人民就是这样进行教育的。”

1956年1月，毛泽东在审阅政府工作报告时，将其中的一句话修改为：

“我们要求和平，但是如果国际侵略集团把战争强加在我们头上的话，我们也并不惧怕战争。”

1959年3月13日，毛泽东会见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当被问到为什么中国人不害怕战争时，毛泽东回答说：

“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要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

反对战争、不怕战争，这是毛泽东的一贯观点，也反映他对战争与和平辩

证关系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

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强调在和平时期要有“两手准备”，既要争取和平，同时要进行战争准备。毛泽东认为，战争有爆发与不爆发两种可能性，我们反对战争，不希望爆发战争；但是，如果我们就此对战争丧失警惕，那是非常危险的。特别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前期，国际形势出现新的动荡，美国对越南北方的战争逐步扩大，我国周边形势逐渐紧张。在此情况下，毛泽东强调要把备战摆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有些同志提出，天天讲战争，最后战争又没有打起来，那岂不变成了周幽王起烽火？对此，毛泽东提醒人们，做好准备，最后是有可能战争并没有来；但是如果战争真的来了，而我们却没有做准备，那就“后悔莫及”了。我们争取不打，但是应该设想最坏的情况，立足于打来做准备，而不是立足于打不起来，那样才能有备无患、争取主动。

为了备战，毛泽东提出要搞三线建设。他认为，三线建设是备战的一个重要举措，搞好大三线、小三线建设，面对战争危险就会比较主动。毛泽东是那种决定了的事就紧抓不放的人。对三线建设，他也抓得很紧，大会小会反复讲。1964年5月27日，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突出强调三线建设问题，他说：第一线是沿海，包钢到兰州这一条线是第二线，西南是第三线。攀枝花铁矿下决心要搞，把我们的薪水都拿去搞。6月8日，他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还风趣地说：你们不搞攀枝花，我就骑着毛驴子去那里开会；没有钱，拿我的稿费去搞。毛泽东之所以这样强调三线建设问题，就是因为他一贯主张的，要从最坏处做准备。我们不希望战争，但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他们是否和什么时候发动战争，并不由我们决定。做好了战争准备，敌人反而不敢轻易发动战争。即使敌人发动战争，我们也不怕。纵使北京出了危险，我们还有攀枝花等“三线”作为后方基地。

1965年4月，毛泽东在听取贺龙等汇报军事工作时，这样告诫大家：

“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在人民军队的成长壮大过程中，毛泽东关于战争与和平互相转化的辩证法

思想，始终在提醒和教育着这支部队。这一思想，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和平犹如阳光和空气，弥足珍贵；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也已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但是，在帝国主义和反人民的敌对势力仍然存在的条件下，铸剑为犁只能是人们的美好愿望。中国人民热爱和平，但是对于一切反动势力挑起的战争威胁，我们也不怕。正如习近平所说：

“我们要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但决不能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能牺牲国家核心利益。任何外国不要指望我们会拿自己的核心利益做交易，不要指望我们会吞下损害我国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苦果。”

和平不会自动而来，而是需要努力争取和精心维护的。维护和平，除了要树立合作共赢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之外，还要有另外一手，就是要抓好军事斗争准备。军事斗争准备是维护和平、遏制危机、打赢战争的重要保证。在新形势下，我们要牢固树立底线思维，树立随时准备打仗的思想。身处和平要居安思危，不能丧失警惕。宁可备而不战，不可无备而战。正如习近平所说：

“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



“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

“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

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所作的《论持久战》的著名演讲中，曾以“战争和政治”为题，深刻阐述了战争与政治的关系。其中提出的“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等论点，成为毛泽东战争观的重要名言。

★辩证认识战争与政治关系的精彩篇章

战争，一直是人类关注的一个社会现象。在阶级社会中，当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一出现时，更加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从而产生了各个阶级对战争的不同看法和认识，形成了不同的战争观。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战争观理论，即毛泽东军事思想中的战争观理论。

亡，而且运用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辩证统一的哲学原理，深化了对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认识，为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理论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这是毛泽东通过考察战争与政治的普遍性，对战争与政治的一致性的认识。他说：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在这点上说，战争就是政治，战争本身就是政治性质的行动，从古以来没有不带政治性的战争。抗日战争是全民族的革命战争，它的胜利，离不开战争的政治目的——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离不开坚持抗战和坚持统一战线的总方针，离不开全国人民的动员，离不开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和瓦解敌军等项政治原则，离不开统一战线政策的良好执行，离不开文化的动员，离不开争取国际力量和敌国人民援助的努力。一句话，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抗日军人中，如有轻视政治的倾向，把战争孤立起来，变为战争绝对主义者，那是错误的，应加纠正。”

这就是说，在战争与政治这个矛盾的对立统一体中，政治属于普遍性的范畴，战争属于特殊性的范畴。要深刻认识作为特殊性的战争，必须从战争与其他各种社会现象的联系中考察和研究战争。战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社会的经济、文化、科技等诸多因素有着广泛的联系，但其中最本质的联系是政治；战争绝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由一定时期内种种复杂的社会政治关系引起的，是带有政治性质的行为。

“战争是流血的政治。”这是毛泽东通过考察战争与政治的特殊性，对战争与政治的差别性的认识。他说：

“战争有其特殊性，在这点上说，战争不即等于一般的政治。‘战争是政治的特殊手段的继续’。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例如中国的半

独立地位，是日本帝国主义政治发展的障碍，日本要扫除它，所以发动了侵略战争。中国呢？帝国主义压迫，早就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障碍，所以有了很多次的解放战争，企图扫除这个障碍。日本现在用战争来压迫，要完全断绝中国革命的进路，所以不得不举行抗日战争，决心要扫除这个障碍。障碍既除，政治的目的达到，战争结束。障碍没有扫除得干净，战争仍须继续进行，以求贯彻。例如抗日的任务未完，有想求妥协的，必不成功；因为即使因某种缘故妥协了，但是战争仍要起来，广大人民必定不服，必要继续战争，贯彻战争的政治目的。因此可以说，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

这就是说，战争与政治之间既相一致，又相区别，即战争与政治相比，有其特殊性。在这里，毛泽东把“流血”与“不流血”作为战争与政治的根本区别。这表明，战争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斗争，而是一定阶级用以解决某种政治矛盾和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手段。在阶级斗争以非暴力的斗争形式和手段，不能解决阶级矛盾或难以实现其政治目的时，便诉诸武力，导致战争。据此毛泽东认为：

“基于战争的特殊性，就有战争的一套特殊组织，一套特殊方法，一种特殊过程。这组织，就是军队及其附随的一切东西。这方法，就是指导战争的战略战术。这过程，就是敌对的军队互相使用有利于己不利于敌的战略战术从事攻击或防御的一种特殊的社会活动形态。因此，战争的经验是特殊的。一切参加战争的人们，必须脱出寻常习惯，而习惯于战争，方能争取战争的胜利。”

毛泽东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战争观的理论宝库。

★军事理论升华源自兼收并蓄

毛泽东之所以能够在理论上作出超越前人的创新，这是源于他在实践中对理论的追求和探索。他说：

“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这是一件事。然而还有一件事，即是从自己的经验中考证这些结论，吸收那些用得着的东西，拒绝那些用不着的东西，增加那些自己所特有的东西。这后一件事是十分重要的，不这样做，我们就不能指导战争。”

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共产党为了肃清“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错误，毛泽东不仅领导全党系统总结了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经验教训，而且自己为此发愤读书，除大量研读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外，还下功夫研读了古今中外的军事论著。正是通过刻苦学习和深入研究，使丰富的革命实践经验得以升华为理论概括。毛泽东后来多次谈到他所经历的这一情况。

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上海召开的中共八届七中全会上说：

“左”倾教条主义者说我照《孙子兵法》打仗的那些话，“倒激发我把《孙子兵法》看了，还看了克劳塞维茨的，还看了日本的《战斗纲要》，看了刘伯承同志译的《联合兵种》，看了‘战斗条例’，还看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总之，激发我来研究一下军事。”

1960年12月25日，毛泽东在同部分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谈话时又说道：

“后来到陕北，我看了八本书，看了孙子兵法，克劳塞维茨的书看了，日本人写的军事操典也看了，还看了苏联人写的论战略、几种兵种配合作战的书等。那时看这些，是为了写《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是为了总结革命战争的经验。”

此外，在现存面世的文献中，还发现有毛泽东在写作《论持久战》前的读书日记。日记记录了他从1938年2月1日至4月1日的读书情况。在此期间，他先后读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和潘梓年的《逻辑与逻辑学》。此前他还读了苏联和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并留下很多读书摘录和批注。

从毛泽东关于战争和政治的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对19世纪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的汲取，以及对列宁思想的深化。

在世界军事思想发展史上，克劳塞维茨在马克思主义诞生前，最早较全面而深刻地阐述战争与政治关系。他在《战争论》一书中，运用德国古典唯心主义辩证法，系统总结了历次战争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经验，第一次明确提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经典命题。他提出“战争是政治的工具”，“政治还是孕育战争的母体”；“如果说战争有特殊的地方，那只是它的手段特殊而已”，它“不是写外交文书的政治，而是打仗的政治”，“政治在这里以剑代笔”等著名观点。

列宁在1915年研究哲学和战争问题时，曾认真地阅读过《战争论》，而且还作了万余字的《克劳塞维茨〈战争论〉一书摘录和批注》的读书笔记。列宁在笔记中，极为重视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论述，并在“战争是政治的工具”的第八篇第六章上批注：“最重要的一章”。其后，列宁在他的文章中高度评价并多次引用克劳塞维茨的重要观点。列宁在《第二国际的破产》一文中说：“‘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军事史问题的伟大作家之一克劳塞维茨所下的定义，他的思想受胎于黑格尔。这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一直坚持的观点，他们把每次战争都看作是当时各有关国家（及

其内部各阶级)的政治的继续。”他在《社会主义与战争》一文中又指出：“‘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即暴力)的继续’。这是造诣极高的军事问题著作家克劳塞维茨说过的一句至理名言。马克思主义者始终把这一原理公正地看作考察每一战争的意义的理论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就是从这个观点出发来考察各种战争的。”1916年，列宁在《论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帝国主义经济主义”》一文中，又进一步作了这样的概括：“怎样找出战争的‘真正实质’，怎样确定它呢？战争是政治的继续。”

毛泽东在“战争和政治”的论述中，没有直接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话，而是引用列宁著作中“战争是政治的继续”“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的观点，并对后一论点特别加注说明：参见列宁《第二国际的破产》和《社会主义与战争》。可见，毛泽东主要是通过列宁的有关论述，全面而深刻地把握克劳塞维茨对这一问题所阐述理论的丰富内涵。毛泽东之所以未直接引用克劳塞维茨的观点，应是因为克劳塞维茨未能科学地揭示这一命题中对政治范畴的认识，即把政治解释成“是整个社会的一切利益的代表”，认为战争只不过是对外政策的继续的国家间的关系。列宁对克劳塞维茨这个命题中的政治范畴作了批判的改造，明确指出：“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在阶级社会中，“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毛泽东认识到列宁与克劳塞维茨在这一命题上的本质区别，依据马列主义的阶级政治观和辩证唯物主义，在明确作出战争的定义后，又提出“战争一刻也离不了政治”“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的著名论断，进一步阐明了政治与战争的辩证关系。

★对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一直记忆犹新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关于“战争和政治”的论述中，虽然未提到克劳塞维茨和直接引用《战争论》中的文字，但《战争论》这部军事理论著作还是给了毛泽东以深刻的影响和诸多的启迪。在他的《论持久战》中，不仅在关于“战争和政治”的关系，而且在战争的目的、战争的“盖然性”等方面，都汲取与发展了《战争论》中的思想。

关于这部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还曾留下了毛泽东请人找寻和自己学习及

组织研究的故事。

1937年底，为编写《抗日战争丛书》，研究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曾让在身边工作的郭化若去找《战争论》等书。12月28日，他写信给郭化若说：

“你写战略，应找些必要的书看看，如黄埔的战略讲义，日本人的论内外线作战（在莫主任处），德国克老斯伟资（后译为克劳塞维茨——引者注）的战争论，鲁登道夫的全体性战争论，蒋百里的国防论，苏联的野战条令等，其它可能找到的战略书，报纸上发表的抗战以来论战争的文章通讯亦须搜集研究。先就延安城有的搜集（商借）来看。……”

毛泽东自己读《战争论》，是1938年3月18日开始的。他在读书日记中记载了逐日阅读情况，至31日读到第167页。4月1日从168页看起，但之后日记便中断了。可能是因《论持久战》的写作紧张，使他中断了记日记。

据有关当事人的回忆，在撰写《论持久战》之后，毛泽东还曾在延安专门组织过“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究会”，继续研究这部军事名著。

郭化若回忆说：

1938年9月间，毛泽东约了十来个人，在他自己的窑洞里开哲学座谈会，每周一次，参加的有许光达、陈伯钧、郭化若，后来又有萧劲光、萧克等将军，文化人有何思敬、艾思奇、任白戈、徐懋庸等。在这期间的座谈会上，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内容。

徐懋庸也回忆说：

当时专门请何思敬讲克劳塞维茨的“战略学”内容时，由于何思敬照着德文原著随译随讲，讲得实在不太高明。每次讲完出来时，将军们既不满意，我们也觉得索然无味。然而，毛泽东却听得很认真，还拿着一支红铅笔，在一个本子上不时地记录。我们对这种态度和精

神非常惊奇，因为不管何思敬讲得如何不好，毛泽东都能从何思敬传达的原著的话里，吸收到我们所不能理解的意义。

参加这个小组学习的莫文骅回忆：

《战争论》的学习讨论采用边读边议的方法。当时只有一本书，是国民党陆军大学出版的文言文译本，译文又很粗劣，读起来很不好懂。后来由何思敬同志直接从德文原版译出来，译一章，介绍研究一章，并发了讲义。记得当时讨论得最多最热烈的是集中兵力问题。毛泽东同志说：克劳塞维茨的作战指挥实践不多，但集中兵力问题讲得好。



| ★ 1960年5月，毛泽东会见英国蒙哥马利元帅。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在会见外宾和讲话中，多次谈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时，对其中的名言仍是记忆犹新。如1960年5月27日，他在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蒙哥马利说：“我读过你关于军事的著作，写得很好。”毛泽东谦逊地答道：“我不觉得有什么好。我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你学过克劳塞维茨，我也学过。他说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形式的继续。”

直到1975年10月30日，毛泽东在会见当时的联邦德国总理施密特时，还提到克劳塞维茨曾讲过很有道理的话。

毛泽东关于战争与政治关系的这些论述和他的思想脉络，对我们认识战争的根源和本质，把握战争自身的特殊规律，正确指导战争，有着重要的启发。

2013年7月15日，习近平在军队一次重要会议上谈到关于战争的指导问题时，依然强调了毛泽东等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观点：

“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是马克思主义战争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筹划和指导战争，必须深刻认识战争的政治属性，坚持军事服从政治、战略服从政略，从政治高度思考战争问题。”



对待战争“第一条反对， 第二条不怕”



“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

——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1936年12月）

“我们是坚持和平反对战争的。但是，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我们也不要害怕。我们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同对待一切‘乱子’的态度一样，第一条，反对；第二条，不怕。”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1957年2月27日）

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对待战争的态度，一反对二不怕。这些，是毛泽东对待非正义战争的基本态度。这个态度，来自于对战争规律的深刻把握，来自于中国人民反抗压迫、反抗侵略的长期艰苦斗争实践。它形成于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发动的非正义战争时期。毛泽东在1936年12月撰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和1957年撰写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重要著作中，都有完整的表述。

★ “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

自古知兵非好战。热爱和平，保卫和平，是中华民族的天性。但是，为了持久和平，就必须通过战争来消灭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近代以来，由于饱受列强欺凌，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战争，争取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成为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解决的两大历史任务。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是在国民党反动派屠杀和围追堵截中成长起来的。在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后，人民军队又肩负起北上抗日、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面对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度所遭受的苦难，面对中华民族积贫积弱的现实，毛泽东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深入研究战争规律。1936年12月，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这篇文章中开宗明义地提出要研究战争规律，提醒“指导战争的人”：“我们不但要研究一般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特殊的革命战争的规律，还要研究更加特殊的中国革命战争的规律”。研究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战争。他说：

“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要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它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用民族革命战争反对民族反革命战争，用阶级革命战争反对阶级反革命战争。历史上的战争，只有正义的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一切反革命战争都是非正义的，一切革命战争都是正义的。”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发起的侵略战争，毛泽东集中精力研究战争问题。在《矛盾论》《战争和战略问题》等一系列军事理论著作中，他进一步深刻阐述了“战争的目的在于消灭战争”的基本认识。在《战争和战略问题》这篇战争论中，他用简明生动的语言，清晰地告诉人们共产党人的态度：

“帝国主义时代的阶级斗争的经验告诉我们：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只有用枪杆子的力量才能战胜武装的资产阶级和地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整个世界只有用枪杆子才可能改造。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不要枪杆子必须拿起枪杆子。”

“我们是战争消灭论者，我们是不要战争的；但是只能经过战争去消灭战争”。这就是我们的辩证法。

战争是帝国主义强加给我们的。正是为了和平，中国人民才被迫拿起武器，走向血与火的战场。

反对战争，不要战争，是毛泽东一贯的思想取向。这可以从毛泽东的个人志向中反映出来。终其一生，他都希望做一名教员，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1936年，美国记者斯诺来到延安。在接受采访时，毛泽东第一次公开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他说，在长沙求学期间，自己开始认真地考虑前途问题，结果决定“最适合于教书”。新中国成立后，在与外国客人的谈话中，他又多次讲，“我是一个知识分子，当一个小学教员”，“没有想到打仗”，“我历来是当教员的，现在还是当教员”。后来，“中国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开始还有军阀的压迫”，不得已走上革命道路，“这不以我们这些人的意志为转移”。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战争观与和平观，新中国成立前夕，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毛泽东就向全世界庄严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各民族的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

百废待兴的新中国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为国内经济建设创造有利的外部条件。但是，这个和平环境不是靠妥协退让得来的，而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经过坚持不懈的斗争争取来的。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10月1日深夜，金日成向中国政府提出出兵支援的请求。成立仅仅一年的人民共和国再次面临着战争局面，而这次的对手美

国，是世界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为了国内的持久和平，毛泽东斟酌再三，作出了他一生中最难作出的决策之一——出兵朝鲜。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打仗，国内自然会出现各种担心、忧虑。美国插手朝鲜是否会引发新的世界大战，就是其中之一。这种担心和忧虑，没有改变毛泽东争取和平的既定目标。1952年8月4日，他在分析朝鲜战场局势时说，朝鲜战争究竟打到哪一年为止，谈判要谈到什么时候为止，没有确切时间，但是，最终结果一定是和，“谈还是要谈，打还是要打，和还是要和”。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坚固的基础”。有了这个基本判断，我们高举“要和平，不要战争”的旗帜，坚持谈打结合、以打促谈的斗争策略，最终取得了朝鲜战争的胜利。

战后召开的日内瓦会议，是决定朝鲜半岛和印度支那能否实现真正和平，是走向和平还是再陷战争的历史性会议。毛泽东提出，会议要争取缓和国际紧张局势、打破美国对中国的孤立封锁政策。在主持讨论修改宪法草案、处理高饶事件的同时，他多次亲自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审定周恩来为参加日内瓦会议准备的5个重要文件，并多次约周恩来商谈有关问题。代表团启程的前一天晚上，他又召集刘少奇、周恩来、陈云、彭德怀、邓小平等人开会，进一步研究相关问题，做到充分准备，仔细斟酌，力求万无一失，谋定而后动。由于紧紧抓住了各国都希望和平、不愿再打起来这个共同点，中国代表团在会议中所做的大量团结工作取得很大成绩，使好战的美国陷于相当孤立的境地。

对于中国代表团取得的初步成果，毛泽东是有把握的。他在1954年7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的成功，就在于“抓住了和平这个口号”，“而美国人就不抓这个东西，它就是要打，这样，它就很难说不过去了，没有道理了。现在和的人多了，我们要跟一切愿意和平的人合作，来孤立那些好战分子”。他进而提出，不同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相处，我们要对许多国家，比如英国、法国、加拿大这一类国家，比如印度、缅甸这一类国家，凡是有可能的，都要进行工作。总之，“只要在和平这个问题上能够团结的，就和他们拉关系，来保卫我们的国家，保卫社会主义，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在日内瓦会议期间和会议结束后，中国政府抓住机

遇，迅速调整外交政策，把会议成果进一步扩大、巩固下来。中英、中法、中美关系都出现了新的进展与突破，中国与亚洲近邻的关系更取得长足进展。

1955年4月，周恩来率团出席在万隆召开的亚非会议，提出了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的和平宣言议案，受到与会各国的高度赞赏。会议的成功，预示着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为基础的国际新秩序将逐步建立。从此，我们在全世界树立起了热爱和平、维护和平的良好形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国家在国际社会诬蔑中国“好战”的论调没有了市场，于我有利的国际环境逐步形成。在这个大前提下，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有声有色、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

★“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
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

不要战争，持久和平，是我们的良好愿望。但是，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无法改变其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性，战争也就不可避免。毛泽东认为，我们的努力，只能做到在一个时期，或是一个相当时期避免战争。既然世界上还存在战争，我们就得正确应对。怕战争，以妥协退让来避免战争，是无用的。

不怕鬼、不信邪，是毛泽东最鲜明的性格特点之一。早在1919年《湘江评论》的创刊宣言中，他就向世人宣称过“六不怕”精神：



★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

“什么不要怕？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军阀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这“六不怕”，概括起来就是一句话：任何看起来强大的力量都不要怕。这种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毛泽东的战争观上有深刻反映。

正是有了这“六不怕”的精神，加上后来有了与日本帝国主义和美国帝国主义艰苦卓绝的战争较量，毛泽东辩证的战争观越来越清晰和坚定。1955年1月28日，毛泽东会见芬兰首任驻华大使孙士敦，在谈到世界战争的危险时，作了明确的表述：

“我们有两条：第一，我们不要战争；第二，如果有人来侵略我们，我们就予以坚决回击。”

几年以后，他又表达了同样的明确态度。

1959年3月，美国著名黑人学者、世界和平理事会理事杜波伊斯博士和夫人以及作家斯特朗访问中国，受到毛泽东的热情接待。谈话间，客人问：为什么中国人不那么害怕战争？

毛泽东回答说：

“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发动战争，你害怕有什么用呢？你怕也好，不怕也好，战争反正到来，你越是害怕，战争也许还会来得早一些。因此，我们有两条：第一条，坚决反对战争；第二条，如果帝国主义一定要打仗，我们就同它打。把问题这样想透了，就不害怕了”。

毛泽东的所谓“想透了”，其实就是我们中国人对掌握客观规律的一种通俗说法。

毛泽东从研究历次世界大战的结果中得出结论，弱小但是进步的战胜强大但是落后的，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所以，帝国主义不可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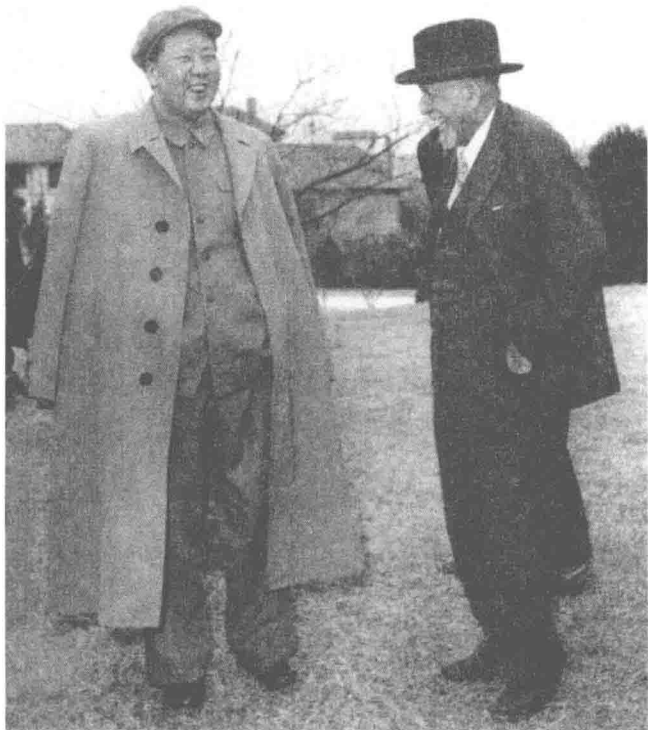
毛泽东的这种“不害怕”的精神，体现在中国人民面临战争威胁的各个时期。1935年12月，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全面抗战开始不久，战场局势不明，“亡国论”大行其道时，毛泽东就豪迈地宣称，我们的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是无敌于天下的。在这样的军队面前，“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这些话，不仅仅是简单的语言上的豪迈。

抗战胜利后，面对蒋介石的内战图谋，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

“就我们自己的愿望说，我们连一天也不愿意打。但是如果形势迫使我们不得不打的话，我们是能够一直打到底的。”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帝国主义的包围，他仍乐观地作出预计，帝国主义那套东西就怕打，打的结果，一定是社会主义阵营获胜。“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出了一个苏联，两亿人口。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出



★ 1959年3月，毛泽东与美国著名学者杜波伊斯愉快交谈。

了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一共九亿人口。如果帝国主义者一定要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可以断定，其结果必定又要有多少亿人口转到社会主义方面，帝国主义剩下的地盘就不多了，也有可能整个帝国主义制度全部崩溃”。“如果发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资本主义世界就要完结。如果有疯子要发动战争，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灭亡的是帝国主义。”

在毛泽东看来，有了这种对世界大势的清醒认识和斗争的必胜信心，暂时强大的帝国主义又有什么可怕的呢？！

二战以来，新的世界战争打不打，怎么打，核心的考量因素是美国。我们讲“怕”或“不怕”的对象，主要也是指美国。在世界上许多人都惧怕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时，毛泽东却明确提出：

“我认为目前形势的特点是东风压倒西风，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力量对于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

这就清楚地告诉人们：美国并不可怕。

1955年4月，毛泽东风趣地对远道而来的英国共产党主席波立特说，我们对美国的看法，可以说是可怕，但又不可怕。它的力量强，有原子弹，所以我们要搞和平运动。但是从根本上看，其实它不可怕。“美帝国主义真的要打，我们也不怕”。为什么不怕？因为我们有力量，在欧、亚、非广大的中间地带，美国是孤立的，“如果打起来，三个洲都会变成一个腔调”。这样，我们五分天下有其三，“资本主义制度就会早些完蛋”。所以，我们要努力阻止战争的爆发。但万一战争无法阻止，就要“准备打他几年，把战争从三个洲的土地上扫出去”。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人们对世界大战的担忧，很大程度上来源于对原子弹这个新式武器的恐惧。对这些幻想和忧虑，毛泽东有他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原子弹的威力固然可怕，但是，“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原子弹威力再大，也终究逃不脱这一客观规律。由此，他提出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的著名论断。除了对“人与武器”的辩证关系有深刻认识外，毛泽东还从“极而言之”的最坏基点上作出设想：即使爆发原子战争，也不会像有些人想的那样“人会死绝”，而是至多损失一半人，“人类是

消灭不了的”。

极力避免最坏的情况，积极争取最好的结果。正是有了这种底线思维，毛泽东多次强调：

“美国的原子讹诈，吓不倒中国人民。”

毛泽东主张不怕美国，不怕原子弹，是从思想方法上给中国人民传递一种“不怕”的精神。他把战争的辩证法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表达出来，主要目的是引导人们看清方向，把握趋势，克服恐惧，树立必胜的信念。

不怕，并不等于没有准备。对于长久以来积贫积弱、饱受帝国主义欺凌的中国人民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毛泽东深知掌握战争主动权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在提出战略上“不怕”原子弹的同时，他在战术上又高度重视发展尖端科技，主张新中国要拥有核武器，要求用10年工夫搞出原子弹、氢弹。

他的话，一针见血：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有了核武器，中国才可能在慑止核战争、维护世界和平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

按照毛泽东的要求，我国于1964年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西方大国的核讹诈。

对待战争“不怕”，展现了中国人民不怕牺牲、斗争到底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正是有了这种精神，中国共产党才能从无到有、由弱到强，用小米加步枪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推翻了蒋家王朝，建立起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再提“不怕”的认识，是为了鼓舞全国人民乃至全世界被压迫人民，敢于斗争、敢于坚持，争取更大的胜利。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敢于和世界头号强国美国侵略者在朝鲜较量，而且坚持把战争“进行到美国政府愿意和平解决的时候为止”，“美帝国主义愿意打多少年，我们也就准备跟它打多少年”。这些，都是对“不怕”精神的极好诠释。

★ “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

战争与和平是辩证统一的，“怕”与“不怕”也是对立统一的。毛泽东所谓“不怕”，是建立在对“怕”作客观分析与充分准备基础上的。他说过：

“一点不怕，无忧无虑，真正单纯的乐神，从来没有”。

他还说过：

“世界上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

他就是想告诉人们，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做最坏的打算，就是做好战争准备，有备无患。

在战争根源尚未消除，美、苏对立造成的现实威胁依然存在的情况下，从总体而言，战争与和平的决定权，并不掌握在我们手中。因而，毛泽东反复强调，战争的危险客观存在，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这种可能性，要准备打仗，向敌对势力展现我们准备打仗的决心和人民战争的威势，使敌人望而生畏，从而放弃侵略企图。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就提出过，“我们要随时准备对付美帝国主义来侵略。我们所进行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建设事业，都要考虑到敌人就在面前这个情况来讨论和决定”。

朝鲜战争结束后，我国逐步转入全面建设时期。此时，两大阵营的对立依然存在，美国反共反华势头仍然十足。因而，毛泽东再次告诫全党，虽然目前国际形势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有利，但帝国主义势力还包围着我们，他们是什么都可能干出来的，我们必须准备应付可能的突然事变。

他告诫人们：

“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因此，我们在精神和物质上都要有所准备，当突然事变发生的时候，才不至于措手不及”。

战争准备越充分，遏止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大。上世纪60年代，中苏两国关系日趋紧张，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中国面临的战争危险也逐渐加重了。因而，“备战”成为我国国防建设的重要内容。1961年8月，毛泽东在会见巴西共产党干部参观团和干部学习团时说，世界大战可能不打，但也可能打，就这么两条。按照社会主义阵营的意见，按照各国共产党的意见和各国劳动人民的意见，是不要打的；但如果按照帝国主义以及它在各国的走狗的意见，那就要打。所以要警惕。“就是说做坏的方面的准备，这么做了准备，也许可以不打。帝国主义反对我们，如果我们都睡觉，那是很危险的。”

正是因为从精神和物质上做好了随时准备打仗的充分准备，积极应对了世界战略格局的重大变化，我国才有效遏止了可能的大规模战争，消除了外部隐患，保证了国家的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顺利进行。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考虑问题从来不局限于一时一事，而是着眼长远，抓住根本，从大本大原上解决问题。他认为，要想从根本上遏止战争，就必须大力发展经济技术，强大到让敌人不敢来侵略我们。让我们回顾一下1963年9月他在修改《关于工业发展问题（初稿）》时加写的一大段话：

“我国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起，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共计一百零五年时间，全世界几乎一切大中小帝国主义国家都侵略过我国，都打过我们，除了最后一次，即抗日战争，由于国内外各种原因以日本帝国主义投降告终以外，没有一次战争不是以我国失败、签订丧权辱国条约而告终。”

为什么会这样？毛泽东作了“挨打”的社会根源剖析。他说：

“其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现在，我国社



★ 1960年4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参观工业展览。 |

会制度变了，第一个原因基本解决了；但还没有彻底解决，社会还存在着阶级斗争。第二个原因也已开始有了一些改变，但要彻底改变，至少还需要几十年时间。如果不在今后几十年内，争取彻底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远远落后于帝国主义国家的状态，挨打是不可避免的。”

剖析原因是为了找到努力的方向和选择的目标，毛泽东接着说：

“当然，帝国主义现在是处在衰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阵营，全世界被压迫人民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斗争，都是处于上升的时代，世界性的战争有可能避免。这里存在着战争可以避免和战争不可避免这样两种可能性。但是我们应当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力求在一个不太长久的时间内改变我国社会经济、技术方面的落后状态，否则我们就要犯错误。”

这一大段论述，体现了毛泽东对遏制霸权、防止战争的进一步思考。“以有可能挨打为出发点来部署我们的工作”，体现了他深刻的底线思维、战略眼光和哲学智慧。

历史行进到了改革开放的新时期，毛泽东的战争与和平思想进一步被发扬光大。1989年9月，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语重心长地说：

“国际形势有一个战争问题。……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而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我们怕什么？战争我们并不怕。我们分析世界大战打不起来，真打起来也不怕。……我们的基础好，是几十年打出来的，这个威势一直要传到后代，保持下去，这是本钱。”



毛泽东

MAO
ZEDONG



讲人与武器的关系

“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



“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



“有人说，武器是第一，人是第二。我们反过来说，人是第一，武器是第二。”

——毛泽东：《从历史来看亚非拉人民斗争的前途》（1964年7月9日）

这是毛泽东1964年7月同在朝鲜平壤参加完第二次亚洲经济讨论会后访华的亚洲、非洲、大洋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代表谈话时说过的一句名言。这句话既是对人和武器这两个决定战争胜负成败的关键因素之间相互关系的深刻思考，又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长期以来高度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克服武器劣势，以少胜多，以弱敌强的光荣历史和作战经验的高度总结。无论这些外国朋友是否理解这句话的深刻内涵，却都从里面听出了一些味道：既有政治家的军事谋略，也有军事家的战略思考。毛泽东的这种认识，是从丰富的实践经验中得来的。

★ “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毛泽东领导的人民军队，是从“小米加步枪”起家的。

1927年，面对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疯狂屠杀共产党员的严峻形势，中国共产党人开始走上了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1927年9

月9日，毛泽东在湖南领导了著名的秋收起义。在攻打长沙受挫后，面对敌强我弱的不利形势，毛泽东毫不畏惧，他坚信虽然红军当时和国民党反动派相比还很弱小，没有地盘，更没有先进的武器装备，但决定战争成败的最终是人。

秋收起义后，9月20日早上，毛泽东站在湖南里仁学校操场上，是这样鼓励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全体官兵的：

“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

随后，毛泽东率部转战湘赣边界，开始了井冈山的艰苦斗争岁月。

土地革命时期的红军，装备是简陋的，生活也是非常艰苦的。由于没有自己的兵工厂，红军的武器来源几乎都是靠从敌军缴获，近代以来，没有武器来源的军队极少见。要单论武器装备而言，红军和国民党军相比，真如毛泽东那句话所言，是“乞丐和龙王爷比宝”，然而，就是在这样艰难的条件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根据地军民一心，红军官兵斗志昂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以弱胜强的奇迹。

1928年的6月，蒋介石组织湘赣敌军近10个团兵力，对井冈山进行围攻。敌人自恃人多枪多，来势汹汹，赣军以第九师师长杨池生部为主力，杨如轩为前线总指挥，以5个团占领永新。湘军吴尚部也出动3个团向酃县（今炎陵县）、茶陵逼近，配合赣军的进攻，妄图一举围歼红军。红军在毛泽东和朱德领导下，红四军采取先打弱敌、再打强敌、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以小部钳制战斗力较强的湘军，利用新、老七溪岭的有利地形，集中力量歼灭来犯之赣敌。战斗于1928年6月23日拂晓打起，一直打到天黑。在宁冈、永新等根据地群众的支持下，红军战士个个奋勇当先，当打到中午的时候，据守老七溪岭的红二十八团首先把敌人压下去，以少胜多，打垮了敌人担任主攻的3个团，残敌向永新城窜逃。就在这时，据守新七溪岭的红二十九团和三十一团一营也发起反击，把敌人打垮。敌人企图经龙源口逃窜，被红二十八团包抄到龙源口，截断

了敌之退路，敌人大部被歼。这一仗红军取得了歼灭赣军一个团、击溃两个团、缴枪千余支的胜利，击破了敌军对井冈山的第四次“进剿”，真可谓“不费红军三分力，打败江西两只羊（杨）”。此役，史称“龙源口大捷”，这只是当年红军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国民党军的诸多战例中的一个精彩片段而已。可见，战略得当，战术有方，组织有力，再加上人心齐、士气旺，其结果应验了“人是第一，武器第二”的道理。

1931年4月，蒋介石调集18个师另3个旅共20万人的兵力，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以优势兵力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大举进攻，进行第二次“围剿”。4月18日，中共苏区中央局召集扩大会议，讨论第二次反“围剿”战争的方针策略，考虑到敌我力量悬殊，中央代表团曾传达了中央指示，即在强敌进攻的情况下，如果不能粉碎新“围剿”则可考虑转移。但毛泽东认为虽然敌军有兵力和武器的优势，但红军官兵团结，士气旺盛，只要指挥得当，红军完全可以以弱胜强，他在会上说：敌军虽多，但其之间矛盾重重，指挥不统一，地形不熟悉。而红军则士气旺盛，官兵一致，准备充分，地形熟悉。根据地群众仇恨敌人，拥护红军，能积极配合红军消灭敌军。因此，红军打破敌军“围剿”的把握很大。毛泽东关于留在中央苏区打的意见，得到多数与会者的赞同。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关于“先打弱敌”的作战方针，从1931年5月中旬开始，毛泽东和朱德等指挥红军采用伏击、奔袭等战略战术，在15天内，横扫700里，连打5个胜仗，共歼国民党军3万余人，缴枪2万余支，打破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

得胜的毛泽东，在是年夏天满怀豪情地写下《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一词：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
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
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其实，让蒋介石“嗟何及”何止是这一回，在中央苏区的数次反“围剿”

作战中，武器简陋的红军，将人的因素发挥到极致，创造出一幕幕以弱胜强的威武雄壮的活剧来，蒋介石徒拥全国之力，“围剿”10年，最终也是徒唤奈何。

★“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

再来看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蓄谋已久的全面侵华战争。战争初期，日军凭借其先进的武器装备接连击败国民党军，攻占了大量的中国城市。一时间，“亡国论”甚嚣尘上。其中就有这样一些论调：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亡！中国必会做阿比西尼亚（今埃塞俄比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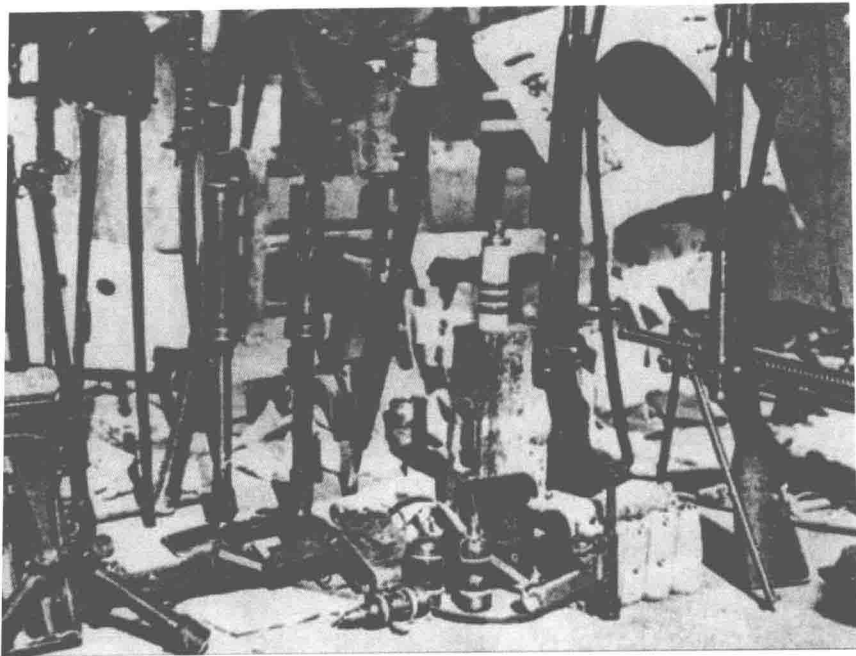
对此，毛泽东不以为然，坚决反对这种唯武器论，他说：

“中国武器诚不如人，但武器是可以用人的努力增强的，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持久抗战的结果，依据于全民族的努力，中国必能逐渐克服自己的弱点，增加自己的力量，化被动为主动，化劣势为优势；同时敌人方面的困难必逐渐增加，国际方面对我之援助必逐渐增大。综合这些因素，最后必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抗战爆发后不久，平型关大捷就为毛泽东这一论断作了有力的注解。

1937年9月，林彪、聂荣臻率领八路军一一五师开赴山西抗战前线，经过仔细勘察地形，决定在平型关一带待机伏击日军。9月25日，骄横的日军排着三路纵队，端着闪闪发亮的刺刀，拉着大炮和辎重走进了一一五师的伏击圈，一一五师抓住战机，所有的兵器一起开火。日军瞬间被打蒙了，但很快又凭借其武器射程长、火力猛的优势各自寻找据点顽抗。我们的武器差、射程短，战士们就勇敢地冲入敌群，展开肉搏。这时，日军还派出飞机进行火力掩护，可是，双方的肉搏战使飞机也派不上用场。经过几个小时的激战，八路军一一五师击毙日军号称精锐部队的板垣师团第二十一旅团1000余人，缴获日军汽车60余辆，击毁汽车数十辆，缴获步枪300余支、机枪20余挺及大批军用物资。

这次战役，不仅是八路军抗击日寇的首次大捷，也是中国抗日战争以来包



★ 八路军在平型关战役中缴获的日军先进武器。

括国民党部队在内的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也宣告了唯武器论的破产。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在毛泽东的“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松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和“广泛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

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军民建立了华北、华中和华南大小十数个抗日根据地，牵制和消灭了大量日伪军。尤其在武汉失守，特别是百团大战之后，敌人深知我八路军、新四军为“心腹之患”，乃放松正面战场，以全力“扫荡”我敌后抗日根据地。在5年半的长时期里，抗击64%的在华敌军和90%以上的伪军的任务，完全压在我八路军、新四军和敌后人民的肩上。在敌伪军数量和装备都占绝对优势，而我又孤悬敌后，毫无粮饷弹药接济的情况下，在敌人1.1万多公里长的封锁沟墙、1万多据点和3万多个碉堡围困的“囚笼”里，在敌人厉行“扫荡”、“蚕食”、“清乡”、杀光抢光烧光的“三光”政策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抗日民众，团结一心，以顽强的斗志和灵活的战术，发明出“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战法，使日军的优势装备难以发挥优势，打得日军晕头转向，叫苦不迭。在长达八年

的全面抗战中，不仅在敌后立住了脚跟，抵住了敌人，而且时常反守为攻，争取主动，战胜与消灭敌人，以至于后来日军竟然异想天开地准备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术以对付美军可能的登陆作战。

中国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等抗日武装和日军相比，武器装备始终差距极大，但八路军、新四军等通过充分发动群众，采用正确的战略战术，党领导抗日武装共对敌大小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万余人，其中日军52.7万余人，收复沦陷敌手的广大失地，解放遭敌奴役的8000万同胞，组织了几千万民众和200万手执武器的民兵队伍，使全世界人士深知中国人民是不可征服的伟大力量。

一场抗日战争，充分证明了毛泽东所说的：人，而不是武器，才是决定战争成败的主要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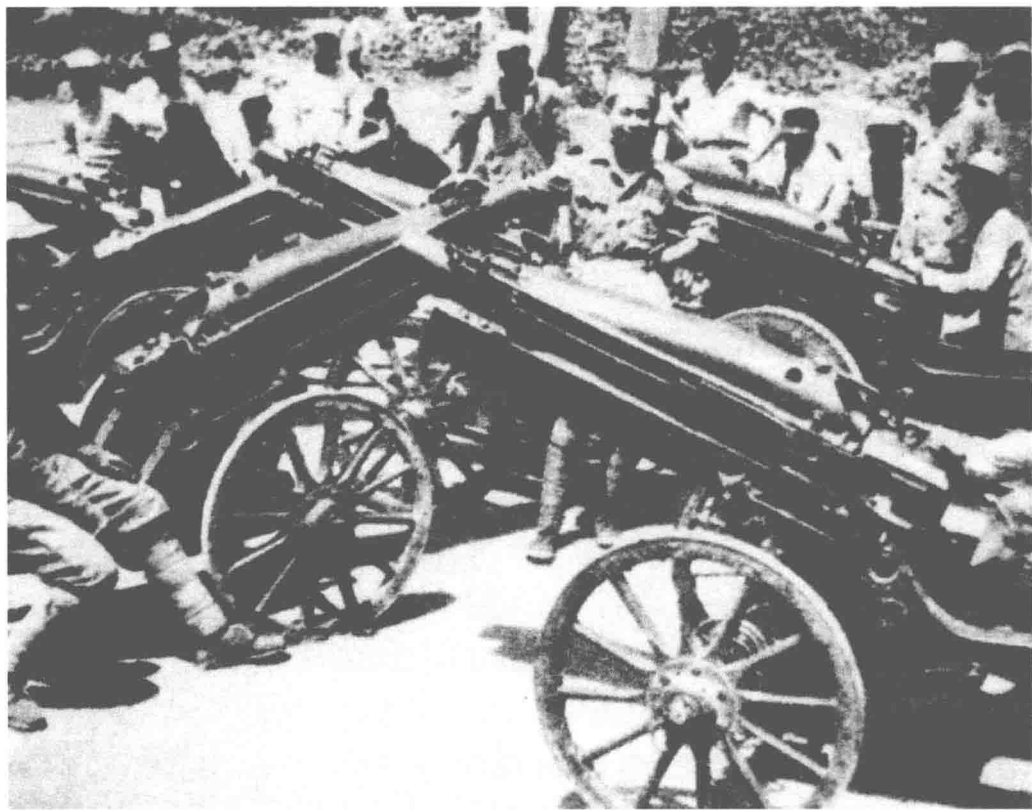
★“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不顾全国人民要求和平的热切期盼，悍然挑起内战，妄图凭借其几百万军队和先进的美械装备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战争初期，如果单看国共双方的军事实力对比，情况确实不乐观。国民党不仅占据了全国绝大多数的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还获得了大量的美式装备，无论是其军队的人数还是武器装备水平都大大强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可以说，敌人已经有了飞机坦克加大炮，而我们尽管力量也强大了，但仍然大体上还是处于“小米加步枪”的状态，基本没有什么先进装备。因此，当国民党挑起内战的时候，国内很多人士是不看好中国共产党的，而国民党反动派更是狂妄地叫嚣要“三个月解决中共”。

然而，毛泽东却不这么看，他说：

“决定战争胜败的是人民，而不是一两件新式武器。”

“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拿中国的情形来说，我们所



★ 在孟良崮战役中我军缴获的美式山炮。 |

依靠的不过是小米加步枪，但是历史最后将证明，这小米加步枪比蒋介石的飞机加坦克还要强些。”

随后的历史，很快反复验证了毛泽东的这些话。

1947年5月，面对仅有“小米加步枪”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蒋介石就迎来了他“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这年5月13日的孟良崮，随着震天的枪声，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会在这里走向全军覆灭。

解放战争中的国民党军第七十四师，曾受过美国军事顾问团的特种训练，全部美式装备，全师3.7万余

人，是蒋介石的“御林军”，号称国民党王牌军队中的“王牌军”，是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之一，也是蒋介石打内战的主要资本。该师自1946年8月作为进犯华东解放区的主力调出南京后，屡次为蒋介石所传令“嘉奖”，神气十足、骄傲无比。自吹：“有七十四师，就有国民党。”陈诚说“有十个七十四师就可以解决中国的问题”。

就是这样一支自恃武器先进、装备精良的“王牌军”，万万想不到，人民解放军会敢于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气魄，把七十四师从密集的敌重兵集团中央分割出来，一口吃掉。华东野战军将敌七十四师包围在孟良崮，以五个纵队围歼七十四师，以4个纵队担任打援。总攻发起以后，敌七十四师毕竟是反动王牌，它居高临下，用各类火炮、轻重机枪、美制冲锋枪组成了一道火墙，几十具火焰喷射器喷出一条条火龙，排子手榴弹雨点般往下扔，天黑后又发射成串的照明弹挂在空中，照得大地通明。我军每向上攻一段都要经反复冲杀，刺刀见红。虽然敌军占据地形和武器上的优势，但华野将士士气高昂，勇猛冲锋，一步汗水一步血。广大解放区群众更是奋勇支前。经过3天激战，华野全歼敌七十四师，嚣张一时的敌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

敌七十四师被歼灭后，极大地打击了国民党军士气，也宣告了蒋介石重点进攻山东解放区战略的破产。这一仗，华东野战军对国民党王牌军，武器装备上的差距自不用说，但华东野战军通过高超的战役指挥，凭借着官兵高昂的士气和广大群众的支援，硬是虎口拔牙，吃掉了敌人的这支王牌军。这一点，使敌人都感到佩服。敌七十四师少将参谋长魏振钱被俘后，跟着华野部队走了两天，说：“贵军战略高超必胜无疑。两天来看到你们行军作战那样的辛苦，但贵军一路是士气高极了，钦佩、钦佩！”在得悉七十四师被歼后，蒋介石痛心疾首，自认孟良崮的失败是其“剿共”以来最可痛心、最可惋惜的一件事！

历史证明，失掉了人民的支持，失掉了内部的团结，失掉了人这个最可宝贵的因素，即使是先进的美式装备也无法拯救蒋介石集团的覆灭。孟良崮战役一年后，在人民解放军三大战役的隆隆炮声中，国民党反动集团土崩瓦解，黯然逃往台湾。回顾这段历史，毛泽东是这样说的：

“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

★ “美国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刚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便迎来了最严峻的考验。因为美国的参战，朝鲜人民军节节败退，战火很快就烧到了中国边境。面对美军咄咄逼人的攻势，中国怎么办？敢不敢打？能不能打赢？成了当时摆在毛泽东面前最紧要的问题。

二战结束后，当其他所有的参战国都被战火破坏得满目疮痍的时候，本土没有遭受战火的美国已毫无争议地成为世界第一大国。当时的美国既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和科技实力，也拥有世界上最庞大的军事力量和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原子弹。美军不仅拥有当时世界最庞大的海空军，就其陆军而言，其火力配备和机动性均为当时世界之最，当时美国一个军（两个步兵师及一个机械化师）包括坦克炮及高射炮在内，共有7公分至24公分口径的各种炮1500门，而我们的一个军（3个师）只有这样的炮36门，而且多数还是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缴获的旧式火炮，枪支则更是由不同年代、不同型号的步枪组成，五花八门。枪炮尚如此，坦克就更无从谈起了。更何况，人民解放军还没有正规的空军，也极少有防空武器。毫无疑问，中美之间在武器装备上的差距是巨大的。因此，当美军在朝鲜跨过三八线往鸭绿江推进时，尽管中国政府多次警告，但美军根本不相信新中国会真的敢出兵朝鲜。

事实证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犯了历史性的判断错误。美军只看到自己有着巨大的武器装备和后勤补给优势，他们不知道，决定战争的并不仅仅是先进武器。

对这场力量的较量，毛泽东有过精彩的分析，他说：

“美帝国主义在今天是有许多困难的，内部争吵，外部也不一致。它在军事上只有一个长处，就是铁多，另外却有三个弱点，合起来是一长三短。三个弱点是：第一，战线太长，从德国柏林到朝鲜；第二，运输路线太远，隔着两个大洋，大西洋和太平洋；第三，战斗力太弱。”

面对美帝国主义的威胁，毛泽东还说过：

“我们的愿望是不要打仗，但你一定要打，就只好让你打。你打你的，我打我的，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抓住你的弱点，跟着你打，最后打败你。”

1950年10月19日晚，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开始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征程。刚一入朝，志愿军即发动了第一次战役，经过13个昼夜艰苦作战，歼敌1.5万余人，把敌人从鸭绿江边赶到清川江，初步稳定了朝鲜战局。在这次战役中，号称“王牌军”的美军第一骑兵师在云山遭到重创，使美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为之震惊，不得不在飞机、大炮和坦克的掩护下全线撤退。其中美军第一骑兵师一个团，冒进北渡清川江到达云山，被志愿军部队围歼大部。同时，志愿军部队又在云山以南击溃该师的另一个团，击毙该团团长。云山战斗，志愿军首创以劣势装备歼灭现代化装备之敌的先例，狠刹了一下美军的威风。之后，中国人民志愿军同朝鲜人民军一起并肩战斗，连续发动5次战役，共歼灭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23万余人，将其从鸭绿江边赶回三八线，并将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地区，迫使美国不得不考虑和中朝双方坐到谈判桌前。

然而，美国并不甘心，更不服气，他们怎么都不愿意相信自己会被武器装备落后自己如此之多的中国军队所阻止不前。1952年10月，为了对我军施加军事压力，造成在谈判席上的有利地位，并改善其在金化地区的防御态势，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向我军发动了一年来规模最大的军事攻势，即所谓的“摊牌”行动。攻势瞄准的是志愿军中部战线战略要点、战线中部地区的最高峰五圣山的前沿阵地上甘岭一带。没人能够料到，这个小村庄将因为这场战事而被中美双方所永远铭记，中国人民从中记住了志愿军伟大的英雄主义，而美国人也从此真正明白了他们的武器优势并不能主宰一切。

“摊牌”行动的策划者是“联合国军”地面部队指挥官、美第八集团军司令官范佛里特。他是美军中最不吝惜炮弹的将军，他治下的美第八集团军，炮兵的弹药配发基数远远超过美国陆军的规定，以至于美军用他的名字造了个名



★ 在上甘岭战役中，坚守坑道 14 个昼夜的某部八连指战员。

词——“范弗里特炮击量”。

“摊牌”行动一开始，范弗里特就对志愿军上甘岭阵地进行了人类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炮轰。1952年10月14日清晨，“联合国军”的300余门大炮、27辆坦克、40余架飞机疯狂地向五圣山南的两个小山头倾泻着弹药。上甘岭之战打响。在这片3.7平方公里的狭小区域内，产生了人类战争史上单位面积火力密度的最高纪录！据《第十五军军史》记载，仅14日当天，美军就向上甘岭倾泻了30余万发炮弹。最密集时，平均每秒落弹6发。而这一天志愿军反击的炮火，只打了3000多发炮弹，不及敌人的1%。从10月14日至11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与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上甘岭一带展开43个昼夜的争夺战，在3.7平方公里的地区，共发射炮弹超过190万余发，山头都被炮火削低了两米，但是这里的志愿军战士们，没有被敌人的武器优势所征服，他们舍生忘

死，甚至用血肉之躯扛住敌人的炮火，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产生了无数像黄继光一样的战斗英雄！许多连队都是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据报道，这次战役的亲历者曾回忆驻守上甘岭的第四十五师作战科长向军里报告伤亡情况时，痛哭失声：一三三团一、三、九连只剩16人；一三四团一营共剩30人，二营四连剩19人，五连无兵，七连无兵，八连11人……

历经43天，美国人在动用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炮火密度，付出两万多人伤亡的代价后，依然没能攻下这两座山头，连美国新闻舆论说：“金化攻势（上甘岭战役的美国命名）已经成了一个无底洞，它所吞食的联合国军军事资源要比任何一次中国军队的总攻势所吞食的都更多。”美军在战后复盘，后来还曾用电脑推演，他们想寻找答案：为什么拥有绝对的武器装备优势，又打了那么多炮弹，还死伤了那么多士兵，却始终拿不下上甘岭？在第十五军编撰的《抗美援朝战争战史》中有这样一句话也许就是答案——“上甘岭战役中，危急时刻拉响手雷、手榴弹、爆破筒、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舍身炸敌地堡、堵敌枪眼等，成为普遍现象。”世界上有哪支军队能像第十五军这样自豪地宣称这些壮举是“普遍现象”？

马克思曾经说过：“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只有真正代表了人民的利益，代表了人类历史进步的武装才是真正战无不胜的力量，武器从根本上说终究要靠人来掌握和使用。站在新世纪的今天，回顾过往的战争风云，我们一方面要依靠科技进步，不断提高部队装备水平，但我们更要时刻牢记的是毛泽东当年的话——战争胜负主要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物。原因就在于：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讲话》（1958年6月）

1958年6月，当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坚定地提出“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时，还清晰地预判了搞成这件事的时间表：“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这些掷地有声的话，不单单是一种口号，它既表达了毛泽东对中国发展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等尖端武器的决心，也反映了中国人民对发展国防力量的信心。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的科技工作者从新中国成立不久开始，就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忘我奋斗，独立自主地完成了“两弹一星”等尖端国防技术的突破，极大地增强了我国的国防实力，奠定了中国作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的重要基础。

★ “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

1955年1月15日，一块神秘的石头摆在了中南海丰泽园召开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的桌子上——这就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铀矿石。参加这次会议的不仅有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还有钱三强和李四光两位科学家。毛泽东说，这是一个小学生向老师讨教的会议。他们仔细听取了两位

科学家对铀矿石和原子能的介绍，会议从下午3点多一直开到晚上，气氛时而轻松，时而凝重。在会议结束后的晚宴上，一向不喝酒的毛泽东破例举起了酒杯，此时的他显得很兴奋，因为在刚刚结束的这次会议上，他拍板作出了一个后来证明足以改变中国命运和世界格局的决定，那就是研制我们中国自己的原子弹。

毛泽东说：

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

其实，对于发展中国自己的原子能事业，早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有所关注了。1949年春，经毛泽东同意、周恩来批准，中央曾计划拿出5万美元的外汇，让准备去巴黎参加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的钱三强等设法购买一批用于原子能研究的先进器材、书籍资料和实验药品。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毛泽东对苏联进行了首次访问，在这期间，苏联方面专门为他放映了一部电影，那是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爆炸第一颗原子弹的纪录影片，这部影片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且毛泽东肯定也不会忘记，新中国成立后美国那咄咄逼人的核威胁。从朝鲜战争到此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一江山岛和大陈岛的作战中，美国不仅将原子弹运到了停泊在朝鲜半岛附近的航空母舰上，进行针对中国的核模拟袭击，还将装有原子弹的导弹运到日本的冲绳岛，扬言要使用包括原子弹在内的所有武器对中国进行全面打击。

面对美国不断挥舞的核大棒，毛泽东清楚，美国人之所以敢如此威胁中国，就是因为中国人手里没有那枚“小小的东西”——原子弹。从那时起，毛泽东就下定决心，新中国一定要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

毛泽东坚定地说：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1950年5月19日，经毛泽东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就是后来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任副所长。此后，大批怀有报国理想的科学家从海外陆续回国，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开始起步。

为了加强领导，1955年7月，中央决定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中国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不久，具体负责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的第三机械工业部成立，后来改称第二机械工业部，简称“二机部”。

1956年，毛泽东还亲自领导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的编制工作，确立了“重点发展，迎头赶上”的科技发展战略，其中原子能的和平利用被列为第一重点任务，以此带动科技事业的全面发展。

对于新中国即将起步的原子能事业，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是这样说的：

“还有那个原子弹，听说就这么大一个东西，没有那个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

毛泽东的坚定，表达了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全体中国人民的信心。对抓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这件事，毛泽东还特别强调说：

“一年不是抓一次，也不是抓两次，也不是抓四次，而是抓它七八次。”

★ “我们可以自己试一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虽然毛泽东很早就下定了研制原子弹的决心，然而研制原子弹是当时世界上最浩大的尖端工程，以当年中国的科学和工业水平，要想研制原子弹几乎和登天一样难。

早在1954年国庆，毛泽东曾对来访的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说：“现在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有点兴趣……我们也打算搞这项工业。”当翻译把毛泽东这番话译过去时，赫鲁晓夫一愣，本能地回答道：“搞原子武器，中国现在的条件恐怕困难，那个东西太费钱了……如果现在中国要搞核武器，就是把全国的电力全部集中起来都难以保证……社会主义大家庭，有一把核保护伞就可以了，不需要大家都搞。”

赫鲁晓夫的这番话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此前美国为研制原子弹而实施的“曼哈顿工程”，在3年多的时间里，组织了上千名科研人员，顶峰时曾起用了53.9万余人，累计投入资金25亿美元，如此大的人力物力投入，对当时的新中国来说无疑是极为困难的。

但向困难低头不是毛泽东的性格。他还是说服了赫鲁晓夫，同意在中国将来的原子能研究中给予一些基本的帮助。同时，毛泽东还鼓励中国的科学家说，我们有了人，有了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并亲自确定了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原子能研制方针。在毛泽东的大力推动下，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程开始迅速开展起来。

从1958年开始，在党中央的组织号召下，全国各地的建设者和研究者从天南海北会集到位于今天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这片当年荒无人烟、与世隔绝的草原上，开始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实际研发工程。而此时在北京的毛泽东，也时刻关心着基地的建设和研制工作。在科研人员对原子弹研制流程有所争论时，毛泽东他明确指出，在原子能研究上“要先学楷书，后写草书”。正是这一指示确保了我国原子弹研究工作一直按照科学步骤向前推进，避免走弯路。

然而，就在各项工作紧锣密鼓进行的时候，一场突如其来的国际风波使研究工作遭遇了空前的困难。1958年，因为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的建议被中国拒绝了，中苏关系开始出现裂缝。

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借口苏联与美国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核试验的协定，打算中断向中国提供有关原子弹研制的一切技术资料。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庆典，有人曾经记载了这期间他和毛泽东的这样一段对话：

赫鲁晓夫说，关于原子弹生产，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从容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一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当然，中苏关系的曲折，绝不像这段对话描述的那么简单。

不久，赫鲁晓夫下订单方面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终止了苏联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

苏联的毁约，给中国核工业建设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和巨大的困难。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人搞过原子弹，自力更生，远没有说起来那么容易。但是困难吓不倒毛泽东和中国尖端科技工作者。

1960年7月18日，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有关会议上，毛泽东说过这样的话：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很难还的。

就在原子弹研制最需要加大投入的关口，新中国却遭遇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罕见的三年自然灾害。此时，对于原子弹是继续上、是缓、还是下？在国防科技系统，甚至在最高决策层也引起了争论。

1961年夏天，在北戴河召开的国防工业委员会工作会议上，关于原子弹研制是否继续的争论还在升温。会上有人认为研制原子弹花钱太多，会影响常规武器的研制和国民经济的调整恢复，因而主张暂时下马，等国民经济好转后再上。而主张原子弹继续上马的则以陈毅、聂荣臻、贺龙等几个元帅为代表。据说陈毅甚至说了这样的话：“就是把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

毛泽东对这个会议非常关心，他充分注意到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在这次会议之前，当时主管国防科研工作的聂荣臻元帅曾将一份日本军事工业发展情况的资料报送他。几天后，毛泽东作出批示：中国的工业、技术水平，比日本差得很远，我们应取什么方针，值得好好研究一下。

根据毛泽东的批示精神，经过研究，国防尖端技术发展方针被确定为收缩战线，集中力量抓两头，一头抓科研试制，一头抓工业基础。

聂荣臻事后说：毛泽东的这一指示，成为解决这一争论的契机。

为了掌握实际情况，解决争论，经毛泽东批准，中央还委派时任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张爱萍将军对原子弹研制工作进行实地调研，一个点一个点地摸情况。历经数月艰苦调查，张爱萍向中央递交了调查报告，认为我国的核工

业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只要加强组织协同力量，各项保障跟上去，1964年或1965年成功试爆原子弹是有可能的。

最后，毛泽东一锤定音，决定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下马，并且决定在1964年试爆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新中国的原子弹研制工作，再次挺过了难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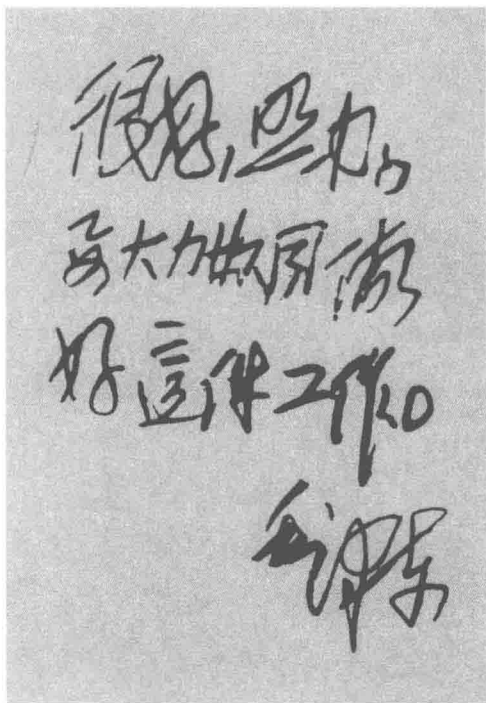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当时间进入1962年，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进入了最紧张的阶段。当年10月30日，时任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向毛泽东和党中央递交了一份报告，提出实现原子弹爆炸必须取得全国在人力和物力上的大力支援，建议成立一个专门委员会，以加强对原子能工业的领导。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在这份关于成立专门委员会加强对原子能工业领导的报告上，重重地写下了这样一份批示：

“很好，照办，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不要小看这短短15个字的批语。在研制原子弹这项异常复杂浩大的工程中，任何一个环节都是需要多部门甚至举国协同。仅是提取制造原子弹的核心材料铀235，其整个工艺流程就要跨越大半个中国，经过数万人的劳动。许多参与这项工作的人都说过，如



★ 1962年11月3日，毛泽东批准二机部关于争取两年内实现爆炸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规划，并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加强对这项工作的统一领导。图为毛泽东批示手迹。

果没有毛泽东的“要大力协同”的批示，在当时经济上、技术上举步维艰的中国，要取得原子能工业的突破，是难以想象的。正是有了这个批示，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26个相关部委、900多家工厂高校和研究机构，为了原子弹研制紧密协调、通力合作。

根据毛泽东的指示，中央成立了以周恩来为主任的中央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以领导原子能工业建设。这个由15人组成的中央专门委员会非同小可，除了周总理直接牵头以外，里面仅副总理就有7个，其他7位都是政府部长。名单如下：

主任：周恩来。

委员：贺龙、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陆定一、聂荣臻、罗瑞卿、赵尔陆、张爱萍、王鹤寿、刘杰、孙志远、段君毅、高扬。

如此强有力的领导阵容，显示了专委会极大的重要性和权威性。专委会的主要任务是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

中央专委的成立，大大加强了对原子弹研制工作的领导，在全国上下协同配合下，新中国的原子弹事业向着成功越走越近了。

1964年秋，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如期装配完成，但是在当时的国际环境下进行试验，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美国扬言，中国若要进行核爆炸，他们就要摧毁中国的核设施。中苏之间也正在激烈论战，相互敌对。因此，中央专委做了两套方案，一发展技术暂不试验，二不怕风险尽早试验。

方案报到毛泽东那里，最后由毛泽东拍板，决定尽早试验。毛泽东说了这样一句话：

原子弹是吓人的，不一定用，既然是吓人的，就让它早响。

1964年10月间，在人迹罕至的新疆罗布泊的戈壁滩上空传出一声震惊世界的巨响，从地平线上升腾而起，喷射出耀眼光芒的蘑菇云让人永远地记住了这

个时刻：

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喜讯传到北京，当周恩来向毛泽东报告这一喜讯的时候，毛泽东沉稳地说，一定要搞清楚是不是核爆炸，要让外国人相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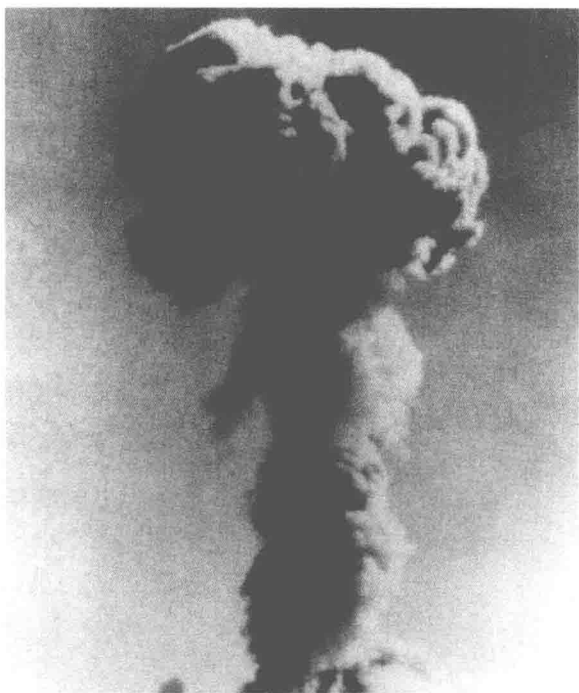
当确定是原子弹爆炸成功后，周恩来陪同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观看了大型歌舞《东方红》的演出时，当场宣布了这个令人振奋的消息，会场上响起久久不息的掌声。当晚，新华社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消息。

这一刻，距离毛泽东在北戴河提出要下定决心，自力更生搞尖端技术的时间仅仅4年，中国就迈入了核大国行列。

这一声巨响，中国向世界展示了自己不屈不挠的骨气和自力更生的精神，也向世界展示了新中国的实力。当年的法国《民族报》曾这样报道说：“中国的原子弹把中国加入联合国以及它作为一个大国登上国际舞台的问题提上了日程”。而在1964年10月21日联邦德国出版的《明镜》周刊上，有文章则认为：“中国的核爆炸……从长期来看，将改变世界力量对比。”

★我们不能走技术发展的老路，“必须打破常规”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极大地振奋了全国



★ 1964年10月，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人民的自信心，然而毛泽东并没有就此满足，他始终注视着国际上尖端科学的最前沿。就在原子弹爆炸试验成功后的10月19日，周恩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提出：原子弹的爆炸，会引起我们思索一些问题，会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我们要迎头赶上，要搞新技术，不要走老路。周恩来的这一想法，与毛泽东不谋而合。在1964年底召开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也说，我们不能走世界各国技术发展的老路，我们必须打破常规。

随后，他审时度势地作出了“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的指示。广大科研工作者在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的鼓舞下，奋力拼搏，于1967年6月17日在西部地区上空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从原子弹到氢弹，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而中国仅用了两年零8个月。

在当时世界，除了原子弹和氢弹以外，以运载火箭技术为基础的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也是最重要的尖端科技。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人类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上了太空。毛泽东对此很重视，认为这是社会主义阵营的胜利。而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的竺可桢、力学所所长钱学森、地球物理所所长赵九章等也及时向中央



★ 在1964年首都新年联欢晚会上，毛泽东与军队高级将领亲切交谈。

上书，建议开展中国的运载火箭和卫星研究工作。

1958年5月17日，毛泽东在八大二次会议上正式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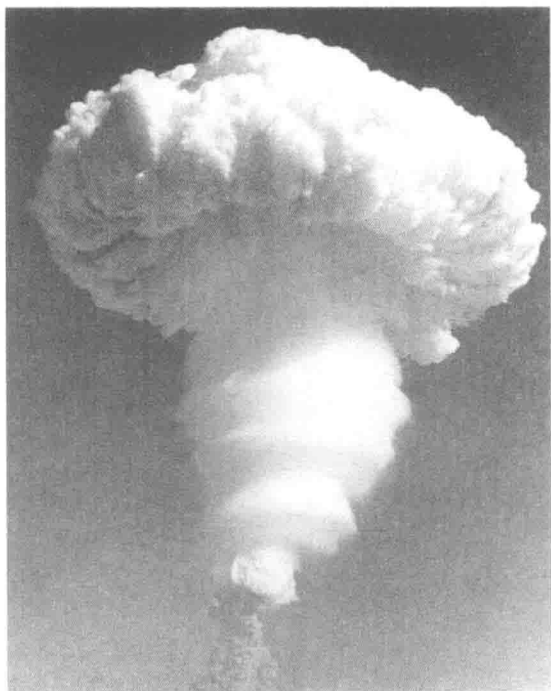
此后，中国科学院制订了分三步走的卫星研制规划：即第一步发射探空火箭，第二步发射小卫星，第三步发射大卫星。

发射洲际导弹和人造卫星的基础是运载火箭，早在1956年我国就已经开始了运载火箭的研究工作。1960年5月28日，毛泽东到上海科学技术成果展览会尖端技术展览室参观了T-7M火箭。当汇报这是没有苏联专家、没有资料，依靠自己的专家设计研制而成时，毛泽东连声称好，并询问火箭可飞多高，回答能飞8公里，毛泽东说：“8公里那也了不起！”“应该是8公里、20公里、200公里，搞上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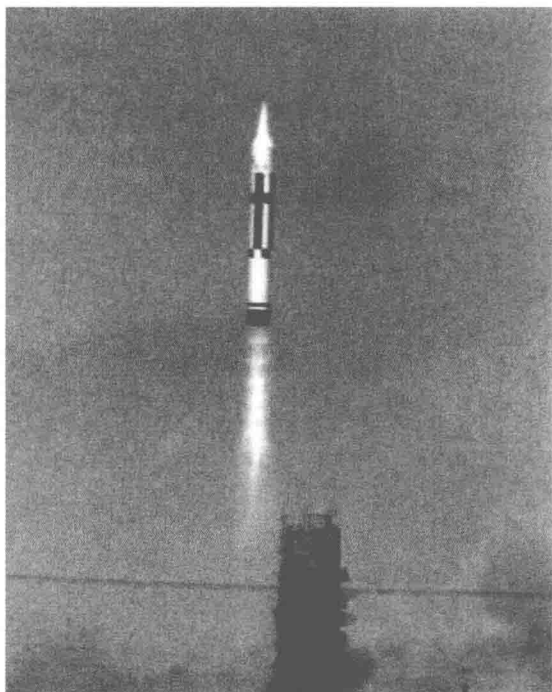
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推动下，中国的运载火箭技术和弹道导弹技术迅速突破。上世纪60年代，我国便成功研制出第一代弹道导弹，培养了一批导弹专家。

到上世纪70年代，中国独立研究出东方系列弹道导弹，射程覆盖全球范围，其制导精确性也大大提高，并可以携带多个分导弹头，成为我国武库中战略威慑的又一重器。

就在我国洲际导弹技术取得突破的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的重视下，在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也成功上天，这就是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



★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 1971年9月10日，我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发射成功。

东方红1号，它的直径约1米，重173公斤，超过了苏、美、法、日四国首颗卫星重量的总和。

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成功，广大科技专家和参加工作的人员经过了4年多的艰苦努力。1970年4月24日晚21点35分，西昌卫星发射中心，长征一号火箭带着卫星直冲云霄，13分钟后成功进入轨道。这是一颗不但看得见而且听得着的卫星，它以20兆赫的频率向全世界播放着歌曲《东方红》。1970年5月1日晚上，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

见了参加发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作人员代表，并且和现场群众一起观看了通过广场上空的卫星。

我国由此成为第五个能用自制运载火箭发射洲际导弹和国产人造卫星的国家。

可以说，毛泽东打破常规搞原子弹、氢弹和洲际导弹的决策，使中国较早地跨进了核大国和航天大国的门槛，从而拥有了自己的核保护伞和安全天空，这对摆脱那些超级大国对我国的核讹诈和核威胁，维护我国的独立自主和国家安全至关重要。

有人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科技事业全力追赶世界先进国家、尖端科技跨越发展的年代。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们，对此有着切身的体会。当年的外交部长陈毅元帅曾说过一句话：“没有原子弹，我这个外交部长的腰杆就不硬。”有史家评论，“两弹一星”挺起的不只是一个外交部长的脊梁，更是一个世界大国的

脊梁。

1988年10月24日，邓小平在谈到“中国必须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的问题时，深刻地说过这样一句话：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中国科学家在回望我们民族和国家获得这种能力的过程、欣慰这种兴旺发达的标志时，耳边始终回荡着毛泽东的这样一句话：

“科学技术这一仗，一定要打，而且必须打好。”



毛泽东

MAO
ZEDONG



讲军队现代化

“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



“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

——毛泽东：《在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1954年10月18日）

“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这是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共同追求。

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在此之前，1949年9月21日，毛泽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早已郑重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

开国大典之后，举行了新中国的第一次阅兵式。一支支英雄劲旅在天安门广场前走过，30万军民难以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和喜悦，阵阵海啸般的欢呼声在广场上空飘荡。

作为新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最高领导人，当毛泽东久久地挥手向广大军民致敬、与人民共同欢呼民族解放和人民胜利的时候，凝视着这支英雄无比却多以缴获敌人的“万国牌”武器为装备的军队，他自然比身边欢呼的人们想得更多、更远。

★ “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近代中国遭受百年屈辱，被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打开大门后，被迫割地赔款，一步步滑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深渊。为挽救国家危亡、实现民族振兴，“强军”梦想成为近代中国无数志士仁人的不懈追求。

镜鉴历史，方可登高望远。在1954年国防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经提到：近代中国的强军之路，可以分作三个历史阶段。第一代是清朝末年搞的新军。新军和孙中山建立的革命党，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推翻了清王朝，但后来腐化了，军阀割据，相互混战，被人民唾弃。第二代是黄埔军。通过北伐，打倒了各地军阀，实现了中国形式上的统一，后来，也脱离了人民，成为蒋介石政府控制下的反动武装。第三代就是红军，也就是现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毛泽东提到的这支人民军队，由南昌起义开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由小到大、由弱变强，硬是凭借“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发展壮大，其间打跑了日本侵略者，打败了美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国民党军队，建立了新中国。

从历史上看，新中国建设一支强大的革命军队，是近代中国百年“强军梦”的延续，也是人民的希望和所需要的方向。

驻足现实，形势依旧严峻。新中国成立了，革命战争就此基本结束。一方面，这为人民解放军的建设提供了更加有利的客观环境和条件，因为不再像战争时期那样只能主要依靠解放区的基础和力量进行建设，从现在起，有了可以依靠全国的基础和力量进行军队建设的可能性；另一方面，新政权面对的敌人依然强大，蒋介石集团盘踞在台湾，伺机反攻大陆，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外部敌对势力的威胁仍在，保卫人民政权和维护国家安全的重担在肩，不能卸下。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一再呼吁要建成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把“强军”作为新中国的两件大事之一来抓，并写进了规划新中国发展蓝图的《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将“加强现代化的陆军，并建设空军和海军，以巩固国防”作为一项重要任务以法律形式作了明确规定。

从建立新中国前夕到1954年，在一系列大大小小的会议上，毛泽东经常提到新中国的强军使命，通过凝聚全国人民共识，使“强军”成为大家为之奋斗的共同目标。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以及国防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等多个场合，毛泽东明确提出：

“我们将不但有一个强大的陆军，而且有一个强大的空军和强大的海军。”

“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

“中国是个大国，要有强大的陆、海、空军。”

同毛泽东的迫切心情一样，对于新中国建设强大的陆、海、空军，周恩来、朱德等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其他成员也多次表达了同样强烈的愿望。1950年9月30日，周恩来总理在《为巩固和发展人民的胜利而奋斗》中说道：“我们必须建立强大的人民空军和人民海军，才能够击退从空中和海上袭来的武装盗匪，保护我们的领空领海不受侵犯。我们的人民陆军必须继续加以强化，使它足以战胜任何侵略者。”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在1950年9月25日的全国战斗英雄代表会议和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上明确提出：“必须建设一支十分强大的、足以击退任何侵略者进攻的现代化的国防军”。党和军队的领导人为建设一支强大的国防军队，都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在中国这样一个一穷二白的国家，建成强大三军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既要创造客观条件，又要付出千百倍的主观努力。毛泽东对此充满了信心，正如他1952年7月10日对军事学院第一期毕业学员的训词中所说：自从中国人民获得全国范围的胜利之后，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了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客观条件已经完全具备了这种可能，只需加上不疲倦的主观努力，就一定可以实现。

就在这一天的毕业典礼上，刘伯承院长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来的这份训词，最后一段是这样写的：

“军事学院全体的指挥员、政治工作人员、后勤工作人员、教员、第一期毕业的学员和正在学习的学员同志们：军委希望你们在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光荣事业上，继续努力；并希望通过你们的努力，把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的精神，贯彻到所有部队中去。”

在训词中，毛泽东提到了一个重要的强军命题：新中国进入建军的高级阶段，也就是进到掌握现代技术的阶段，目标就是要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

新生人民政权的最高领导者坚信：中国是一个大国。在人民拥护的基础上，加上各方面的努力，新中国是一定能够建设一支现代化的革命军队的。

★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部队转变

新中国成立时，人民解放军只有单一的陆军，海军和空军尚在筹建之中。1949年4月，人民海军初创，从陆军转到海军的同志中，不少人连大海都没见过，海军的业务技术更无从谈起，刚缴获来的敌船，大都有船无燃料，有炮无弹药，可谓白手起家。空军的情况也好不到哪里去，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因为能够起飞的飞机数目太少，周恩来特意让参加受阅的17架飞机的头9架又重新飞了一圈。

毛泽东深知：虽然打了几十年仗，中国有了一支还算是强大的陆军，但是，只凭单一的陆军，无论其战斗力多么强大，也很难适应现代化战争的需要，因此，新中国军队建设的当务之急是创建海军和空军，建立起以三军为主体的军队体系。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不久的一段时间内，除1927年八一诞生的陆军外，其他军兵种领导机关也陆续成立了：1949年11月11日，空军领导机关成立；1950年4月14日，海军领导机关成立；1950年8月1日，炮兵领导机关成立；1950年9月1日，防空兵领导机关成立；1950年12月25日，工程兵领导机关成立……

但是，新中国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百业待兴，国力有限，军队建设必须要适应和服从国家经济恢复的需要，不可能倾尽举国之力，一夜之间建成强大

的三军，一步就跨入世界军事强国之列。鉴于此，毛泽东根据不同时期的国内外形势和相应的军事需要，采取了有步骤、有阶段、有重点的发展策略，通过适时调整军队建设重点，加快了人民解放军由单一陆军向诸军兵种合成部队转变的步伐。

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的主要任务是解放沿海岛屿、台湾以及东南沿海的反封锁、反袭扰作战，海军的地位和作用愈显重要，所以，人民解放军最早建设的重点是海军。

1950年1月12日，毛泽东签发命令，任命萧劲光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负责组建海军领导机构。同年8月，海军领导机构在北京召开海军建军会议，专门研究海军建设的形势、任务和发展方向问题，制定了海军建设的方针、原则和三年建设计划，提出了“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的海军发展目标。

新中国海军的建设，一方面是通过修复、改装从国民党海军中接收过来的旧舰艇和利用有限的造船工业开始自行设计制造机帆船、小型巡逻艇等小型舰船，尽快建成一支基础力量；另一方面是寻求苏联的技术指导和从苏联购进所需要的大型舰船装备，提升海军的战斗力。

透过一份1950年中国向苏联购买装备的订货清单，人们可以了解到，海军在新中国最初的国防规划蓝图中的重要地位。1950年2月，在苏联向中国贷款3亿美元的贸易协定中，有1.5亿美元是中国用于购买海军装备的。同年10月下旬，毛泽东致电斯大林，请求帮助解决技术指导和舰艇、飞机、火炮等装备问题。在这份电报的订货清单中，除了1950年已经确定的订货外，3年内计划订购的主要装备还有：驱逐舰12艘、护航驱逐舰18艘、小型潜艇2艘、猎潜舰42艘、猎潜艇28艘、扫雷艇30艘、远航鱼雷快艇100艘、装甲艇56艘、水鱼雷飞机108架和9个海岸炮兵团的火炮等。

尽管朝鲜战争爆发以后新中国军队建设重点有所转移，海军建设规模被暂时压缩，只能先从造小艇入手积累经验，但是，经过海军将士的努力，在较短的时间内，海军的建设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到1955年底，人民海军已经拥有战斗舰艇519艘、辅助船只341艘，共计860艘。此外，北起辽东半岛、南至

海南岛的沿海重点地区建成了各种口径的海岸炮阵地。

人民海军领导机关和部队的组建，标志着人民解放军增加了一个新的军种。从此，人民海军担负起保卫中国海防、捍卫国家领海主权的使命，结束了中国近代长期有海无防的屈辱历史。

唇亡齿寒。在美军越过三八线后，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央军委及时调整了军队建设重点，由重点建设海军转为重点加强空军、炮兵和装甲兵的建设，迅速扩编空军和陆军技术兵种部队，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并确定将原计划用于购买海军装备的苏联贷款大部分改为购买空军飞机和陆军武器装备，以保证部队在朝鲜战场上的作战需要。

对于新中国的空军建设，毛泽东倾注了心血。从1949年11月空军司令部成立到1953年朝鲜战争停战，毛泽东亲自批阅空军请示报告数十份，并向苏联领导人发出许多封信件、电报，不仅确定了空军建设的方针、原则，还直接出面解决购买装备等问题。

值得一提的是，战争期间，国内人民积极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仅1951年6月到1952年5月，所捐献的全部价款，就可以购买3710架苏制米格-9战斗机，人民群众的捐献运动对新中国空军的发展壮大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成立不久的人民空军在抗美援朝的战火洗礼中得到成长。志愿军入朝时，空军仅有新组建的2个歼击航空兵师、1个轰炸机团、1个强击机团，共有各型作战飞机不足200架。到1953年朝鲜停战时，不到4年的时间，共发展到28个师70个团，其中歼击机18个师、轰炸机5个师另1个独立团、强击机4个师、运输机1个师另1个独立团、侦察机3个独立团，拥有各型飞机3000余架，建成了一支由各种航空兵种组成的有战斗力的空中力量，并在抗美援朝战争后期发挥了巨大威力。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志愿军空军总共起飞2457批26491架次，共击落美机330架，击伤美机95架，而志愿军空军被击落231架，被击伤151架，美国空军参谋长范登堡在战争期间惊呼：“共产党中国几乎在一夜之间变成了世界主要空军强国之一。”

在战火中诞生，又在战火中成长。在完成解放全国大陆和部分沿海岛屿、以志愿军名义取得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的过程中，到1953年底，新中国的军队完成了从战争时期向平时时期军队建设的过渡，基本上完成了由单一陆军体制向



★ 1953年毛泽东视察海军某部。 |

诸军兵种合成军队体制的转变，并初步实行了统一的指挥、统一的制度、统一的编制、统一的纪律和统一的训练，为建设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新中国军队的建设过程中，尽管国务繁忙，毛泽东还是多次抽出时间，深入部队一线，与三军将士们密切交流，鼓励大家为建成强大陆、海、空军而奋斗。

1950年4月15日，毛泽东为《人民空军》杂志创刊题词中指出：创造强大的人民空军，歼灭残敌，巩固国防。

1952年3月24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刘少奇等领导人的陪同下，接见了不久前参加“三八”国际妇女节飞行表演的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毛泽东问在场的空军司令刘亚楼：她们都成器了吗？刘亚楼回答说：都成器了，能够独立执行任务了。毛泽东听了非常高兴，并风趣地说：细妹子不简单，飞得好高啊。

1952年10月28日，毛泽东视察华东军区装甲兵部队，详细询问了部队装备情况，当听到部队里有美式、日式坦克，还有苏联援助的T-34型坦克时，他打趣说，看来你们的家当还不少哟。在同战士们的交谈中，毛泽东鼓励战士们努力学习文化技术，把坦克兵种搞好。为了不打扰部队的正常训练和工作，他晚上就住在专列上，视察完毕后，叮嘱部队领导不要前来送行，一定要把部队带好。

1953年2月19日，毛泽东结束了对南京的视察后，对海军舰艇部队进行视察。毛泽东登上军舰，和水兵一起航行了四天三夜。毛泽东在军舰上，走遍了每个战位、舱室，对水兵们的工作、学习、生活，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教导官兵要爱舰、爱岛、爱海洋，要努力学习军事技术，要争气，一定要建设强大的海军。毛泽东用了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分八批同海军战士合影。照相的时候，毛泽东不时拉拉身边的战士，又指指站在驾驶台上的水兵，问能不能都照上。当记者回答都能照上时，毛泽东才放了心。在这次视察中，毛泽东先后5次为“长江”“洛阳”“南昌”“黄河”“广州”五舰，挥笔写下了同样内容：“为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

★实现武器装备的“中国造”

在完成海军和空军的创建工作后，另一个重要的命题任务又摆在了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的面前，就是实现军队武器装备的“国产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出于尽早打赢朝鲜战争的需要，在努力加强自身国防工业建设的同时，选择了一条从苏联购买武器装备的捷径。但是，中国是一个大国，不可能长期靠购买武器来支撑国防。要真正建成强大的国防，就不能受制于人，唯一的出路是在充分吸收他人成果的基础上，走自己研制、生产之路。

经过新中国成立后3年的努力，人民民主政权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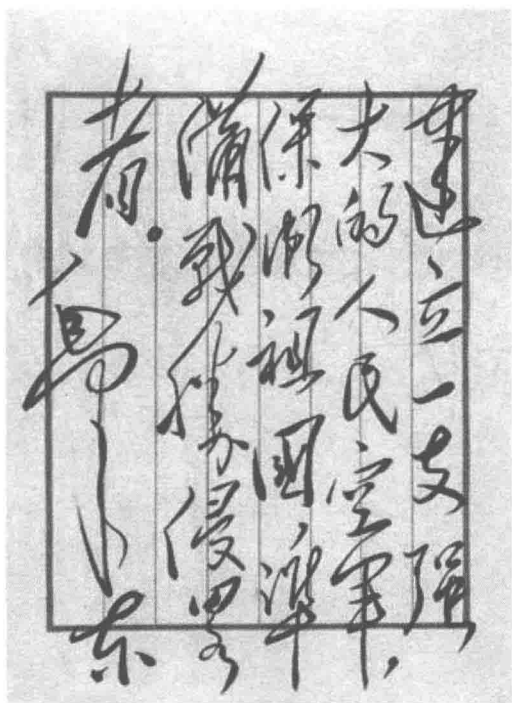


★ 1954年10月，毛泽东在中南海参观解放军通信装备展览。 |

益巩固，国民经济得到恢复，朝鲜战争达成停战协议，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定1953年开始实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此，新中国进入了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国力的恢复，战争的结束，经济建设的开展，为中国发展军事工业、实现武器装备国产化提供了良好的契机。旨在实现武器装备“中国造”的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应运而生。在1952年制订的《一九五三年至一九五七年军事建设计划纲要》中兵工生产规划的基础上，1953年8月，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审查批准了由政务院和中央军委共同制订的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

国防工业“一五”建设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集中力量按国家规定的项目和进度，在苏联援助下完成国防工业企业的新建和改建任务，完成制式武器的试制和生产任务，完成飞机、坦克、舰艇的修理及部分制造任务，初步改变国防工业的落后面貌，增强国防力量，其间计划新建航空、无线电、兵器、造船等大型骨干工程共44项，改建扩建老厂的大中型工程共51项。

在1953年和1954年前期建设准备的基础上，从1955年开始，国防工业建设工程大规模展开。由于新建项目多、工程量和投资额巨大，要完成如此大规模建设工程，难度相当大，根据国家国防建设的总体部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的重点，国防工业建设采取集中



★ 1955年，毛泽东为空军英雄模范功臣代表大会的题词。



★ 1963年11月1日，毛泽东在杭州观看被我空军某部击落的美制蒋军U-2飞机残骸照片。

力量打歼灭战的办法，以坦克和航空配套项目为重点，集中人力、物力、财力，分批进行建设。

在1954年，毛泽东曾经多次发出著名的“中国能造什么”之问：中国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那个时候，毛泽东急切地想知道：什么时候，中国可以造出汽车、飞机、坦克和

拖拉机？

经过“一五”国防工业建设计划的实施，当时间来到1959年，毛泽东的问题全都有了明确的答案。1954年7月3日，在南昌，中国第一架仿制教练机——初教-5飞机试飞成功，揭开了中国飞机制造史上的第一页。1956年7月13日，在长春，新中国第一辆汽车“解放牌”载重汽车下线。1956年7月19日，在沈阳，新中国第一架喷气式战斗机试飞成功。1957年10月，在上海，新中国第一艘鱼雷潜艇建造成功。1958年7月20日，在洛阳，新中国第一台“东方红”拖拉机诞生。1958年12月，在包头，新中国第一辆国产坦克试制成功。

新中国的第一辆国产坦克的诞生地是坐落在塞外包头的内蒙古第一机械制造厂。1955年底，35岁的青年厂长郭韞接到上级命令，要在1959年国庆节前

生产32辆T-54A中型坦克，编队参加国庆检阅。接到这一光荣而又神圣的任务，郭韞和工友们反复分析研究，提出了边基建、边安装、边试制的“三边”建厂方针和“平行、立体、交叉、流水作业”的施工方法。大家披着夜色上班，顶着星星下班，如饥似渴地边学边干，经过3年苦干，赶在1958年12月25日试制成功了第一辆全部整件都由中国自己生产的坦克。1958年12月30日，一机厂以全厂职工的名义给国家主席毛泽东发去捷报：“明年10月1日——建国十周年的伟大时刻，将以成批的最新型的国产坦克和重型牵引车经过天安门，接受您的检阅”。



筚路蓝缕，艰苦创业。在“军民结合、平战结合”的国防工业建设方针指导下，到1959年底，新中国全面改造了老企业，新建了一批骨干企业，建成了沈阳、北京、太原、西安、成都、重庆、兰州等国防工业企业比较集中的生产基地，初步形成了研究、设计、生产相配套的国防工业体系，不仅具备了仿制和生产常规武器装备的能力，而且在仿制的基础上开始了自行设计的尝试。有了国防工业体系的有力支撑，由此，新中国的海军和空军的装备初具规模，陆军各技术兵种的装备得到了迅速发展，三军基本上实现了常规武器装备制式化和国产化。

时光荏苒，开国大典的印迹依然清晰。1959年10月1日，新中国的第十个国庆日，天安门前又一次

★ 1964年6月，毛泽东接见连续击落美制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的人民空军某部。



★ 2015年9月3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图为三军仪仗队方队接受检阅。

走过了参加阅兵式的人民军队。这一天，成百上千辆坦克、装甲车、火炮组成的机甲方队隆隆驶过的同时，上百架作战飞机掠过广场上空。这一次，三军将士的武器装备不再是“万国牌”，而是近乎百分之百的“中国造”。

今天，当人们慢慢翻开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每一个阶段的历史，再翻开人民解放军成立90周年的历史时，人民军队逐步强大的步伐耀现史册，毛泽东那一代人追求的“强大的国防军”“强大的陆、海、空军”的梦想，终于变成了现实。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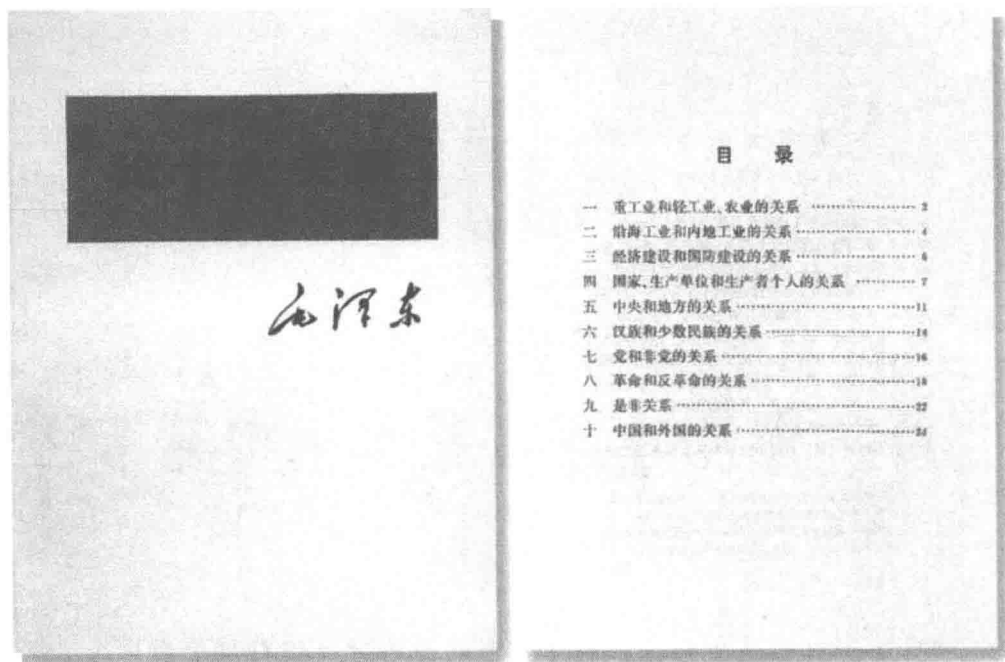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 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我们一定要加强国防，因此，一定要首先加强经济建设。”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1956年4月25日）

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基础，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好，国防建设才能有充分的保障，这是毛泽东处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关系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和建设规律，对建设国家、保卫国家两大历史任务辩证关系的科学认识。民主革命时期，随着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毛泽东已经开始深入思考这个问题。新中国成立以后，结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实际，他又作出了新的阐发。1956年《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发表，标志着毛泽东这一思想的成熟。



★ 毛泽东《论十大关系》单行本。 |

★“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精兵简政——发展经济

1941年，延安，陕甘宁边区经济最困难时期。物资极度匮乏，缺衣少粮，内外交困。毛泽东曾经这样描述当时的困难程度：

“我们曾经弄到几乎没有衣穿，没有油吃，没有纸，没有菜，战士没有鞋袜，工作人员在冬天没有被盖。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待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

这时，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1941年6月3日，边区政府召开县长联席会议，讨论征粮问题。突然，会议室被雷电击中，延川县代县长李彩云不幸身亡。事后，一个农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民愤愤不平地说：“老天爷不睁眼，咋不打死毛泽东呢？”

第二件事情是，1941年11月，在边区二届一次参议会上，边区民主人士李鼎铭根据边区的困难情况，提出了有关财政问题的提案。提案的核心内容是：

“政府应彻底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之现象。”

这两件事情，反映了边区经济困难、人民负担过重的实际，同时也向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人民军队要发展，要壮大，群众生活要维持，要改善。现在财力严重不足，怎么办？

经济建设创造物质财富，军队建设消耗物质财富，这是一对客观存在的矛盾。认识这个矛盾，解决这个矛盾，是人民军队生存和发展的重大问题。

毛泽东总是善于从困难中抓住转机，化被动为主动。他一面制止有关部门处理骂他的农民，一面开展深入调查研究，对党的经济政策作了“反省”。他把李鼎铭的提案整个抄到自己的本子上反复阅读，重要的地方用红笔圈起来，并加了一段批语：“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造我们的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反省”之后，他作出了两个重要的决定：一是号召积极开展以农业为中心的大生产运动；二是接受李鼎铭先生的建议，实行精兵简政这个“极其重要的政策”。



★ 1941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讲话。这次会议通过了“精兵简政”的决议。

毛泽东认为，只有实行精兵简政，边区农民富裕起来了，才能有力地支持抗战。然而，党内有人担心，这样做会使边区在遭到敌军进攻时没有足够的武装保卫力量。针对这种担心，毛泽东从维护抗战大局的角度作了说明：

“敌后的严重的必然趋势就是缩小。敌后变化是突然的，在事变后再干就被动，故要主动和定出办法”；

“在目前，战争的机构和战争的情况之间已经发生了矛盾，我们必须克服这个矛盾。敌人的方针是扩大我们这个矛盾，这就是他的‘三光’政策。假若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然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因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使我们的战争的机构适合战争的情况，我们就将显得越发有力量，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

当年12月，中共中央发出精兵简政的指示，要求切实整顿党、政、军各级组织机构，精简机关，充实连队，加强基层，提高效能，节约人力物力。

为保证这项举措不折不扣地落实下去，毛泽东亲自为陕甘宁边区等抗日根据地的精兵简政工作制定出具体的原则和办法。边区先后进行三次精简，取得很大成效。同时，他又多次致电华北、华中各抗日根据地，反复强调根据地缩小必然到来，要求他们下大决心实行精兵简政，准备面对“愈来愈厉害”的物质困难。他说：这一次精兵简政，必须是严格的、彻底的、普遍的，而不是敷衍的、不痛不痒的、局部的。否则，“如使根据地民力财力迅速枯竭，弄到民困军愁，便有坐毙危险”。

经过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和精兵简政，边区经济困难得到很大缓解，军队基本实现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目标。单单1941年和1942年两年中，军队和机关学校靠自己动手而获得解决的部分，占了整个需要的大部分。有些部队还实现了全部自给，且有富余，可以上交一部分粮食、生猪、羊毛等。毛泽东说：“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未有的奇迹，这是我们不可征服的物质基础。”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经济建设发展了，反过来又促进了军队战斗力的提高，人民军队与根据地群众的鱼水关系也得到进一步加强，各种效果显而易见：

看农民：获得实际好处后，更加把自己的命运同党和人民军队紧紧地联在一起；

看干部：一批能打仗又能搞组织工作、建设工作的干部迅速成长起来；

看部队：人民军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培育形成，人民军队的战斗力更加强大；等等。

这些，都是不能拿数字来计算的无价之宝。正是有了这些无价之宝，在最困难的时候，党领导下的主力部队人数虽然由50万压缩到30余万，但是，与主力部队密切配合的地方武装和民兵自卫队却得到了快速发展。到1945年，解放区的抗日军队已经达到了91万余人，为彻底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中国，完成旧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任务，打下了重要基础。我们不仅避免了“民困军愁，坐以待毙”的危险，而且实现了人民军队的大步发展。

应当说，使党和人民军队渡过严重困难，绝处逢生的关键，就是毛泽东所提倡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精兵简政。1942年12月，毛泽东对经济建设和军队发展的关系作了进一步思考，把这段历史的基本经验概括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新中国成立后，这一认识所体现的人民军队建设规律和辩证思维得到进一步发展。

★“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

1950年9月，朝鲜战争已经打了近三个月。密切关注战场局势的毛泽东，收到中国人民解放军东北军区司令部的一封电报。电报说，在上古龙村发现了美机活动。事实上，不仅在东北，在上海、山东沿海等地，均陆续发现美机或美舰侵袭的情况。美军对我的侦察、试探是肆无忌惮的。这些情况，引起了毛泽东的警觉。但是，我们的空军、海军都还处于起步阶段，没有能力对此作出军事回应。对此，毛泽东于9月16日作出批示说，对这些侵袭置之不理是不妥的，但是，“若每次抗议则不胜其烦，似宜每隔10天或半月汇集多案抗议一次，请酌办”。透过这些话，可以看到毛泽东在字里行间所表露出来的无奈。

这个时候，新中国成立已经近一年。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国家，需要解决的问题千头万绪，怎样抓住主要矛盾、打开局面？毛泽东根据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落后、国防建设迫在眉睫的现实，明确指出，“中国必须建立强大的国防军，必须建立强大的经济力量，这是两件大事”。

这两件大事，哪一件都举足轻重。但是，随之而来的更为严酷战争，使国防现代化的历史任务更加尖锐地提了出来。

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后，虽然作战勇敢，战果辉煌，但武器装备落后、后勤补给线不畅，部队损耗也很严重。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不得不向苏联寻求更多的装备援助。毛泽东在给斯大林的电报中说，“我军在朝鲜作战八个月来，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和急于改善我军装备的必要”。给在苏联承担谈判任务的徐向前发电时，他更直接地点明：“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

不仅如此，我们在拥有尖端武器方面，还是空白！这对于仍然处于战争威胁下的新中国而言，是锥心之痛。抗美援朝中，美国数次以“使用核武器”相威胁。1953年，他们甚至秘密将战术核武器运到了冲绳岛。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后来在回忆录中曾经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在朝鲜之所以作出最后的让步，乃是美国的核威胁起到了“抑制的作用”。

核讹诈就像一把悬在新中国头上的剑，时时刻刻牵制着我们的手脚，影响着我们的战略决策。一直到我国即将开始核爆的前一刻，这把剑还在晃动。有人说，这是一种比刚刚推翻的三座大山更沉重更现实的压力。

这种压力，增强了毛泽东独立自主加快发展国防工业、加强武器装备建设的紧迫感。1953年1月22日，他主持召开中央会议，讨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制定。在会议总结时，毛泽东指出：

“无论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果如何，都要搞国防工业的建设与军工生产。朝鲜战争证明，已不能靠夺取敌人的装备来武装自己了。”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1955年，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发出号召：

“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

这些认识，为“建立强大的国防”提出了明确的方向，即建立在国防科技技术基础上的武器装备现代化。

蓝图已经绘就，但要把它变为现实，又何谈容易！

旧中国的经济条件和工业基础都十分薄弱。新中国成立时，中国还有90%左右的分散的个体的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90%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

1956年2月，受周恩来委托，归国不久的钱学森起草了《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意见书》。《意见书》说道：

“我国现在航空工业是十分薄弱的，我们在最近才从飞机修理阶段转入飞机生产阶段，有了飞机工厂和喷射式推进机厂。但是这两个工厂现在完全依靠苏联供给的图纸，自己还不能够设计新型飞机，更不能作出为设计用的工程及科学资料。至于飞弹火箭，我们是完全没有。

说到航空用的材料，我们的情况也是一样薄弱。现在只有一个年产20000吨的铝厂。我们所必需的航空特殊金属还是要由国外进口。电子器材厂也是正在开始，还不能完全生产各种类型的零件。

至于航空研究，我们只有些主要地为教学用的风洞及其他实验设备。我们还没有专为研究用的设备，更没有大型为设计研究用的设备。所以可以说，我们完全没有航空研究可言。

人力呢？我们也是很薄弱。以整个力学来说，估计全国有180人从事力学教学；力学研究的高级干部，中间最有能力的，能做领导工作的只30人左右。航空人才只是力学人才中的一部分，人是更少了。”



★ 1956年1月20日，毛泽东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发表讲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

由此可见，我们的物质基础、人才储备，与国防现代化所需要的条件相比，实际上是一种“代差”。要搞原子弹，抓尖端科技，就必须在短时期内迅速增强经济实力、提高科技水平，克服这个“代差”。

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两者齐头并进，存在巨大的困难。打基础与抓要害，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历史以更为急迫的方式，再次把这个难题摆在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前。

★ “国大，军就会大。
国不大，军就不能大”

在回答上述难题的同时，毛泽东还要同时面对另一个历史性课题——社会主义建设。1956年，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造顺利完成，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即将开始。这样，统筹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就与社会主义建设的大背景直接联系起来。

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20日，在会议最后一天，毛泽东发表讲话。他号召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他说：

“现在是打什么仗呢？现在是要飞机飞上一万八千公尺的高空，飞的速度是超音速。那个东西，没有他们不行的，而且我们自己也要变成他们。”

会后，全国兴起了“向科学进军”的热潮。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一九五六年——一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九六七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纲要》列出了12个科技发展重点，推动社会主义工业化，部署发展原子弹和导弹研制所需要的喷气与火箭技术、半导体技术、电子计算机技术、自动控制技术等。到1967年，《纲要》确定的目标基本完成，实现了某些重要的和急需的部门“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我国建设中许多复杂的科学和技术问题能够逐步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加以解决”，以“更好更快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

1956年2月起，毛泽东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集中听取了全国34个部门的工作汇报。他边听边思考，边思考边归纳，最后形成了《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在这个讲话中，他提出，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必须统筹解决的重要矛盾之一。

在讲话中，毛泽东开宗明义地提出：

“提出这十个问题，都是围绕着一个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过去为了结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为了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我们就实行了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方针。现在为了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社会主义国家，同样也实行这个方针。”

可见，“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是基本前提，是总的目标。由这个大局出发来看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无疑应当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服从并服务于这个中心。但是，两者又不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相辅相成、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毛泽东提出，经济建设是国防建设的物质基础，没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不可能建设强大的国防力量。国防建设又是经济建设的重要保障，没有巩固的国防，经济建设不可能正常进行。因而，要服从经济建设大局，节省军费开支，腾出财力人力支援国家建设。同时，在国力可能的条件下，加速国防现代化。处理好两者关系，就可以做到共同发展、相互促进。“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那么，怎么理解这里的“适当”二字？怎样正确把握国防建设在经济建设中的比重？毛泽东认为，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严格控制”。

早在1953年，毛泽东就提出，国防工业要成为“一五”建设的重点，但军政两项经费不得超过全部国家预算的30%，要把钱省下来用于国家经济建设。国防工业打下一定基础后，他又进一步提出，30%的比例太大，“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十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

也就是说，只要有了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就好办了。

在1956年4月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曾经反问过与会的同志这样一个问题：

“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

毛泽东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作了肯定的回答：

“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这是战略方针的问题，希望军委讨论一下。”

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从此成为贯穿于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战略方针，并得到新的概括和发展。

1958年6月21日，毛泽东在主持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时，明确提出：

“我还是希望搞一点海军，空军搞得强一点。”

“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

他号召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为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和强大的军而奋斗。为了鼓励大家“为这个目标而奋斗”，毛泽东给大家讲了这样一个道理：

“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够有更大的进步”

“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你就没有钢嘛。一无粮，二无钢，三无机器。”

道理很明显，只有国家强大了，军队和军事力量才能真正强大起来。

1964年5月，毛泽东在听取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汇报时强调：两个拳头——农业、国防工业，一个屁股——基础工业，要摆好。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坐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这个形象的比喻，同样说明了经济建设，尤其是重工业在国民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也有人提出，既然经济建设极端重要，就可以暂缓甚至停止国防建设，以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毛泽东认为这不对。国防不可不有。“把兵统统裁掉”不好，“因为还有敌人，我们还受敌人欺负和包围嘛！”如果超越国力可能，对国防工业投入过多，会影响基础工业及其他民用工业的建设，最终必然制约国防工业的发展。但必要的国防建设不仅必要，而且可能。比如，有不少军事工业，在平时就是机器制造业，增加军事工业的基本建设，就是增加机器制造业的力量。国防现代化可以推动国民经济不断发展，是加快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积极因素。

这些认识，也是基于我们党和军队实行“精兵简政”以来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后，为了服务经济建设大局，党中央和毛泽东多次作出裁军决定。1956年以前，共裁军三次，人民军队总数由550万压缩到320万，减少了40%；1956年，党的八大再次决定裁军四分之一，全军总人数降为240万。这些数字的减缩，代表着人民军队为国家经济建设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代表着人民军队在质量、装备上阔步前进的步伐。

遵循毛泽东有关“国大，军就会大。国不大，军就不能大”的思路，我们不仅解决了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一对矛盾，而且逐步把握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一些重要原则。因为，在整个社会主义阶段，无论经济发展到什么水平，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矛盾都始终存在。从此，国防建设要以经济建设为基础，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成为我国处理此类矛盾的核心原则。

当然，国防建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基础，绝不意味着我们要等到经济基础改善一些，工业现代化有了必要前提，航空工业所必需的条件基本具备以后，再来搞核武器。

毛泽东不赞成消极等待、无所作为的观点。先抓原子弹，发展国防尖端科技，迅速摆脱受制于人的困境，成为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共识。

由于毛泽东狠抓不放，加之全国军民的艰苦奋斗，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我国已初步建成比较完整的国防工业体系。1964年10月16日，罗布泊上空爆炸成功的巨大火球和蘑菇云，把中国一举带入原子核时代。紧接着，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这些成果，不仅标志着我国一跃进入世界军事强国行列，而且向全世界宣告：悬在我们头上的那把“核讹诈”之剑，再也没有用武之地了！

探索规律、发现规律，按客观规律办事；同时又认识规律、利用规律，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实现更快更好的发展目标。这就是毛泽东对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协调发展的完整回答。这个回答，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认识，又体现了中国在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事业的鲜明个性。



毛泽东

MAO
ZEDONG



讲军队宗旨和 军民关系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 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25日）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毛泽东：《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毛泽东：《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1957年3月18日）

1936年，红军三大主力结束长征到达陕北时只剩下几万人，很多人看不起这支军队，认为它没有前途。可是，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特别是在战略相持阶段，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抗击了60%的日军和90%的伪军，成为抗日战争的主力军。到抗日战争结束时，人民军队已发展到120余万人。人们不禁要问，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为什么会这么有战斗力？人民军队之所以有力量的奥秘何在？

翻开毛泽东在各个历史时期的论述，这些问题的答案非常明确：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根本区别，就在于它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唯一宗旨，它的力量来自于人民。

★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才能真正实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毛泽东最早回答这个问题，是在井冈山斗争时期。1928年11月，毛泽东在向党中央汇报《井冈山的斗争》时，分析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存在和发展”的原因，第一条就是这里“有很好的群众”。也就是说，有了人民群众，党领导的军队就能够生存；真心实意地为人民，军队就有了战斗力。这个道理，军阀不懂，旧军队官兵不懂。但是，那些被红军俘虏了的雇佣军到了红军队伍里后，一下子就明白了。毛泽东向中央报告了这个道理：

“红军士兵大部分是由雇佣军队来的，但一到红军即变了性质。首先是红军废除了雇佣制，使士兵感觉不是为他人打仗，而是为自己为人民打仗。”

从人民军队创建那一天起，视人民为父母兄妹，做人民的子弟兵，“为人民打仗”就是这支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开端。



★ 毛泽东的亲笔题词。

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毛泽东对这个问题回答得更加明确和深刻。

1945年4月24日，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站在党、军队和国家视野上进一步给出了答案。他说：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 and 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毛泽东清晰地告诉人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人民军队的唯一宗旨。这一根本宗旨和立场，是人民军队真正有力量的深厚源泉和不竭动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个根本的和唯一的宗旨，决定了人民军队具有一切旧军队所没有的本质属性、精神力量和独特优势。从这个基本点出发，就有了这样一些结论：只有人民军队才能真正实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真正实现内部团结和外部团结；只有人民军队才具有一往无前的奋斗精神，具有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只有人民军队才能够真正与群众打成一片，实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等等。

就在阐述这个答案之前，毛泽东用一次实际行动，诠释了人民军队的宗旨。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出席了一个普通士兵的追悼会。这个普通士兵就是张思德，中共中央警备团的一名普通战士。1944年9月5日，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听说后，亲自出席中央警备团举行的追悼张思德的会。一个最高统帅为什么要参加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正如毛泽东自己在讲演中所说：“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这个共同目标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讲演中，毛泽东还特别强调：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

在这里，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的重要性，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个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来。”

在“为人民服务”和“为人民利益而死”这个根本目标之下，革命队伍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工作分工不同。从这个角度说，毛泽东出席张思德的追悼会就不难理解了。毛泽东在这个追悼会上的讲演，就是后来被称为著名的“老三篇”之一的《为人民服务》，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三卷。毛泽东在讲演中提出：“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不管是炊事员，是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的，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既体现了为人民服务者的崇高荣誉，也很好地体现了官兵一致的原则。

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在内部关系上奉行的是“官兵一致”的原则。而



★ 1944年9月5日，中共中央警卫团战士张思德在陕北安塞县山中烧炭时，因炭窑崩塌而牺牲。毛泽东在追悼会上以为人民服务为主题发表讲话，表示悼念。图为正在和战友烧炭的张思德（左）。

在旧军队，长官和士兵之间是不平等的、等级森严，长官对士兵随意辱骂甚至施以肉刑。这表面上是一个工作方法上的不同，其实是人民军队与一切旧军队的本质区别。一切旧军队的剥削阶级属性和雇佣性质，决定了它在内部不可能真正实现官兵一致，也不可能真正实现内部团结。而我们的人民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这一根本宗旨，决定了人

民军队能够在内部实行官兵一致。在人民军队内部，不管是军长师长，还是普通士兵，都是为人民服务的，都是革命队伍中的平等一员，都应该互相帮助、互相关心、互相爱护；特别是上级要与下级同甘共苦。有了这样的思想基础，人民军队内部才能真正实现官兵一致和内部团结。

不光是在内部关系上，在处理外部关系方面，由于人民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因而能够很好地处理军政关系、军民关系等，真正实现军政一致、军民一致，军政团结、军民团结。

这些关系，其实早在井冈山时期就已经初步确立了。早在1927年9月底，毛泽东率领工农革命军进驻永新县三湾村时，当地一些群众一开始由于不了解工农革命军，大都躲进山里。毛泽东要求各单位立即分头上山喊话，向群众做宣传，群众陆续回村。在红军长征期间也多次出现过这样的情况：红军每到一地，一开始时，人民群众对我们的部队不是很了解，认为

跟旧军队一样，见了就躲；但后来慢慢从实际行动中逐渐认识到我们是为穷苦大众服务的，于是开始将红军和后来的八路军、新四军视为自己的队伍，形成了军民一家亲的生动局面。

可以说，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决定了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根本性质上有别于国民党军队等一切旧军队，而成为一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新型人民军队。

★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才能真正 具有优良品格和作风

我们的人民军队具有很多优秀的精神品格，比如说顽强的意志，比如说一往无前的精神、艰苦奋斗的精神，比如说遵守纪律、自我批评等优良品格，等等。这些精神和品格的具备，从根本上说是由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只有这样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新型人民军队才会具备这样的品质。

解放战争期间，参加辽沈战役的人民解放军在长途跋涉、又饥又渴的情况下，在锦州不但不吃老百姓家里的苹果，经过结满苹果的园林时，还静静地绕过果园，连一个“落地果”也不拾。毛泽东听到这个故事后，很感动。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多次提到这个故事。他说：“我们的纪律就建筑在这个自觉性上边。”确实，旧军队也都有一定的纪律，但是一切旧军队的纪律对士兵来说都是一种外在强制，而只有我们人民军队的纪律能够为广大官兵所自觉遵守。为什么？就



★ 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致开幕词并作《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

是因为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这样的觉悟，这样的宗旨，使得我们能够自觉遵守纪律。因此，人民军队每到一处，能够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这是一切旧军队所不具备的。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时，宁可露宿街头，也坚持不入民宅，绝不扰民；在随后的接管工作中，大公无私、有条不紊，把从敌人手里夺回来的人民财产，原封不动地还给人民。人民军队的纪律严明，与几年前抗日战争胜利时国民党接管上海时的情形迥然不同。国民党的接管不是“接管”而是“劫管”，许多人民的财产进了接管人员的私人腰包。正如歌谣里所唱：“望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遭了殃！”而这次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与国民党完全不同。留在上海的资本家荣毅仁一开始对共产党和人民军队完全不了解，甚至存有疑虑和畏惧。人民解放军进驻上海时的情形深深打动了他。他后来回忆说：“这是我第一次接触解放军，对照国民党军队真是完全不一样。”对此留下深刻印象的，当然不止荣毅仁一个人。广大人民从解放军的纪律严明中看出，人民军队与国民党军队和一切旧军队不同，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军队。

新中国成立后，有人主张，革命胜利了，军队要增加薪水。持这种主张的人举例说，资本家吃饭五个碗，解放军吃饭是盐水加一点酸菜，这不行。很多同志赞成这种意见。但毛泽东就反对。他说：这恰恰是好事。你是五个碗，我们吃酸菜。这个酸菜里面就出政治，就出模范。解放军得人心就是这个酸菜。艰苦奋斗是人民军队的政治本色。

1955年实行军衔制时，毛泽东主动要求自己不评大元帅，周恩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也主动提出不评军衔，其他还有许多高级将领也主动要求低评。但是也有个别将领，觉得自己的军衔评低了，有委屈，闹情绪，甚至还有三天不吃饭的。这反映了部队中部分存在的一种不良情绪，即一部分同志革命意志有些衰退，革命热情有些不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少了。对此，毛泽东多次强调，要保持革命战争年代的革命热情。1957年3月18日，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着重提醒党和军队的同志，要坚持艰苦奋斗，密切联系群众。他说：

“共产党就是要奋斗，就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要半心半意或者三分之二的心三分之二的意为人民服务。”

在毛泽东看来，只有始终保持为人民服务的政治立场和根本宗旨，只有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军队才能真正做到不忘本色，才能始终保持优良传统和作风。

★为人民服务的军队才能真正实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面对国民党的严酷封锁，毛泽东特别提醒我们党和军队的同志们，要“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尽管国民党多次围剿，人民军队之所以能生存发展，毛泽东认为，其关键就在于有人民的支持。正如毛泽东所总结的：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人民群众为什么拥护人民军队？因为这支军队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是真心实意为人民谋福利的。因此，人民支持这样的军队。正是因为有了人民的支持，人民军队才能聚以歼敌、分以隐蔽，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诱敌深入、分割包围，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如果没有人民的支持这一条，人民军队如同鱼儿离开了水，在敌强我弱形势下，根本就不能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壮大。

在抗日战争时期也是如此。敌人一次次进行残酷的扫荡，但是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却不断扩大。其中的奥秘何在？奥秘即在于，我们的军队得到了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拥护。在很多敌后抗日根据地，男女老幼都是八路军、新四军的“耳目”，甚至连儿童团都被组织起来为八路军、新四军传递“鸡毛信”等紧急信件，敌人一来，我们很快就能知道。而与之相反，敌人虽然人数众多，但是变成了“瞎子”和“聋子”，连我军在哪里都不知道，更谈不上打了。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根本就不可能坚持下去。而这只有我们这样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唯一宗旨的人民军队，才能做到。



★ 1939年毛泽东在延安和农民交谈。

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后，蒋介石也认识到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重要性。他也提出要搞游击战、建立根据地，还在湖南衡山举办了训练班，邀请叶剑英等中共将领到训练班上讲课。从1939年2月到1940年3月，我党共派出叶剑英等30余名工作人员，帮助国民党举办了3期游击干部训练班，培训抗日游击干部3000多人。但是，共产党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国民党军队却根本学不来。为什么？根本原因是这一战略战术要依赖于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等原则的施行，而这恰恰是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宗旨、性质的重要体现，国民党军队根本无法施行。因此，虽然国民党军队也曾在敌后地区留置数十万兵力，但他们无法承受日军进攻和艰苦环境的煎熬，到1943年，除少量部队继续坚持外，基本上烟消云散。反观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民，除陕甘宁边区外，在广阔的敌占区开辟出18块根据地，创造出敌后战场与正面

战场同时并存、内线外线支撑配合的战略新格局。

观察国共两党军队的发展的不同态势的差别，表面上看是战略战术的差别，实质上是根本宗旨和性质上的差别。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由此带来的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和鱼水深情，实在是人民军队的独特优势，是人民军队能够实行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的根本前提。国民党军队和一切旧军队没有这样的政治前提，因而就不可能实现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今天，战争的硝烟仿佛离我们已经远去，时代发生了很大变化，人民军队建设所面临的形势和任务也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初心，不能忘记当初为什么出发。不管国防和军队建设发展到哪一步，毛泽东为人民军队规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唯一宗旨不能忘，密切联系群众的独特优势不能丢，这是人民军队战胜一切敌人的根本法宝，也是我们这支人民军队生存和发展的根本基石。



“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改造军队的政治工作，使官兵一致，军民一致。”

——毛泽东：《反对日本进攻的方针、办法和前途》（1937年7月23日）

1937年7月全面抗战爆发后，在国共合作的大背景下，毛泽东不断强调改造中国军队的重要性。军队如何改造？毛泽东推荐给全国军队借鉴的一个根本性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后来又加了一个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中，对人民军队政治工作基本原则，正式概括为三条。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是人民军队在革命战争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的，是毛泽东建军思想的重要内容，尤其是“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一个根本特征。

★没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战争的胜利是无从说起的”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难时刻，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共合作抗日，作出取消红军番号，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等重大决策。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公开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日蒋介石为此发表谈话，事实上承认了中



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为了推动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发展，在国共合作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提出自己的抗日主张，宣传党的抗日军事路线和战略方针，宣传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以影响和保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健康地发展，提高中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为此，毛泽东更是作出了积极的努力。毛泽东关于人民军队政治工作三大原则的概括，就是在这一背景下产生的。

1937年9月29日，毛泽东发表《国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务》一文，回顾了中国共产党为达成第二次国共合作所作的努力，总结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经验和教训，提出今后的迫切任务。其中指出：

“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还是老制度，要用这种制度的军队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的。”

★ 图为抗敌剧社绘制的军民公约连环画，挂在村头展出。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不适宜于执行彻底战胜日寇的任务，不适宜于顺利地执行三民主义和革命纲领，必须加以改变，这在三个月来的抗战教训中已经证明了”。

改变的原则就是实行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现在国民党军队的制度是基本上违反这两个原则的。模范的先例，就是在北伐战争时代的国民革命军，那是大体上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军队，恢复那时的精神是完全必要的。

毛泽东强调说：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在今天，对于整个抗日战争，还只能起先锋队的作用，还不能在全国范围内起决定的作用，但是它的一些政治上、军事上、组织上的优点是足供全国友军采择的。这个军队也不是一开始就像现在的情形，它也经过许多的改造工作，主要地是肃清了军队内部的封建主义，实行了官兵一致和军民一致的原则。”

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朗谈话又对全国抗战以来政治、军事方面的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分析了几个月来抗战暴露的弱点和“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的主要原因。据他观察：

“首先表现在政治方面。这次参战的地域虽然是全国性的，参战的成分却不是全国性的。广大的人民群众依然如过去一样被政府限制着不许起来参战，因此现在的战争还不是群众性的战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

最根本的一条，他认为是：

“至于政府和人民之间，军队和人民之间，军官和士兵之间，关系依然十分恶劣，这里有的是隔离而不是团结。这是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战争的胜利是无从说起的。”

言下之意，没有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就不会有抗战的胜利。他特别指出：

“八路军更有一种极其重要和极其显著的东西，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军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有三个，即：

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则，这就是在军队中肃清封建主义，废除打骂制度，建立自觉纪律，实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军是团结一致的。

第二，军民一致的原则，这就是秋毫无犯的民众纪律，宣传、组织和武装民众，减轻民众的经济负担，打击危害军民的汉奸卖国贼，因此军民团结一致，到处得到人民的欢迎。

第三，瓦解敌军和宽待俘虏的原则。我们的胜利不但是依靠我军的作战，而且依靠敌军的瓦解。”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基本原则。

6天后，即1937年11月1日，毛泽东在延安陕北公学开学典礼上强调：

“全国一定要学习八路军的樣子，真正地做到军民一致，官兵一致，用改造军队精神、加强军队中的政治工作去达到目的，只有这样，才能挽回目前严重的局势。”

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重申了我军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军民一致、官兵一致，指出国民党军队因为违背这两条原则，从而导致战争初期的失败。毛泽东强调军民一致、官兵一致，并号召全国军队都这样做，目的是为了夺取全国抗战的胜利。

如何才能有效实行军队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则？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进一步作了这样的阐述：

“很多人对于官兵关系、军民关系弄不好，以为是方法不对，我总告诉他们是根本态度（或根本宗旨）问题，这态度就是尊重士兵和尊

重人民。从这态度出发，于是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离了这态度，政策、方法、方式也一定是错的，官兵之间、军民之间的关系便决然弄不好。”

毛泽东认为，要想真正改变官兵关系和军民关系，就要有个根本的态度，“从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经放下武器的敌军俘虏的人格这种根本态度出发”。一旦有了这种态度，有了这种出发点，就会有各种的政策、方法、方式。军队的根本态度就是其根本宗旨。毛泽东非常清楚，这样的根本态度和根本宗旨，是国民党军队学不来的，只有共产党的军队才真正具备。

★官兵一致：军队战斗力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

官兵一致的原则，就是我军所有官兵在政治上一律平等，人格上互相尊重，生活上互相关心。毛泽东在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的各个时期，都特别强调官兵一致性的重要性。

在我军创建初期，毛泽东针对旧军队中官长压迫士兵，官兵严重对立以及当时我军内部存在的旧的军阀主义作风，提出了“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内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的武器”。他明确规定军队内部严格实行“官长不打士兵，官兵待遇平等，士兵有开会说话的自由，废除烦琐的礼节，经济公开”等制度，从而奠定了我军新型官兵关系的基础。实践证明，坚持官兵一致的原则，就能形成官兵平等、上下一致、同甘共苦、互相友爱的新型内部关系，就能有效地增强军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在毛泽东的倡导下，人民军队各级干部都形成了尊重人、关心人、爱护人的传统，以人为本的理念植根于人民军队建设的始终。这是我军一直有强大战斗力的重要原因，也是做到官兵一致的重要前提。

1936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强调，我军官兵在政治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人民利益而战斗。他说：

“红军虽小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人员是从土地革命中产生，为着自己的利益而战斗的，而且指挥员和战斗员之间在政治上是一致的。”

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中央警备团追悼张思德的会上说：

“我们的干部要关心每一个战士，一切革命队伍的人都要互相关心，互相爱护，互相帮助。”

在抗战进入战略反攻前夕的关键时刻，毛泽东更加强调整官兵一致的重要性，并把它提到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这折射出一个伟大战略家的历史眼光。

1944年12月15日，毛泽东在《一九四五年的任

★朱德（托球者）与抗大学员一起打排球。



务》中指出：

“军队内部的团结，非常之重要。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历来依靠官兵一致，获得了光荣的胜利。”

“一九四五年，应该进行广大的工作，将军队官兵关系中的一切不良现象，例如打人，骂人，不关心士兵的给养、疾病及其他困难，对于士兵的错误缺点不耐心教育说服、轻易处罚，以及侮辱或枪毙逃兵等等恶劣习惯及错误方针，从根本上去掉。许多部队，现在还未重视这一工作，由于不明白这一工作是军队战斗力的极其重要的政治基础。”

“整训开始时，还应着重政治方面，着重于改善官兵关系，增强内部团结，发动干部与战士群众的高度积极性，军事整训才易于实施与更有效果。这一工作的实行，应在每一部队内部举行拥干爱兵运动，号召干部爱护士兵，同时号召士兵拥护干部，彼此的缺点错误，公开讲明，迅速纠正，这样就能达到很好地团结内部之目的。”

抗战胜利后不久，毛泽东反复强调官长一定要对战士好，要像朋友、同志、兄弟一样地对待战士。

1945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抗大七分校讲话时说：

“官长一定要注意自己的态度，要像朋友、同志、兄弟一样地对待战士们。”

“不要学国民党军队官长对弟兄们不好。因为我们都是站在一条线上为人民服务，都准备牺牲性命为全国人民谋利益，为什么要对战士不好呢？一定要好。”

毛泽东是这样倡导和这样的做的，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其他领导人也是这样倡导和这样做的。对这一根本问题，他们有着高度的共识。

1948年3月23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干部会上作报告。在

谈到官兵一致时，邓小平说：

“因为我们的军队是建筑在阶级本质上的，所有的人都是为着一个政治任务，都是自觉地去革命的，利害都是一致的，所以在人格上、政治地位上都是平等的。尽管工作上有上下级的区别，但另一方面又都是同志关系，同样的光荣。所以反对把我们的战士降低到一个单纯的人，降低到军阀部队的一个兵的地位，单纯地使用他，当成驱使的对象。我们确实有些同志不去关心战士，打呀，骂呀，侮辱他们。这样便模糊了战士对自己是人民军队主人翁的观念，模糊了自己对人民军队也要负责的观念，战士便不会发挥高度的积极性，高度的政治责任心和提高觉悟性。有些人认为干部只要有本事就可能解决问题，就可管军队，这是不对的，事实上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要做好官兵一致，首先要人人思想上认清以上几点，特别是干部，不但自己要执行，同时还要启发战士去发挥积极性，大胆对军队负责，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来当军队的主人。只要战士真正明白了这一点，并认真执行起来，就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要做好官兵一致，必须走群众路线，也就是要实行三大民主，即政治民主、军事民主、经济民主。”

邓小平特别强调，在这三大民主中，“政治民主，就是政治上官兵一律平等”。

邓小平告诉大家，这三大民主，就是毛主席为我们部队规定的。他说：

“三大民主必须执行，全军都要做，毛主席已经规定了，思想上要打通，组织上要做。”

在抓官兵一致和军队民主的过程中，毛泽东特别注意基层民主。他指出：“军队的基础在士兵”。正如徐向前元帅所说：“每个干部必须懂得，有了士兵才

要干部，不是有了干部才要士兵。”正是靠着官兵一致这个原则，我军战斗力奠定了重要的政治基础，在中国革命斗争历史进程中，我军不断成长壮大，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样多次强调官兵一致的重要性。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回顾长征时官兵一致的情景，他深情地说道：

“我们长征路上过草地，根本没有房子，就那么睡，朱总司令走了四十天草地，也是那么睡，都过来了。我们的部队，没有粮食，就吃树皮、树叶。同人民有福共享，有祸同当，这是我们过去干过的，为什么现在不能干呢？只要我们这样干了，就不会脱离群众。”

朱德是红军的总司令，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在人民军队中德高望重。毛泽东在会议上借朱德的故事，实际上再次向全党全军强调官兵一致的极端重要性，强调干部要发挥模范作用。

1957年3月20日，毛泽东在南京党员干部会议上说：

“在战时，要密切联系群众，要官兵打成一片，军民打成一片。”

“现在实行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但是，上级跟下级还是要打成一片，干部跟士兵还是要打成一片，还是要准许下级批评上级，士兵批评干部。”

“军队里头的这种民主，我们曾经搞过，结果是有益的。不要因为有了军衔制度和其他一些制度，而使上下级、官兵、军民、军队同地方的密切关系受到损害。毫无疑问，上下级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是一种同志的关系。干部跟战士的关系应当密切，应当打成一片。军队跟人民、跟地方党政组织的关系，也应当是密切的。”

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毛泽东、朱德等人规定的官兵一致的原则，仍然被我军遵从。正如1978年5月29日叶剑英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所说的：

“红军的官兵关系很亲密，就像长兄幼弟，军民也很团结，就像鱼水相依。干部的模范作用很好，就连我们的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也和大家一起挑粮背米。那时生活很艰苦，战斗很频繁，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就是靠党的领导，靠政治工作。”

★军民一致：人民军队无敌于天下的奥秘

军民一致的原则，是由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

毛泽东一贯强调，人民是军队的根，是军队的本，军队必须与人民打成一片才不会离开根本。毛泽东认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军队只有与人民打成一片，才能无敌于天下。只要军民团结一致，那就是任何力量都打不破的铜墙铁壁。

在抗战时期，毛泽东尤其强调军民一致性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抗战的彻底胜利。

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

“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1940年1月1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说道：

“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

“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1943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诞生22周年之际，毛泽东起草了《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在宣言中，毛泽东说：

“共产党员应该紧紧地和民众在一起，保卫人民，犹如保卫你们自己的眼睛一样，依靠人民，犹如依靠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认真地实行精兵简政、拥政爱民与拥护军队的政策，彻底地达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军政一致的目的。”

之所以能够做到军民一致，毛泽东认为是由共产党员的特性决定的，他说：

“共产党员是一种特别的人，他们完全不谋私利，而只为民族与人民求福利。他们生根于人民之中，他们是人民的儿子，又是人民的教师，他们每时每刻地总是警戒着不要脱离群众，他们不论遇着何事，总是以群众的利益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因此他们就能获得广大人民群众群众的衷心拥护，这就是他们的事业必然获得胜利的根据。”

对于这一点，邓小平也表述过。1944年12月6日，邓小平在杀敌英雄劳动英雄大会上是这样说的：

“军队的困难就是人民的困难，人民的困难就是军队的困难。军民一体，正是我们能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并发展根据地，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

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政治报告中，全面审视我军成长壮大的历史过程，集中而深刻地论述了我军的根本宗旨。他一语道破了这支军队的特性，这个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

毛泽东的一句话，植根在人民军队的血脉之中：

“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毛泽东所建立的“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的原则，始终被我军所遵循和坚守。这些原则也成为我军克服一切困难和取得胜利的法宝。

解放战争时期的1948年3月23日，邓小平在晋冀鲁豫野战军第一纵队干部会上作报告。在谈到建军原则时，邓小平说过这样的话：

“第一个是军内关系，就是官兵一致；第二是军外关系，就是军民一致。这是每个人必须做到的两条。”

“只要认真执行了以上两条，我们的力量就会大得无比。有了任何困难，依靠官兵一致、军民一致都是会逐渐解决的。”

新中国成立后的1954年1月26日，朱德在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闭幕式上发表讲话。他也说过这样的话：

“应该发扬军民一致、军政一致、上下一致、官兵一致的优良传统，防止和克服任何有害于团结的错误倾向。只有这样，才能把全党全军团结起来，实现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实现我军现代化、正规化的任务。”

这些所表达的，正是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和根本原则，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根基。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八大以后，2013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才作了这样深情的概括和回顾：

“我们党提出军民一致、军政一致、官兵一致的原则，在部队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兴起拥政爱民活动，概括了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
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毛泽东：《论联合政府》（1945年4月24日）

1945年4月23日至6月11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举行。正如毛泽东所言，这次大会是“一个胜利的大会，一个团结的大会”。会议开幕后的第二天，毛泽东向大会提交了《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政治报告，在谈到中国共产党的具体纲领时，旗帜鲜明地认为：

“中国人民要自由，要统一，要联合政府，要彻底地打倒日本侵略者和建设新中国，没有一支站在人民立场上的军队，那是不行的。”

毛泽东将其概括为：

“没有一个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

这是对人民军队性质、宗旨的凝练概括，将人民军队为什么成立，风风雨雨几十年为什么奋斗，一下子就说透了。这支人民军队同中国历史上所有的军

队都不一样。

★成长：人民军队在谋
人民利益和为人民服
务中发展壮大

在我国历史上，军队作为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在封建社会时为皇帝所私有，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时代，军队的最高统帅权牢牢地掌握在皇帝手中。这样的军队只知效忠皇帝，不知在普天之下还有苍生黎民。相反，有些军纪涣散的军队甚至为祸乡里，给普通百姓的生活带来灾难。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我们的历史上也留下了“兵荒马乱”“兵连祸结”“兵燹不断”这样的成语，来形容军队给百姓带来的苦难。

近代以后，由于晚清政府和北洋政府对地方的控制力十分有限，各地方势力坐大，成为一方军阀，军队也成为军阀的私人武装。这些军阀大多想的只是扩张势力、升官发财，对老百姓的生活则不闻不问。比如，1920年至1924年，仅仅4年间，为了争夺对中央政府的控制权，各大军阀之间就先后进行了直皖战争、第一次直奉战争和第二次直奉战争，三次大的军阀混战致使生灵涂炭、民不聊生。北伐之后，国民党虽然在形式上完成了对中国的统一，但是，实质上的军阀割据现象并没有得到改善，反倒有愈演愈烈之



★ 1944年11月，毛泽东在给南下的三五九旅指战员讲话时说：“你们要以最大的毅力去克服各种困难，上下一心，团结一致，要像‘王者之师’那样，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真正做到纪律严明，秋毫无犯。要同群众打成一片，忠实地为人民服务。”

势。1929年和1930年先后爆发的蒋桂战争和中原大战，让无数人民流离失所。

1927年，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诞生了！它从诞生之日起就与众不同。

这支军队由人民的子弟组成，他们在进入军队后不仅接受军事训练，更接受政治训练，彻底摒弃了“当兵吃粮”的旧思想，明白了为什么当兵，为什么人当兵。他们有着严格的纪律，有着“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的光荣传统。这支人民军队初创时期，毛泽东就要求军队对待人民群众要说话和气，买卖公平，不拉夫，不打人，不骂人等，产生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雏形。

人民军队建立以后，在为人民服务中不断成长壮大。毛泽东在张思德的追悼会上曾语重心长地说过：

“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地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

这段话，虽然是毛泽东的即兴演讲，但毛泽东对此却是作过长期的深入思考的。据说，《为人民服务》这篇演讲是这样来的：

1944年，张思德积极参加延安大生产运动，被选为农场副队长。因他懂得烧炭技术，同年7月被组织抽调去陕北安塞石碛峪山里烧木炭。1944年9月5日，张思德等人烧好了一窑炭之后，又参加突击队，帮助别的战友开挖另一孔新窑。中午时分，由于土质松软，加上雨水渗透，即将挖成的窑洞有些变形，张思德自告奋勇下去修理。谁也没有想到，他这一下去就再也没有上来。就在张思德下去不久，支撑炭窑的墙体突然崩塌下来，将张思德压在窑内。

张思德不幸牺牲的噩耗传到中央警备团，内卫班的战友们都悲痛不已。考虑到张思德是毛泽东内卫班的警卫员，警卫队队长古远兴决定把这消息直接报告给毛泽东。古远兴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见日理万机的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几次张口又止，最后才不得不小声地说：“主席，张思德牺牲了。”

毛泽东一听，吃惊地放下笔，详细地问询了张思德牺牲的经过。听完古远兴的汇报，毛泽东的表情凝重，默然良久后才对古远兴说：“张思德是好战士，站岗放哨，还陪我外出过，很熟悉。前线打仗是免不了要死人的，但后方搞生

产出事故死人是不应该的。”

毛泽东走到窗前，朝张思德牺牲的安塞方向望去，问：“张思德现在安放在什么地方？”古远兴答道：“接到电话时还被压在炭窑里，正在组织人往外挖。”毛泽东严肃地对古远兴说：“要尽快挖出来。放哨看好。山里狼多，要是被狼吃了，你这个队长就不要当了。”

随后，毛泽东给古远兴下了三条指示：“第一，给张思德身上洗干净，换上新衣服；第二，买一副好棺材，入殓后运回延安；第三，要给他开个追悼会，我要参加还要讲话。”

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战友们把张思德遗体抬到安塞当地的村子里，毛泽东专门派一辆汽车将遗体拉到了枣园。3天后，即9月8日下午，张思德追悼大会在延安凤凰山脚下的枣园后院河沟广场上举行。

会场的土台中央悬挂着张思德的遗像，旁边挂着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幛。

下午2时许，毛泽东从枣园的住所出来，直接走向会场。走进会场后，毛泽东抬起上面有他题字的花圈，亲手放到张思德遗像前，默哀后缓步登台。当中央警备团政治处主任张廷祜介绍完张思德生平事迹后，毛泽东即兴作了《为人民服务》的著名演讲。毛泽东边讲，边打着手势。当讲到“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时，毛泽东两手往下用力一压；当讲到“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时，他把手掌卷成一个喇叭筒状，放在嘴边一吹……

张思德的死是偶然的，但毛泽东把“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倡导推广到全党全军和各抗日根据地人民中去却是必然的。从此“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传遍了延安，传遍了陕甘宁边区，传遍了全国各解放区。

人民军队在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人民也全心全意地在背后支持这支军队打仗。人民军队和人民群众逐渐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关系。

伴随着这种一关系，人民解放军走过了各个历史时期和战斗岁月，也出现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典范事例。

淮海战役中人民群众积极支援前线便是广为传颂的光辉典范。

陈毅在总结胜利经验时曾感叹：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

来的！事实也正如陈毅元帅所言。

在淮海战役中，为补充主力部队的兵员，解放区人民积极行动起来，掀起轰轰烈烈的参军热潮，涌现出许多父送子、妻送郎、母亲送儿上前方的动人画面。战役开始时，华东野战军有42万人，到战役结束时，兵力不减反增，发展到46万人，不得不说是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不仅如此，在战役中，担负战争勤务的民工共计有543万人，与指战员的比例近9：1！参加服务的不仅有壮年、青年，也有老人和儿童；有农民、工人，也有商人、学生、医生等社会各阶层人士。除了由男子组成的数百万民工在前方为解放军铺路架桥、运送粮草、抢抬伤员外，还有数以千万计的妇女在后方为解放军碾米磨面，缝制军衣、军鞋，许多儿童站岗放哨、传递情报等等。在整个战役期间，人民群众用小车向前线运了300多万吨弹药物资、5.7亿斤粮食。这简直是天文数字。

难怪陈毅元帅赞叹：

几十万，民工走不通。

骏马高车送粮食，

随军旋转逐西东，

前线争立功。

担架队，几夜不曾睡，

稳步轻行问伤病：

同志带花最高贵，

疼痛可减退？

人民军队就是在这样的军民鱼水情中慢慢发展壮大了起来。

★ 考验：在各个时期坚持军队的人民性不动摇

在坚持军队的人民性上，我们这支军队也曾遇到过不小的外部考验。

对于共产党拥有一支强大的人民军队，蒋介石向来十分忌惮，一直以来都想将其彻底消灭而后快。还在两党密切合作的大革命时期，蒋介石就发动了

“中山舰事件”：蒋借口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李为共产党员）未得命令调动中山舰，宣布广州戒严，断绝广州内外交通，扣留中山舰及其他舰只，包围省港罢工委员会，包围广州的苏联顾问住所，并在其后提出《整理党务案》，排挤共产党员。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就更不用多说了，此时蒋介石

已公开叛变革命，他举起手中的屠刀，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人民军队。1928年7月至1929年2月，蒋介石先后任命国民党的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和湖南省主席何键为总指挥，对井冈山进行了三次“会剿”。其后，在1930年底至1934年10月，蒋介石又对中央苏区进行了五次“围剿”，而且每次都比前一次用兵要多、方法要狠。

即使在两党合作抗击民族敌人的抗日战争时期，蒋介石也没有放弃消灭人民军队的念头，先后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尤其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更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在安徽泾县茂林地区突然袭击奉命北移的新四军军部及其所属部队9000余人。新四军部队奋战七昼夜，除2000多人突围到皖北、苏北外，大部牺牲或被俘。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谈判时被扣，副军长项英在突围时被叛徒杀害。只是由于共产党对国民党顽固派在政治上进行了猛烈反击，再加上国际上的普遍反对，蒋介石才不得不在国民参

★ 1945年8月28日，为争取国内和平，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在赫尔利、张治中陪同下离开延安赴重庆谈判。

政会二届一次会议上宣布：“以后亦决无‘剿共’之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皖南事变也使更多共产党人对国民党的面目有了更加清醒的认识。

在抗战胜利之后，由于国际因素影响，人民向往和平，共产党的力量也今非昔比，对蒋介石而言，军事消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办法看来是行不通了。这时，他又提出“军队国家化”的主张。

所谓“军队国家化”，国民党的说法是：

“一、所有中共部队应交给政府听候整理。

二、即日起所有中共部队对国军及地方团队停止敌对行为，就地听候命令。”

这乍一看好像也没什么，其实背后隐藏着蒋介石的如意算盘，因为他还提出了三条更基本的原则：

“一、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即其所谓召开党派会议讨论国是，组织联合政府也。

二、不得分期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

三、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这样一对比，就再明显不过了：一面要求“所有中共部队应交给政府听候整理”，一面又提出“不得以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其实就是在绕着弯子说：共产党的军队要交给国民党来处理。说得好听一点，就是“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

毛泽东早已将这一点看透了，他曾一针见血地道出有没有一支人民军队之间的区别：

“这些人们向共产党人说：你交出军队，我给你自由。根据这个学说，没有军队的党派该有自由了。但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中

国共产党只有很少一点军队，国民党政府的‘清党’政策和屠杀政策一来，自由也光了。现在的中国民主同盟和中国国民党的民主分子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自由。十八年中，在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工人、农民、学生以及一切要求进步的文化界、教育界、产业界，他们一概没有军队，同时也一概没有自由。”

毛泽东继而借用国民党污蔑共产党的话讽刺道：

“难道是由于上述这些民主党派和人民组织了什么军队，实行了什么‘封建割据’，成立了什么‘奸区’，违反了什么‘政令军令’，因此才不给自由的吗？完全不是。恰恰相反，正是因为他们没有这样做。”

在中国共产党六届七中全会上，针对国民党当局以“军队国家化”来达到消灭人民军队的企图，毛泽东一语道破：“军队国家化之类就是他们的口号”。毛泽东还点明了蒋介石所谓“军队国家化”的意图就是要取消一支人民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还就一些人对“共产党军队”存在的误解进行了澄清：

“通常所说的‘共产党军队’，按其实际乃是中国人民在战争中自愿组织起来而仅仅服务于保卫祖国的军队，这是一种新型的军队，与过去中国一切属于个人的旧式军队完全不同。它的民主性质为中国军队之真正国家化提供了可贵的经验，足为中国其他军队改进的参考。”

毛泽东1945年9月27日在重庆回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提问时，一语道破问题的关键：蒋介石国民党领导的国家，根本不存在“国家民主化”这一“共同前提”。也就是说，没有国家的民主化，就不可能有军队的人民属性。

我们党坚持了自己的理想和宗旨，坚守了自己领导下的新型军队的人民性。为了保证人民的利益不受到侵害，为了民族的解放和人民的福祉，共产党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艰苦的斗争。在争取和平的努力失败之后，不得不拿起

武器，进行了三年的解放战争，最终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坚持：人民军队永远不变的宗旨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军队随着我们党从局部执政到全国执政的步伐，走向保卫和建设全中国。这样一支军队，如何保持其本质属性不变，毛泽东等领导人不断在提醒和教育人们注意这个问题。

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特别对取得节节胜利的人民解放军强调：

“本军是中国人民的军队，一切以中国人民的意志为意志。本军的政策，代表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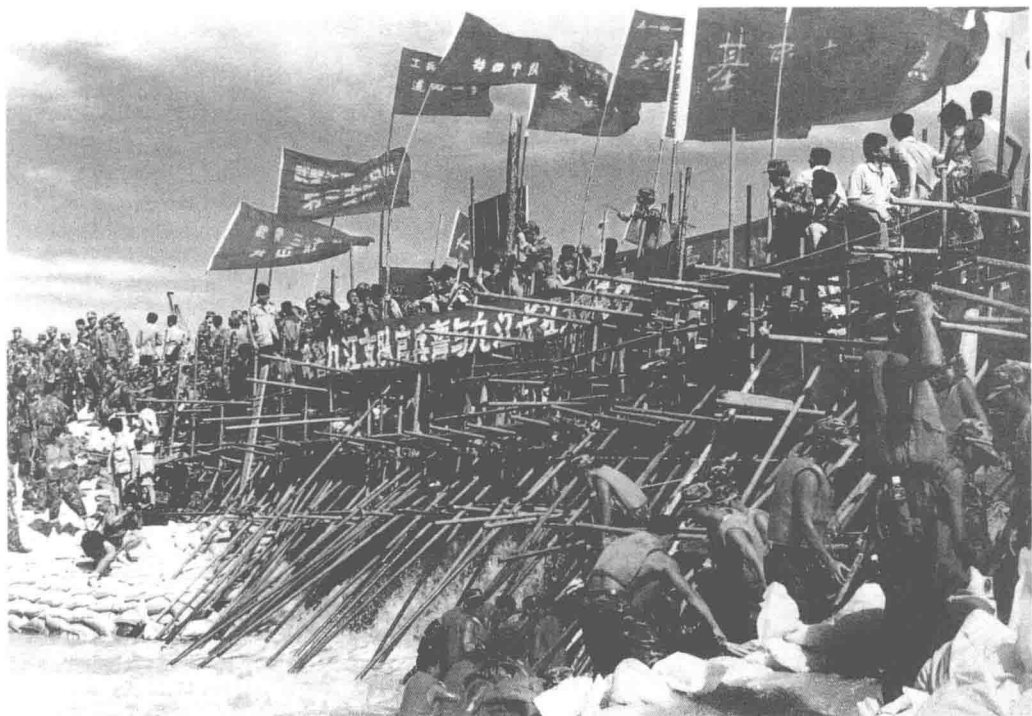
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军队始终牢记毛泽东和党中央的教导，不忘初心。到了20世纪60年代，毛泽东还特别向外宾介绍了我们这支军队与其他军队的本质区别：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有着密切的联系。他说：

“无产阶级革命军队跟资产阶级军队不同，它是人民的军队。”

对这一点，直到1989年“北京风波”以后，邓小平还特别作了肯定，他说：

“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始终不渝地坚持自己的性质。这个性质是，党的军队，人民的军队，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这与世界各国的军队不同。就是与别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军队也不同，因为他们的军队与我们的军队经历不同。我们的军队始终要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忠于社会主义。我确信，我们的军队能够做到这一点，几十年的考验证明军队能够履行自己的责任。”

邓小平的话，也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人民军队作的一个语重心长的叮嘱。在新的时期，虽然环境变了，任务变了，但人民军队的性质始终没有变。



无论是抗洪的最前线，还是抗震的重灾区，只要有人民需要的地方，就有人民子弟兵的身影。只要是人民利益所在，人民军队就会奋不顾身地前往。这样的故事我们时时刻刻都能见到。

让我们先来看看“抗洪英雄”高建成的故事。

1998年夏，长江流域遭受历史罕见的洪涝灾害，人民的生命财产面临严重威胁。7月27日，空军某高炮团奉命奔赴湖北咸宁地区执行长江干堤抢险护堤任务。出发之前，高建成在写给老母亲的信中说：“妈，我马上就要带兵执行抗洪抢险任务了，现在家里置了新房，等我抗洪胜利回部队后，便利用休假的机会接您老人家来往，让您老人家和我们生活，享受晚年幸福。”他率领战士们按时奔赴指定位置，立即投入嘉鱼县邱家湾抗洪抢险战斗。8月1日晚，他率部转战簰洲湾参加抢险战斗。急行军中，长江大

★ 1998年，长江流域发生特大洪水，解放军战士在抗洪前线。

堤突然决口，连队突遭洪水袭击，四五米高的巨浪扑面而来。在紧急关头，他不顾个人安危，迅速组织抢救遇险群众。先后救出8人后，自己却被一个巨浪卷走，壮烈牺牲。

8月，中央军委发布了授予他“抗洪英雄”荣誉称号的命令。命令中有这样一段话：他在国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关键时刻，舍生忘死保护群众和战友，用生命谱写了一曲抗洪抢险的壮丽凯歌。这是新时期人民军队为人民的缩影。

让我们再来看看抗震救灾中一个普通连队指导员的故事。

2008年5月12日晚11时，空降兵某部一连指导员曹加楼正在连云港老家与女友花卉一起，憧憬着即将举行的婚礼。突然，手机铃声打破了这难得的宁静。接通电话，曹加楼脸上柔和的表情渐渐变得严峻：“是，是！马上归队！”

“是不是又要推迟婚礼了？”看着他欲言又止的模样，花卉强作笑脸。曹加楼轻声歉疚地解释：“小卉，四川地震灾情严重。我明天一早必须返回部队。婚礼再推迟一次吧。”这个豁达的汉子，此刻不知道怎么措辞——要知道，这已经是4个月内他们第二次推迟婚礼。元月初，由于部队接到命令要参加一次重要演习，正休假在家中筹备婚礼的他，也是被这样一个电话召回。

翌日凌晨，曹加楼搭上了第一列返回部队的火车。刚刚坐定，手机上连续接到3条短信。

父亲：“加楼，爸妈都舍不得你走，但部队要你去就去。去了多救人，好好保重自己。”

岳父：“加楼，我和你的父母同花卉商量过了，婚礼照常举行。你放心去灾区，这里的事情不用操心。”

妻子：“虽然我舍不得你走，但是我支持你。虽然今天你不在我身边，但是我一样的幸福。保重自己。”

于是，婚礼如期地举行了，只是婚礼上只有新娘。那个本该挽着新娘的幸福新郎，此时正在千里之外，争分夺秒地抢救着受灾群众。

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

这支人民军队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有着光荣的基因在血管里流淌，正如毛泽东所说：

“这个军队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所有参加这个军队的人，都具有自觉的纪律；他们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

毛泽东还有一段话，也清晰地阐明了人民军队的这一宗旨：

“我们的军队是真正的人民军队，我们的每一个指战员以至每个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我们的部队要和人民打成一片，我们的干部要和战士打成一片。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



毛泽东

MAO
ZEDONG



讲取胜之道

“兵民是胜利之本”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兵民是胜利之本”



“兵民是胜利之本。”

“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造成了弥补武器等等缺陷的补救条件，造成了克服一切战争困难的前提。”

——毛泽东：《论持久战》（1938年5月）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的炮火揭开了中国全面抗战的序幕。1938年是一个重要的年份。到今年7月，就是中国人民全面抗战1周年，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7周年。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为全国人民指明抗战的前景，是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的历史责任。进入1938年，毛泽东一直在思考这件决定中华民族命运的大事：怎样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

★一场跨越历史长空的讲演，提出“兵民是胜利之本”

在毛泽东看来，抗战的前途是光明的，但道路是曲折的。在这个关键时刻，有必要向全党和全国人民阐明抗战的前途和道路。1938年5月26日至6月3日，毛泽东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作了《论持久战》的讲演。

毛泽东在讲演一开始，就直截了当地批驳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抗战十个月以来，一切经验都证明下述两种观点的不对：一种是中国必亡论，一种是中国速胜论。前者产生妥协倾向，后者产生轻敌倾向。他们看问题的方法都是主观的和片面的”。

毛泽东认为，中国必须、也能够经过持久抗战取得胜利，持久战必须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强调持久战的基础是广大民众。

要想取得胜利，就必须找到关键环节，毛泽东明确指出：

“争取抗战胜利的中心关键，在使已经发动的抗战发展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只有这种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才能使抗战得到最后的胜利。”

“四亿五千万的中国人占了全人类的四分之一，如果能够一齐努力，打倒了日本帝国主义，创造了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对于争取全世界永久和平的贡献，无疑地是非常伟大的。”

毛泽东点明了全民族的团结和民众的力量。

《论持久战》犹如一轮朝阳，拨开了人们心头上的迷雾，指明了战争的前途，大大坚定了全国人民夺取抗战胜利的信心。全国抗战形势的后来发展完全证实了毛泽东的英明论断。

其实这个观点，毛泽东早在1936年与斯诺谈话时就提出来过。当时他说：

“所以问题的中心点还是中国全体人民团结起来，建立举国一致的抗日阵线。这是我们早就提出的了。”

在《论持久战》讲演中，毛泽东继续重申了这一观点，并进一步作了深入分析。他说：

“中国农民有很大的潜伏力，只要组织和指挥得当，能使日本军队一天忙碌二十四小时，使之疲于奔命。必须记住这个战争是在中国打的，这就是说，日军要完全被敌对的中国人所包围”。

在讲演中，毛泽东明确提出了“兵民是胜利之本”这一著名论断。他认为，这是为什么中国一定能最终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总依据。“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思想论断，是毛泽东人民战争思想的重要内容。把人民群众看成和军队一样，都是战争的主体，这是毛泽东的独创。

《论持久战》这篇讲演，很快以著作形式传遍全国，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而且对国民党将领也产生不小的影响。程思远在《我的回忆》中曾经这样说道：

“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的战略指导思想。”

《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海外发行。毛泽东很重视这件事，为英文本写了序言。他说：

“中国的抗战是世界性的抗战。孤立战争的观点历史已指明其不正确了。”

“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

一篇《论持久战》，从讲演到传播，都体现了毛泽东的战略思维，也展现了毛泽东的世界眼光。

★打败日本侵略者，必须实行全国军民总动员

日本发动的全面侵华战争，使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的严重危险。在这生死存亡关头，只有全民族团结抗战才是中国生存和发展的唯一出路。反对并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成为中华民族的最高利益。

中国共产党提出全面抗战路线。全国抗战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号召全国

人民总动员，主张开放民主，改善民生，广泛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实行全体人民参加战争、支援战争的全面抗战路线，成为引领全民族抗战的指南。

中国共产党主导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1937年7月7日全面抗战爆发。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发出通电，再次呼吁：“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次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在中国共产党的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和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抗日武装开赴抗日战场，一方面同国民党军队并肩作战，始终注意与国民党军队进行战略的、战役的乃至战斗的协同与配合；另一方面，坚持独立自主的抗日游击战争，向敌后挺进，放手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开辟敌后战场。于是，抗日战争形成两个战场，即国民党军队抗击日寇的正面战场和共产党领导的敌后解放区战场。

毛泽东十分重视抗日战争中的政治动员工作。动员什么？核心还是“动员全中国人民”。他说：

“抗日战争是要赶走帝国主义，变旧中国为新中国，必须动员全中国人民，统统发扬其抗日的自觉的能动性，才能达到目的。”

“这个政治上动员军民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我们之所以不惜反反复复地说到这一点，实在是没有这一点就没有胜利。”

毛泽东阐述了动员全体兵民的根本要领。他说：

胜利之本
兵民是

★ 毛泽东题写的“兵民是胜利之本”。

“什么是政治动员呢？首先是把战争的政治目的告诉军队和人民。必须使每个士兵每个人民都明白为什么要打仗，打仗和他们有什么关系。抗日战争的政治目的是‘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建立自由平等的新中国’，必须把这个目的告诉一切军民人等，方能造成抗日的热潮，使几千万人齐心协力，贡献一切给战争。其次，单单说明目的还不够，还要说明达到此目的的步骤和政策，就是说，要有一个政治纲领。”

“没有一个明确的具体的政治纲领，是不能动员全军全民抗日到底的。”怎样去动员？毛泽东说道：

“靠口说，靠传单布告，靠报纸书册，靠戏剧电影，靠学校，靠民众团体，靠干部人员。”

“其次，不是一次动员就够了，抗日战争的政治动员是经常的。不是将政治纲领背诵给老百姓听，这样的背诵是没有人听的；要联系战争发展的情况，联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把战争的政治动员，变成经常的运动。这是一件绝大的事，战争首先要靠它取得胜利。”

实践证明，毛泽东抗战时期政治动员思想是十分正确的，把握了抗日战争发展进程中的基本规律，有力推动了抗日战争向着有利于中国人民的方向发展，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彻底胜利。

在全国抗战的战略防御阶段，国共两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在合作抗日的旗帜下，协同作战，对日军进行了比较有效的抗击，使日军实力受到比较大的消耗。

1937年9月下旬，一一五师在平型关利用有利地形，歼灭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缴获一批辎重和武器。平型关战斗，是华北战场上中国军队主动寻歼敌人的第一个大胜仗，有力地配合了正面战场的防御作战。它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振奋了全国人心，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八路军的威望。

1938年3月下旬至4月上旬，中国军队运用阵地战同运动战相结合的战法，在台儿庄地区对孤军深入的日军第十师团濰谷支队和前来增援的第五师团坂本

支队，进行英勇顽强的阻击和外线迂回包围。经过数日激战，最终打败进攻之敌，歼灭日军1万余人。台儿庄大捷，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取得的最重大的胜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以及山东、河北人民抗日游击队和工人武装，进行破袭战，炸毁桥梁，拆除路轨，阻滞日军的运输，有力地支援了台儿庄作战。

由于接受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团结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对日本侵略者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抵抗政策，先后组织了南口、张家口、淞沪、忻口、太原、南京、武汉等大规模的战役和会战。这些正面战场的抵抗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粉碎了日军企图3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计划，对抗战持久局面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由于国民党政府的积极行动，因此才“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

毛泽东曾就此评论：

“没有正面主力军的英勇抗战，便无从顺利地开展敌人后方的游击战争”。

在1938年9月召开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作了《论新阶段》的报告，他在总结抗战以来的工作时说：

“抗日战争的进行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组成中，国民党居于领导与基干的地位。”

“全国各个抗日党派都有进步，国民党的进步也是显著的。”

他还指出：

“统一战线以国共两党为基础，而两党中又以国民党为主干，我们承认这个事实。”

毛泽东的讲话，充分肯定了抗战初期的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全国各界民众组织的抗日自卫武装等，对抵抗日军的侵略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随着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迅速展开，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钳制了日军大量兵力，有力地配合和支持了国民党军队的正面防御作战。

毛泽东说“兵民是胜利之本”，也是对中国全面抗战10个月的实践经验的总结，同时又是指导中国全面抗战取得胜利的重要指南。

蒋介石在抗战中的心态和政略简言之就是“一箭三雕”之计：打败日本侵略者，在抗战中削弱或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革命武装，削弱或消灭各地各派名服中央而实独立、半独立的军阀，最终完成他心目中的建国计划。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国民党方面实行片面的抗战路线，不敢真正发动全国民众实行全民族的抗战。

白崇禧也不得不承认，“过去的作战都只是单纯的军事动员，政治并未动员，只是军队的抗战，民众并未抗战”。

对此，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特兰谈话时说：

“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战争而不带群众性，是决然不能胜利的。”

“因为抗战还只是政府和军队的抗战，不是人民的抗战。几个月来许多土地的丧失，许多军队的失利，主要的原因就在这里。所以，现在的抗战虽然是革命的，但是它的革命性不完全，就是因为还不是群众战。”

正是因为依靠人民、动员人民，在极其艰苦的反“扫荡”、反“清乡”斗争中，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有效的歼敌方法，如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破袭战、水上游击战、武装工作队等，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敌后军民的反“扫荡”斗争，牵制、消灭了大量日军，成为坚持中国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很大支持。看过《地道战》这部电影，大家都知道，动员了全国的老百姓，就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

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忠实代表，在抗战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及其所领导的民众和武装力量，决心

实践所提出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站在抗日的最前线，为保卫祖国流最后一滴血。”这种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呼吁，这是多么鼓舞人心的政治动员！“中华民族是站起来了！”“全中国人手执武器走上了民族自卫战争的战场”。当时，华北平原上的一个庄户人家写下这样一副对联：“万众一心保障国家独立，百折不挠争取民族解放”；横批是：“抗战到底”。这是中华儿女同日本侵略者血战到底的怒吼，这是中华民族抗战必胜的誓言。这副对联既反映了全国老百姓都觉醒了，也说明了我们党动员人民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是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在战略相持阶段，特别是从1941年起，日军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和抗日根据地作为主要进攻对象。1942年，日军在华北、华中有55万余人，其中用于巩固占领区的约有33.2万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担负起抗击日军的主要责任。1940年8月，为了粉碎日军对华北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和“囚笼”政策，八路军对华北日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战役，即“百团大战”。这次战役共作战1824次，毙伤日伪军2.5万余人，俘获1.8万余人，沉重打击了日军。



★ 百团大战第二阶段，八路军战士们在长城古城堡上欢呼胜利。

谈起百团大战，当年亲历这次战役的聂荣臻元帅满怀胜利豪情地说，这是抗日战争期间我八路军在华北敌后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的战役，前后历时3个半月。这次战役，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它严重打击了敌人妄图分割我抗日根据地军民的“囚笼政策”，钳制了敌人大量兵力，拖住了它进攻正面战场的后腿，遏止了当时妥协投降的暗流，全国军民莫不感到欢欣鼓舞。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承担着对日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从1943年起，敌后战场逐步扭转困难局面，在一些地区开展对日伪军攻势作战，1944年开始局部反攻。到1945年春，全国已有19个解放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发展的形势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于1945年8月开始全面反攻。由于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已处在解放区包围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实际承担起对日全面反攻的主要任务。1945年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各解放区立即组织反攻大军，陆续发起猛烈的全面反攻。

事实是最好的证人。当日本宣布投降时，长期在东北战斗的，在华北、华中等地包围各重要城市的，不是别人，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国民党军队主力一直集中在中国的西南和西北地区。

整个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其中日军52.7万人，缴获各种枪支69.4万余支、各种炮1800余门。共产党员发展到120多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0万人；抗日民主根据地面积达到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近1亿。

中国共产党树立了英勇抗战的楷模。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民付出了巨大牺牲。八路军的“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的“刘老庄连”东北抗联的“八女投江”等共产党领导下的英雄群体，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等为代表的众多优秀共产党员，为抗战胜利流尽最后一滴血。

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在抗战中作出了极大的牺牲，指战员伤亡60余万人；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牺牲巨大，伤亡达600余万人。敌后军民以高度的献身精神坚持战斗，为夺取抗战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英雄群体和优秀个人以及广大英勇为国捐躯者永远活在人民的心中，他们的光辉业绩永载史册。

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胜利前夕，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作政治报告，其中

说道：

“三次革命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工业化和农业近代化也是不可能的。”

抗日战争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力量，是全民族利益的最坚定的维护者，是团结抗战的中流砥柱，是取得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同时，也证实了毛泽东的伟大预言：

“这就是真正的人民战争。只有这种人民战争，才能战胜民族敌人。”



★ 淮海战役中支前的民工小车队。当时出动的民工达540余万人。

★ “人民战争是我们的根本优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

从党、军队和人民的关系来看，我们党和军队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党离不开人民，人民也离不开党。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吴起镇时，这个村子的老百姓看到的是一支衣衫褴褛、面容疲惫、抬着许多担架的军队，误把“红”字听成了“奉”，以为是正在围剿红军的东北军，他们过去的名称是“奉军”。奉军一向以军纪败坏而著称，老百姓听到后大都跑到附近的山上躲藏起来，只留下老弱病残，在窑洞里观察这支新来的队伍。他们发现，这支军队不进民房，在场院里埋锅造饭，挑水扫院子。老百姓终于知道，这是从南方来的红军，“和刘志丹的队伍一样”。群众开始从附近的山里回到家，让“南方红军”住进了简陋却温暖的窑洞。虽然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条件也很差，但是面对此刻来自南方的红军，老百姓纷纷把自家的粮食

★ 抗日战争中，敌后军民开展交通破袭战、地雷战、地道战、水上游击战、麻雀战等多种形式的对敌斗争，使敌人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图为根据地民兵埋地雷。



拿出来，帮助他们解决生存问题和吃饭问题。

此刻，陕甘根据地才出现了民歌里唱的那种热烈场面：“千家万户把门开，快

把那亲人迎进来。”

毛泽东曾感慨地说，“不是这块地方，我们下不了地。”

毛泽东曾经预言：如果国民党也学红军的长途转移，那是一定会被消灭的，因为他们没有人民的援助。陈云也将“正确对待群众和得到群众的支持”列为长征取得胜利的三大原因之一。贺龙元帅在总结长征时，也说：“国民党军队靠飞机大炮。我们红军靠什么？靠群众”。

我们党能不能够赢得胜利，归根到底取决于能不能够赢得群众。长征中，我们党紧紧地团结群众、依靠群众，坚持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众志成城，战胜了无数艰难困苦和强大凶恶的敌人，谱写了长征胜利的激越凯歌。

在抗日战争年代，地雷战、地道战、破袭战、麻雀战都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解放战争后期的战略决战中，党在人民群众中进行了巨大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充分调动各方面的力量来支援这场空前规模的大决战。据统计，在三大战役中，动员民工累计达880余万人次，人民群众出动支前的大小车辆141万辆，担架36万余副，牲畜260余万头，粮食4.25亿公斤。华东野战军司令员陈毅曾深情地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如果没有排山倒海的群众的伟大力量，要取得全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

军事胜利从来不是单靠军队来实现的。三大战略决战能获得胜利，一个基本原因是民众的支持，不断以人力物力支援前线。这同国民党军队屡屡弹尽粮绝，陷入绝境，成为他们多次全军覆没的重要原因，恰成鲜明的对照。能不能得到民众的全力支持，确实是战争能不能取得胜利的根本问题。

1961年1月16日，叶剑英在《伟大的战略决战》一文中，几句话说清了我们取得胜利的根本原因：

“在三大战役中，各地组织了广大的人民群众，随军执行战勤任务。辽沈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一万三千八百余副担架，三万六千七百余辆大车，九万六千余民工，随军行动。淮海战役的时候，动员了二百余万民工，支援前线，使我军与民工的比例达到了一兵一民、一兵二民、甚至一兵三民。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和热情鼓舞下，人民解

放军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取得了战略决战的胜利。”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毛泽东同志的人民战争思想的胜利。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真正的力量属于人民。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

毛泽东曾说过：

“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

“应该使每一个同志懂得，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坚决地相信人民群众的创造力是无穷无尽的，因而信任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而只会被我们所压倒。”

他多次提醒全党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要注意，任何时候不要忘记人民群众，忘记了人民群众，“就是读一百万册马克思主义的书也是没有用处的，因为你没有力量。”

毛泽东的这些话语及其表达的思想，早已深深地扎在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人民军队将士们的心里。

1964年10月13日，贺龙谈起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感触颇深地说道：

“在历史上的任何一次革命战争中，革命人民在武器装备方面，开始的时候总是落后于敌人的。但是只要人民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就可以战胜强大的敌人。过去如此，现在如此，将来仍然如此。数以万万计的武装起来的人民群众，是真正的铜墙铁壁，真正的天罗地网。任何敢于侵犯我们的敌人，都将在我‘全民皆兵’的汪洋大海中，遭到灭顶之灾。”

1978年8月4日，聂荣臻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谈起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

想，是这样说的：

“毛主席的人民战争思想，是毛主席军事思想的核心，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不论武器如何发展，都改变不了人民战争的规律，改变不了‘兵民是胜利之本’的根本原理。”

“人民战争是我们的根本优势，是我们克敌制胜的法宝，过去靠它，现在靠它，将来还是靠它。”

直到现在，毛泽东的这一思想仍然闪耀着不变的光芒。2013年7月8日和7月15日，习近平分别两次在有关军队工作的重要会议上，重温了毛泽东关于人民战争的思想，他说道：

“革命战争年代，军队打胜仗，人民是靠山。”

“不论形势如何发展，人民战争这个法宝永远不能丢，但要把握新的时代条件下人民战争的新特点新要求，创新内容和方式方法，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整体威力。”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毛泽东：《杂言诗·八连颂》（1963年8月1日）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出自毛泽东的《杂言诗·八连颂》。《八连颂》传颂的是“南京路上好八连”几十年“为人民”且“拒腐蚀，永不沾”等精神，但诗的意境最后落在“团结力”上。毛泽东用一首杂言诗，揭示了一个伟大的真理。

★毛泽东说的有“团结力”的部队是怎么来的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警备团三营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光荣称号。表彰他们从1949年5月起进驻上海市南京路后，发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身居闹市14年，一尘不染，勤俭节约，克己奉公，热爱人民，助人为乐等事迹和精神。后来创作的话剧和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的上映，使“南京路上好八连”的事迹在全国城乡广泛流传。

驻上海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被命名的这天，毛泽东正在上海。命名的前一天晚上，毛泽东在上海会见印度尼西亚军事友好代表团成员，给他们介绍中

国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经验。毛泽东说：

“主要一条经验是，要同群众结合起来。什么时候跟群众合作得好，我们就得到发展；什么时候脱离群众，我们就犯错误，就失败。”

与群众的团结合作、与人民的血肉联系，这就是毛泽东不断思考和始终关注的人民军队与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

“好八连”就是沿着这条路径走过来的。

“南京路上好八连”原来只是一个极为普通的连队。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8月6日，在山东莱阳城西水头沟小园村，由华东军区特务团把招来的几十个胶东农民子弟兵编在一起，组成了该团的四大队辐重连。这个连边建边打，在战争中学习，在群众中学习，不断壮大。不久，连队改番号为华东军区警卫旅特务团一营一连。一路南下，到1949年6月，这个连进驻上海南京路，担任执勤任务，并被编为三营八连。

在这个连的建设和发展中，始终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放在教育的核心位置，把毛泽东说的“两个务必”和“进京赶考”的告诫放在心上。进驻上海这个大世界以后，他们面临着极为复杂的考验。

可以说，全国解放之初，上海的南京路是最复杂的“考场”。这里是旧上海的一个缩影，素有“十里洋场”之称。这里酒绿灯红，歌柔舞艳，繁华喧闹中弥散着腐朽的诱惑，暗藏着一个个陷阱。八连战士们每天要面对的，不仅有上海社会自身存在的各种繁杂局面，而且有当时国民党溃退时布下的各种“棋局”。不甘心失败的反动残余势力，采取“腐蚀拉拢加破坏暗杀”等各种办法来对付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他们四处扬言：上海是个大染缸，你共产党、解放军“红”的进来，不出3个月，就要变成“黑”的出去。

八连的战士们，都是一些在穷苦中长大、从枪林弹雨中走来的年轻人，十分纯朴。据说，他们初进南京路时，许多人连自来水都不会用，有人守着抽水马桶还到处找厕所，甚至有人按一下电灯开关会被灯泡突然发出的光吓了一跳。复杂的新情况和社会环境，严峻地考验着这些刚刚走进大城市的年轻战士们。时间一长，情况也悄悄发生了一些变化。有这样的记载：

有的战士看到路边行人穿着那么时髦，男的女的手臂挽着进出舞厅、电影院，有点羡慕了；当一些妆扮妖艳、浑身喷着香水的女子向他们抛媚眼、丢手绢时，有的战士也禁不住朝她们瞟上几眼。

连队里也开始出现一些反常现象：有人一次花几块钱，到国际饭店去开“洋荤”；有的不惜花5角钱，到高级理发厅理发；有人不抽老烟叶子了，去买一元多钱一包的雪茄；个别战士花光津贴费还要借钱逛“大世界”。

这些情况，很快反馈到连队领导班子那里。“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连队首任指导员张志成是个头脑十分清醒的干部，他立即召开党支部会议。他在会上指出：南京路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来到这里我们就没有退路了，我们要让全连保持高度的警觉性，绝不能吃败仗。

为此，连队在一段时间里，不断组织全连一遍又一遍地学习领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

“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我们必须预防这种情况。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官兵们对毛泽东提出的“两个务必”的告诫体会越来越深。他们不断加强

自我认识、自我反省，牢记自己的历史使命。在日常生活中，自制针线包，衣服破了，缝缝补补再穿；用破布麻绳打草鞋穿在脚上，行走在南京路上；扛着铁锹，推着粪车，步行到十几里远的郊区开荒种菜；开展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块布等竞赛活动。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八连锤炼出“拒腐蚀，永不沾”的金刚之体，始终保持着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始终保持着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

到了“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30周年的时候，当时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受党中央委托，作过这样的结论：

“南京路上好八连”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凝结着共产主义思想道德和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英雄群体，是毛泽东、邓小平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培育的一个先进典型。这个典型，几十年来对推进军队和社会的精神文明建设起了积极作用。在加快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下，大力弘扬好八连精神，对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增强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更好地肩负起我军保卫祖国、建设祖国的神圣使命，具有重要的意义。

“好八连”的成长和出名的历史，恰恰反映了我们人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印迹，也说明了人民军队与人民血肉相连、军民一家不变本色，点明了人民军队无敌于天下的真正原因。

毛泽东的《八连颂》，歌颂的是一支从人民中走来、忠于人民事业、永不变质的威武强壮之师，也是在告诉人们这样一个伟大真理：“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从历史走来：“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

中国革命胜利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军民团结的历史。在毛泽东的诗词中，就曾有不少讴歌军民团结的名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

“红旗卷起农奴戟”……

这些，展示了毛泽东对关于军队与人民在革命战争中团结奋斗的充分肯定。

军队与人民“众志成城”“同心干”的故事，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俯拾即是。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说到我军胜利的原因时，明确指出：红军打胜仗，人民是靠山。他还讲述了一个长征中感人至深的“半条被子”的故事。

他说：

“一部红军长征史，就是一部反映军民鱼水情深的历史。在湖南汝城县沙洲村，3名女红军借宿徐解秀老人家中，临走时，把自己仅有的一床被子剪下一半给老人留下了。老人说，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生死与共，是中国共产党和红军取得长征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我们战胜一切困难和风险的根本保证。”

这个故事来自在纪念红军长征50周年时徒步采访红军长征路的《经济日报》记者罗开富。

在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说道：

“军队须和民众打成一片，使军队在民众眼睛中看成是自己的军队，这个军队便无敌于天下，个把日本帝国主义是不够打的。”

西安事变爆发前夕，著名东北军将领张学良曾对蒋介石说：“共产党你是剿不完的，消灭不了的。因为共产党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们没有老百姓支持。”

1940年1月16日，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农工展览会开幕典礼上说道：

“八路军也就是老百姓，故军队不要忘本，本就是工农。”

“八路军有两条规矩，一条就是官兵合作，一条就是军民合作，大家亲亲密密团结起来，日本一定打倒的。”

1944年9月18日，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大礼堂举行招待八路军留守兵团全体模范学习代表及从敌后转战



★ 红军利用战斗间隙帮助群众收割庄稼。

归来参加整训的各部队战斗英雄代表的大会。毛泽东在大会上说：

“我们的军队一向就有两条方针：第一对敌人要狠，要压倒它，要消灭它；第二对自己人，对人民、对同志、对官长、对部下要和，要团结。”

陈毅元帅曾深情地说：解放战争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有人曾经记述了解放战争时期苏中战役期间我军与人民群众的关系：

1946年6月23日，李先念开始中原突围的那一天，42岁的李默庵赴无锡接任国民党军第一绥靖区司令官一职。

苏中战役开始了。

海安外围防御战从7月30日打到8月3日。粟裕后来回忆道：“第七纵队从苏中地方武装上升主力不久，补充了大量的解放战士，所属四个团只有一个团打过大仗。但是四天多的战斗，他们只用了3000多兵力，英勇抗击了5万多敌人的轮番猛攻。”

国民党新编第九旅损失9000多人。李默庵很是心疼，更让他恼火的是，尽管自己派出大量便衣侦探四处搜集军情，但根本无法在当地百姓那里得到真实情报，致使自己对粟裕的3万人马在眼皮底下休整一无所知。

国民党新编第七旅副旅长田从云被俘后说：“老百姓躲开倒也罢了，遍地是民兵，分不清哪个是兵，哪个是民，到处打冷枪，到处抓我们的谍报人员，捉得一千二净，去一个捉一个，去两个捉一双。我们都成了睁眼瞎，哪能不打败仗。”

李默庵没有想到或是难以言表的是，国民党军队闯入解放区作战，必然会面临举步维艰的处境。苏中战役中，解放区民众提出了“保田保家”，甚至“毁家纾难”的口号。在3万多人的华中野战军主力部队身后，直接参与战斗的解放区百姓达到14万人，支前民工人数更

是高达50多万。整个苏中战役期间，始终有1万多条转运粮食、弹药、兵员和伤员的民船，跟随华中野战军穿梭于稠密的河网中。解放区百姓在战火中不惧生死，不少人和官兵一起倒在泥泞之中，倒在枪弹炮火之中。

侥幸从战场逃脱的国民党军新编第七旅旅长黄伯光，在给上级的报告中说：“地方民众，不问男女老幼，皆为匪之军民，到处袭杀国军”，“我国军处处受袭，人人被俘，除少数外，无一漏网”。

正是紧紧依靠人民，我们取得了长征的胜利，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得了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了一个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

★现实的召唤：军民团结是“我军的胜利法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发出的“军民团结如一人”“更加众志成城”等号召，让人民军队和人民一起渡过了无数个艰难险阻。20世纪60年代克服经济困难，就是一例。

1959年至1961年，由于自然灾害和“大跃进”等“左”的错误，我国国民经济陷入严重困难的局面。

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一边纠正“左”的错误，一边与人民同甘共苦并带领全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战胜困难。人民军队中也涌现出了雷锋、“南京路上好八连”等先进典型。

雷锋是一个热爱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楷模。“南京路上好八连”是艰苦奋斗、克服困难的模范集体。在他们身上，都体现着伟大的共产主义思想和中华民族坚强不屈的品质。同时，他们又是军队做好群众工作的模范。

1963年3月5日，毛泽东号召“向雷锋同志学习”。于是，一个反映广大军民愿望的学雷锋、树新风活动，从军营普及到全国城乡。在军队中开展学雷锋活动，提高了全军指战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助人为乐，替群众排忧解难，成为干部战士开展群众工作的好形式。

也就是在这一年，在国防部命名“南京路上好八连”几个月之后，我军迎来了创建36周年的日子。

建军节这天，1963年8月1日，毛泽东做了两件事：一件是白天为“好八连”写诗一首，一件是晚上观看解放军沈阳部队排演的话剧《雷锋》。

毛泽东满怀豪情地为一个人英雄群体写诗赞颂，这在他一生中是唯一的一次。全诗如下：

八连颂

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上参天，傲霜雪。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在《八连颂》中，毛泽东强调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就是“为人民”。这就要求人民军队保持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拒腐蚀，永不沾”；要求人民军队发扬革命的大无畏精神，“不怕压，不怕迫。……不怕帝，不怕贼”；要求人民军队“纪律好，如坚壁。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思想好，能分析”；要求人民军队永远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八连颂》是毛泽东留下的唯一一首杂言诗，它行句通俗。相对那些讲究平仄对仗堪称“阳春白雪”的律诗而言，《八连颂》属于“下里巴人”之列。这首诗受到人们的热爱欢迎和广泛传诵，既体现了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同时也体现了《八连颂》所表达的精神追求符合军队和人民的实际。

《八连颂》中，最引人注目和最提振信心的就是“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一名句。

1963年这一年，毛泽东为人民军队中一个模范个人题词，为一个模范集体写诗。历史注定1963年在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不平凡的一年。这一年，毛泽东的心情是愉快的。一方面，我们完成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

方针，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走上健康发展的轨道，全国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另一方面，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方面，也取得了丰硕成果。雷锋、“好八连”这两个典范的出现，立刻引起毛泽东的高度重视。毛泽东认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应该在全社会提倡和发扬他们的这种共产主义精神。



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也十分关注和积极推广“好八连”精神。

就在1963年期间，朱德、邓小平、陈云等党政军领导人也分别为好八连题了词。

5月30日，朱德为南京路上好八连题词：“保持人民军队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学习南京路上好八连。”

6月，邓小平为南京路上好八连题词：“一贯保持光荣传统的、保证走向共产主义的、集体的标兵——南京路上好八连万岁！”

6月17日，陈云为南京路上好八连题词：“大家学习好八连的模范作风。”

周恩来也十分关心“好八连”。1963年4月12日，周恩来接见南京路上好八连前任指导员刘仁福，

★ 1963年4月25日，国防部颁布命令，授予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光荣称号。



★ 八连战士劳动归来。

总政治部曾在这年的4月3日召开会议，听取“南京路上好八连”指导员刘仁福和现任指导员王经文的工作汇报。

总政治部副主任萧华上将在听完汇报后说：

我们人民军队要经得起两种考验。一种是战争的考验，三十多年的历史，证明我们是经得起这种考验的。另一种是和平环境下的考验，这种考验，看起来容易，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还困难一些。

八连保持了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和劳动人民的本色，在南京路上树立了一面光辉的红旗。特别可贵的是，他们不是一时保持了这个传

称赞八连继承和发扬了我党我军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在和平环境中养成了好的作风，使政治教育紧密结合实际。

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非常关注发挥“好八连”在全社会的典型示范作用。1963年4月21日，他要求：号召民兵学习雷锋，学习好八连，加强社会主义教育，要提高他们的觉悟。4月29日，他写信给林英苏和罗东进：“你们要很好学习雷锋和上海南京路的好八连。这已成为动员全社会的典型示范。”

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

统，而是十四年如一日，人换了，作风传下来了，传开去了。

“在我们的部队里，雷锋和好八连的出现，都不是偶然的。归根到底，因为我们是共产党和毛主席领导的军队，是工人农民的军队。这样的军队是撼不动的。”

“好八连”的“劳动人民本色”，也反映了我们整个人民军队的本色。就在“南京路上好八连”命名大会上，当时的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一书记、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上海市市长柯庆施讲了这样一番话：

“好八连的同志是从劳动人民中来的，是工农的子弟兵，他们同群众的关系，亲如手足。他们珍惜人民的财富，为了节约一粒米、一滴水、一度电、一分钱、一寸布，也想了许许多多办法。全连每人都有一个针线包，衣服破了自己动手修补。他们爱护公共财产，东西坏了，自己动手修理；他们热爱劳动，自己动手种植蔬菜；哪里需要支援，就到哪里参加义务劳动。他们尊敬老人，遇到年老体弱的，就主动帮助和关心他们。他们热爱下一代，遇到迷路的孩子，就想尽办法，把他们送回家去。……”

这番话，是对毛泽东关于军队和人民群众关系的深刻阐述。

“从劳动人民中来”，“是工农的子弟兵”，“同群众的关系亲如手足”，这是对我们党领导的军队与人民关系准确的描述。

正是存在这样一种铁一般的关系，因此毛泽东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人民军队发展的实践中，亲自倡导开展了大规模的“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双拥运动，极大地激发了人民军队浴血奋战和人民群众拥军支前、拥军爱国的热情，使革命战争成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也使社会主义建设成为军队和老百姓共同奋斗的舞台。

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我们党、国家和军队进一步继承和发扬了拥

军优属、拥政爱民的优良传统，军队和人民之间结成了更紧密的关系，拧成了更强大的“团结力”。正如2013年7月8日习近平在中央军委专题民主生活会上所说的：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回顾我军走过的历程，我深深感到，坚持和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是我军的胜利法宝。

他要求我们的军队：

新形势下，我们必须增强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政治自觉、行动自觉。军队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必须标准更高、走在前列。

这是在我们党、国家和军队新的历史征程中，对“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句话的又一次新阐述。

“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这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亿万军民团结一心，前进道路上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战胜不了的敌人，我们的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



后记



从军事箴言视角梳理毛泽东领导的波澜壮阔的军事斗争实践和他博大精深的军事思想，是我们在编辑毛泽东著作、研究宣传毛泽东思想过程中萌生的一个想法。这个想法，与《湘潮》和《党史博览》两家杂志的朋友们不谋而合，也与辽宁人民出版社的朋友们的设想不谋而合。我们便商定，在建军90周年之际，一方面在这两个刊物上开辟有关毛泽东军事名言解读的专栏；另一方面将这个项目结集出版。

这样，自2016年11月开始，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同志们自愿投入到这项“十分有意义”的事情中。大家在编研工作之余，加班加点，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先是将毛泽东各个历史时期有关军事的40句箴言梳理出来，再用生动活泼的笔法，将这些箴言的来龙去脉、深刻内涵和深远影响一一解读出来。这些军事箴言，都是朗朗上口、铿锵有力、针对性强的名言警句，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和方法论意义。由于这是一项创新的工作，所以大家做起来并不容易，梳理和解读的过程，也是一个学习和提高的过程。完成这件事，了却了我们想在建军90周年的时候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要缔造者、伟大的军事家和军事统帅毛泽东做点事的心愿！

参加梳理和解读毛泽东军事箴言的毛泽东研究学者，除了中央文献研究室第一编研部的杨明伟、李珍、曹前发、王颖、戚义明、吕臻、祝志伟、单劲松、付闪、邵建斌、李振、李雨檬、李炼石外，还有我们特邀的军事专家、国防大学的周炳钦研究员。

全书的框架设计和统改工作，由杨明伟完成。李珍、王颖参加了前期研究和部分编务工作。这本著作的完成，得益于第一编研部每一位同志的辛勤努力，这是一次高效而愉快的协作。首先要感谢这个团队。

这项成果的面世，要特别感谢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陈晋研究员。我们从军事箴言角度研究和宣传毛泽东军事思想的想法和做法，得到了他的大力支持和充分肯定。

完成这样一部专业性强的著述，仅靠我们自己掌握的一些权威材料是不够的，我们也参考了一些当事人和其他研究者的不少可靠材料；为便于读者理解并增强可读性，书中还使用了一些相关的照片，因年代久远，情况复杂，没来得及一一辨认并联系上照片的作者，希望这些照片作者或权益人看到本书后，尽快与出版社联系，以便支付薄酬。一并表示感谢！

编撰者

2017年2月



MAO
ZEDONG

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为什么能够胜利？

靠什么取得胜利？

毛泽东军事箴言是毛泽东在领导人民军队创建和发展历程中，

在血与火的严酷考验中总结创造，

字字堪称经典！句句铿锵实用！

上架建议 / 领袖人物 军事

ISBN 978-7-205-09054-8



9 787205 090548 >

定价：120.00（全二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天猫专营店



辽宁人民出版社
微公号